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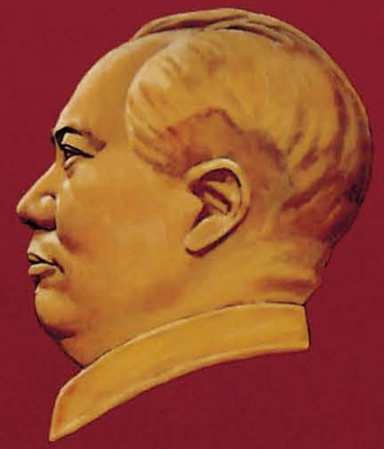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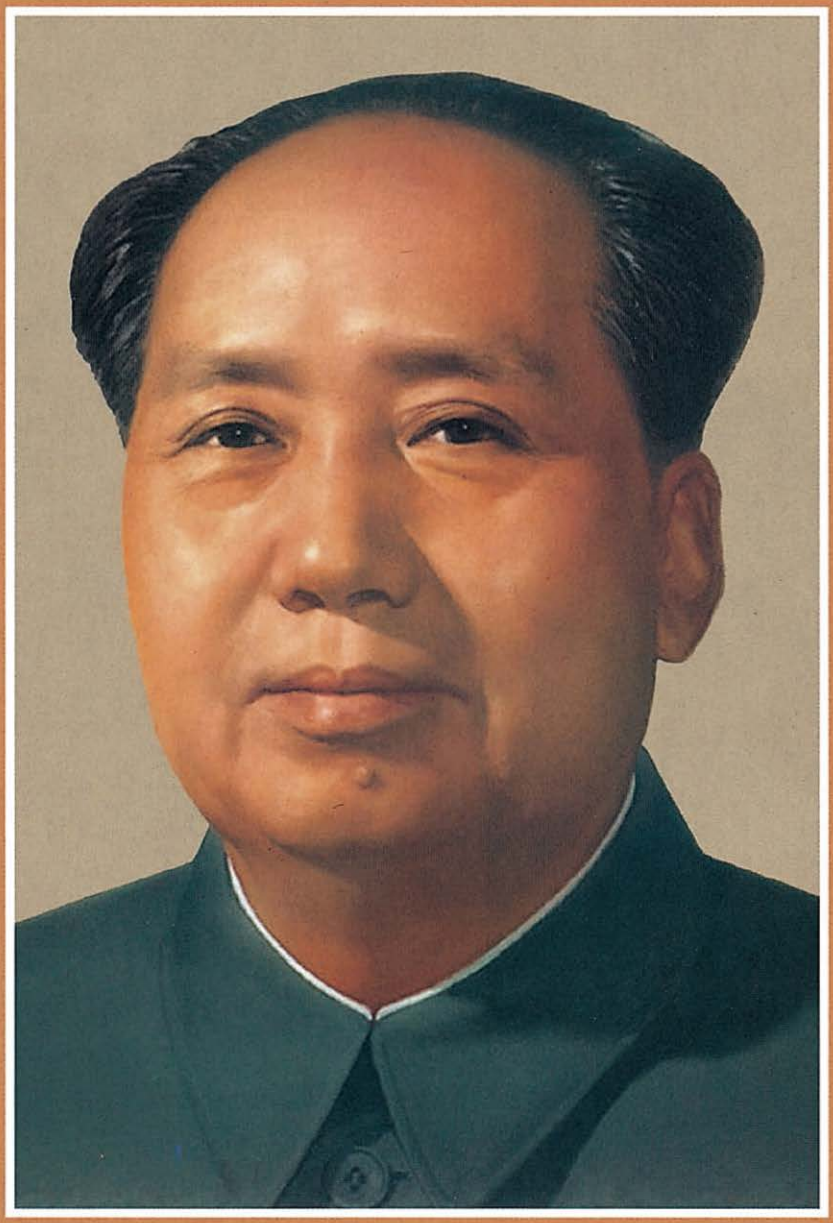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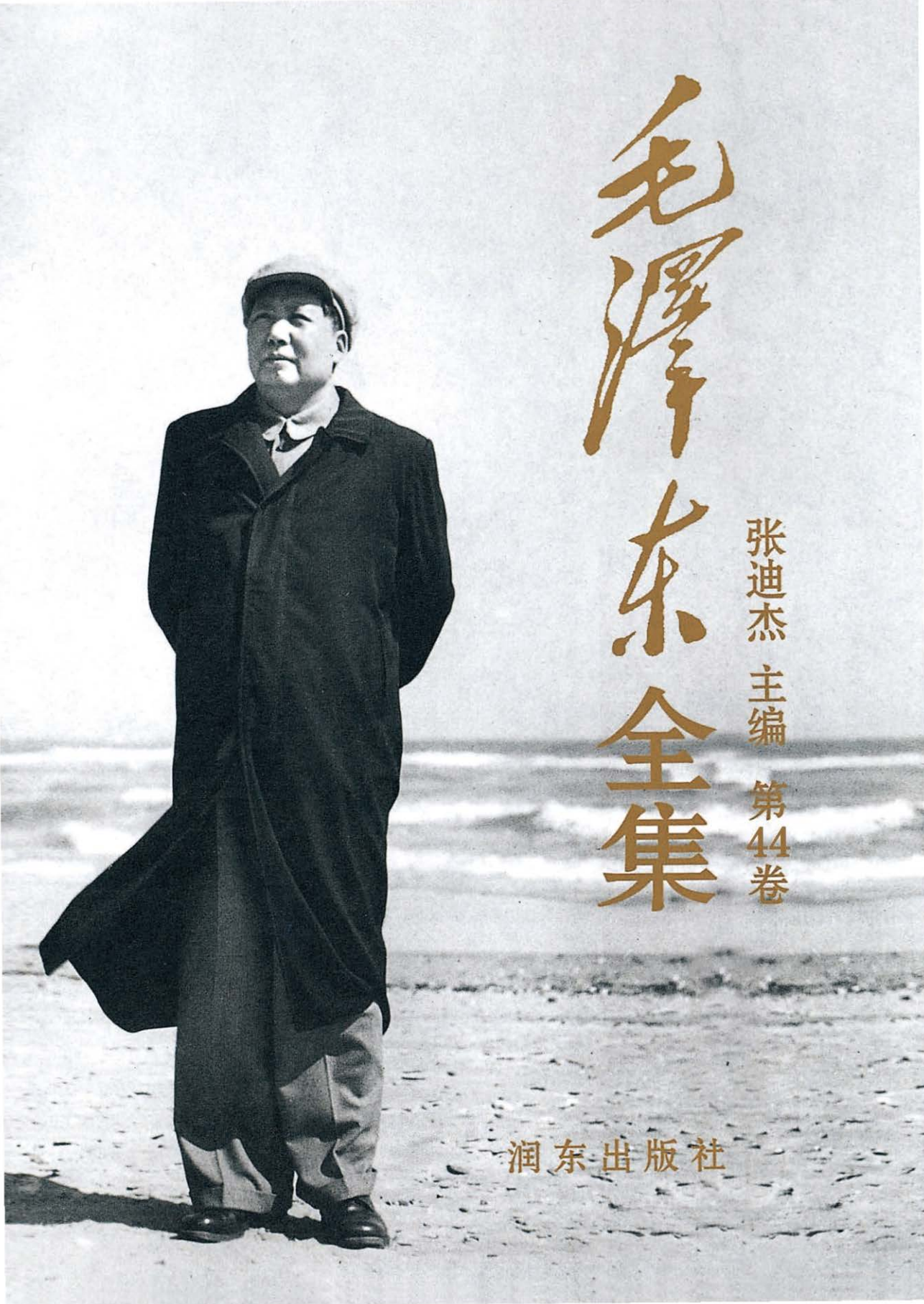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的修改和批语……1
（1960年10月17日）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
（1960年10月17日）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二批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的请示报告的批语…6
（1960年10月20日）
和斯诺的谈话……8
（1960年10月22日）
对中共中央答谢古巴人民社会党的电报稿的修改 ……19
（1960年10月22日）
关于为黄绍竑、刘王立明摘掉右派帽子的批语 ……20
（1960年10月26日）
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21
（1960年10月26日）
印发胡乔木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生产的建议的批语 ……22
（1960年10月27日）
印发河北省关于农村口粮标准、办好食堂和分配等问题的措施的批语 …23
（1960年10月27日）
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4
（1960年10月28日、29日）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的批语…27
（1960年11月2日）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批语和修改 …30
（1960年11月3日）
在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上的批语 …36
（1960年11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电报 ……37
（1960年11月6日）
对《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一文的批语……42
（1960年11月11日）
对《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等文章的批语 ……44
（1960年11月12日）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45
（1960年11月15日）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47
（1960年11月15日）
在林彪不同意军队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52
（1960年11月15日）
在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上的批语 ……53
（1960年11月20日）
中央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情况简报的批语 …55
（1960年11月23日）
对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57
（1960年11月25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59
（1960年11月28日）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 …63
（1960年11月28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66
（1960年11月28日）
关于资本家下放问题的批语 ……68
（1960年11月29日）
给黄炎培的信 ……74
（1960年12月5日）
《红旗》编辑部给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的信…76
（1960年12月6日）
转发《代食品会议情况反映》的批语 ……79
（1960年12月12日）
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
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80
（1960年12月14日、21日）
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部署报告的批语 ……84
（1960年12月22日）
印发关于河北省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简报的批语 ……86
（1960年12月23日）
印发谭震林关于粮食情况报告的批语 ……88
（1960年12月23日）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89
（1960年12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91
（1960年12月24日）
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当前市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93
（1960年12月25日）

为杨颖题词 ……95
（1960年12月25日）
要结合实际总结革命战争经验 ……97
（1960年12月25日）
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 ……99
（1960年12月26日）
印发人民来信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的批语……101
（1960年12月28日）
印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文的批语……102
（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103
（1960年12月30日）
印发关于美、英、苏农业劳动力负担情况资料的批语……106
（1960年12月30日）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107
（1960年12月30日）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12
（1960年12月31日、1961年1月1日）
给毛岸青的信……114
（1960年）
给林克的信……115
（1960年）
为《新湘评论》题名……116
（1960年）

请林克查找现、战二韵所在声部的批语……117
（1960年）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等对信阳问题批示的文件的批语……121
（1961年1月5日）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123
（1961年1月9日）
关于推广锦州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经验的批语……125
（1961年1月10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27
（1961年1月13日）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32
（1961年1月18日）
给田家英的信……140
（1961年1月20日）
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42
（1961年1月20日）
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144
（1961年1月23日、24日）
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50
（1961年1月23日）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58
（1961年1月24日）
对《光明日报》《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166
（1961年2月15日）
对罗瑞卿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考察报告的批语……168
（1961年2月27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170
（1961年2月）
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原来的反“左”割断了……171
（1961年3月5日）
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172
(1961年3月5日）
不要老是要下面报“账”不要发那么多文件……173
（1961年3月5日）
公社划小不划小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174
（1961年3月5日）
关于请朱德、陆定一参加南三区会议等问题的批语……175
（1961年3月10日）
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和批语……177
（1961年3月11日）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180
（1961年3月13日）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82
（1961年3月13日）
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的批语……186
（1961年3月16日）
对南海县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上调任务包干办法的批语……188
（1961年3月16日）
对南三区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的批语……189
（1961年3月17日）

对《华东几个同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91
（1961年3月17日）
印发两份农村见闻材料的批语……193
（1961年3月18日）
印发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经验的批语……194
（1961年3月19日）
印发《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的批语…195
（1961年3月19日）
印发《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97
（1961年3月22日）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
（1961年3月23日）
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的修改……209
（1961年3月23日）
在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211
（1961年3月29日）
关于查找南宋几部诗文集的批语……214
（1961年3月）
为《南宁晚报》题写报头……215
（1961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216
（1961年4月3日）
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的批语……218
（1961年4月11日）
印发胡乔木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调查材料的批语……220
（1961年4月15日）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报告的批语……223
（1961年4月15日）
和古巴文化代表团的谈话……225
（1961年4月19日）
给臧克家的信……226
（1961年4月24日）
给邓小平的信……227
（1961年4月25日）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232
（1961年4月27日）
对杨朔《樱花雨》一文的批语……237
（1961年4月）
为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通知和批语……240
（1961年5月4日）
对张平化关于湖南工作来信的批语……242
（1961年5月5日）
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 ……243
（1961年5月6日）
转发周恩来关于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汇报的批语……245
（1961年5月7日）
关于下连队调查极为有用给林彪的批语……246
（1961年5月7日）
转发李井泉关于粮食问题来信的批语……247
（1961年5月9日）
转发胡乔木关于湖南调查来信的批语……248
（1961年5月9日）

关于胡乔木推迟返京、继续调查的批语……250
（1961年5月9日）
转发邓小平、彭真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255
（1961年5月13日）
给张平化的信……257
（1961年5月14日）
转发李井泉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来信的批语……258
（1961年5月15日）
对王任重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来信的批语……260
（1961年5月15日）
转发阎红彦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262
（1961年5月16日）
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65
（1961年5月28日、30日）
转发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材料的批语……268
（1961年5月29日）
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的批语……270
（1961年6月1日）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第二、三阶段日程安排的批语……272
（1961年6月3日、4日）
对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274
（1961年6月4日）
对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稿等的批语和修改……276
（1961年6月11日、17日）

印发关于王国藩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材料的批语……279
（1961年6月11日）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281
（1961年6月12日）
给刘松林的信……288
（1961年6月13日）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289
（1961年6月13日）
给邓小平的信……294
（1961年6月22日）
对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295
（1961年6月）
给张维的信……301
（1961年7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电报……302
（1961年7月10日）
在关于日本经济政策和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份材料上的批语…305
（1961年7月13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七周年的电报……307
（1961年7月21日）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的电报……309
（1961年7月25日）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310
（1961年7月30日）

关于同意会见古巴桑切斯少校的批语……312
（1961年8月9日）
祝贺苏联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电报……313
（1961年8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314
（1961年8月14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六周年的电报……317
（1961年8月16日）
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321
（1961年8月19日）
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一套，还要碰钉子……323
（1961年8月23日）
给胡乔木的信……324
（1961年8月25日）
在林彪关于总政选印《毛选》部分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326
（1961年8月29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335
（1961年9月1日）
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337
（1961年9月6日）
给董必武的信……339
（1961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周年的电报……341
（1961年9月8日）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343
（1961年9月9日）

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上的批语……344
（1961年9月）
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345
（1961年9月16日）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376
（1961年9月16日）
在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上的批语…379
（1961年9月17日）
和蒙哥马利的谈话……381
（1961年9月23日）
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400
（1961年9月24日）
邯郸谈话会记录……404
（1961年9月27日）
给中央常委的信……408
（1961年9月29日）
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416
（1961年10月4日）
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的谈话……417
（1961年10月5日）
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420
（1961年10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422
（1961年10月6日）
对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24
（1961年10月7日）

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427
（1961年10月7日）
为日本访华朋友们题词……432
（1961年10月7日）
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假说》一文的批语……433
（1961年10月9日）
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434
（1961年10月14日）
对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材料的批语……436
（1961年10月15日）
在《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437
（1961年10月16日）
为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题词……439
（1961年10月16日）
关于转发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经验的批语……441
（1961年10月22日、23日）
对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等的批语……444
（1961年10月30日）
为李家骥题词……446
（1961年10月）
七绝·屈原 ……448
（1961年秋）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449
（1961年11月6日）
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451
（1961年11月11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453
（1961年11月17日）
关于选看一些材料给江青的批语……456
（1961年11月19日）
对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调查报告的批语……458
（1961年11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461
（1961年11月28日）
给臧克家的信……464
（1961年11月30日）
既要有总路线，还要有具体政策……465
（1961年11月）
关于了解江苏省经济工作的经验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467
（1961年12月15日）
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469
（1961年12月20日）
给张仙朋的信……470
（1961年12月24日）
给周世钊的信……471
（1961年12月26日）
给臧克家的信……474
（1961年12月26日）
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的批语……478
（1961年12月27日）
卜算子·咏梅 ……480
（1961年12月）

印发《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几首诗的批语……491
（1961年12月29日）
给刘松林的信……493
（1961年12月29日）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494
（1961年12月31日）
对一篇关于人道主义文章的摘报的批语……496
（1961年12月）
七律·答友人 ……497
（1961年）
七绝两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502
（1961年）
七律·改鲁迅诗 ……504
（1961年）

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1]的修改和批语[2]

（1960年10月17日）

一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

[1] 这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1960年7月应《中国青年》杂志社之约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谈了她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学徒工的经历和体会。毛泽东阅改后为这篇文章拟题《我的经验》，并在标题下加了“徒工王波”四个字。这篇文章后来载于1960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十三期。

[2]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我的经验》一文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他在文章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四是毛泽东在王海容1960年8月1日给他的秘书叶子龙的信上写的批语。王海容在信中说：“《中国青年》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当学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的文章，以便帮助广大的青年徒工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得到主席公公对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已写好了，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一点点时间替我修改一下。”

二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十一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三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四

找王海容今天下午三时—五时来这里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上午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10月17日）

富春[1]同志：

此件[2]很好。请你阅后，送陈伯达[3]同志一阅，并请他找几个人看一下，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4]，将此件介绍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因为牵涉到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各方面），予以研究，大力推行，迅速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另外，请书记处统计一下，各省、市、区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各有多少，共有多少，何处成绩大，何处成绩小，告我为盼！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山西省委1960年10月12日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内容如下：（一）今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只有240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

女多男少，老多壮少。不但数量减少了，而且质量降低了。（二）在农忙季节占用劳动力过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基本建设战线，林牧副渔四业，生活福利方面、县和公社两级的工业及其他企事业，脱离生产的青少年学生增加过猛。（三）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战线。必须首先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明确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四）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采取的措施是：（1）为保证钢铁生产方面需要的劳动力，工业企业要改善劳动、生产组织，精简管理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削基建，保生产；从城市人民公社中为大工业补充一部分劳动力；今后三五年内一律不得从农村抽调劳动力。（2）必须保证在农忙季节有80%以上的劳动力参加田间劳动。（3）坚决压缩县、社、管理区占用的劳动力，充实田间生产。（4）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主要放在农闲时搞。（5）县、社工业，要精简一部分劳动力回农业生产战线。（6）适当控制中等学校以至高等学校的发展速度。从今年开始，农村高小毕业生一半升学，一半回农村生产。（7）县社脱产、半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一律解散，所有人员回队参加农业生产。（8）全省要动员城镇30万人回农业生产战线。（五）截至9月下旬统计，已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达110万人，使参加田间生产的人数达到370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六）为防止今后各系统再从农业方面挤劳动力，必须严格遵守劳动力调配计划，严禁私招乱用。（七）为把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及农村的青少年和壮年稳定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最重要的是把公社办得更好，具体应做到：（1）坚持人民公社以队（管理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2）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分配政策。（3）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工作。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中共中央1960年10月27日下发了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指示，指出："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的报

告，参考山西的经验，从各方面研究，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二批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60年10月20日）

此件[1]送少奇、富春[2]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日

---

[1] 指公安部党组1960年10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首批战犯特赦后，我们对继续关押的战犯进行了“改恶从善”的教育，多数人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根据中央关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的指示，今年特赦战犯名额以比去年增加一些为好，拟为50名，比去年多17名。同时，为有利于加强已判刑战犯的改造，并为今后的特赦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今年还提出21人的减刑名单。被特赦战犯的安置，仍按去年的原则，有家可归者一律释放回家，无家可归者暂不安排工作，立即给以生活安置。今后释放的战犯，均应把生活安排好，给以必要的适当照顾，并有人负责教育管理，以利进一步改造。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1960年10月，毛泽东等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

1960年，毛泽东和贺龙亲切交谈。

和斯诺[1]的谈话

（1960年10月2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以下简称斯）：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〇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

[1] 斯诺，即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1937年，他发表《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3次到中国访问。

[2] 肯尼迪（1917—1963），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 尼克松（1913—1994），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196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为其签名。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

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1]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2]，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

---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2]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

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

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196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中为马海德。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1]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2]，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

---

[1] 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

[2] 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8年4月，他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贺龙率领的部队[1]，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2]）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3]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

[1] 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2] 马海德（1901—1988），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1933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1936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3] 保安，今志丹县。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

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

---

[1]　独立战争，指1775年至1783年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年5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3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2]　指南北战争，是1861年至1865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对中共中央答谢古巴人民社会党的电报稿的修改[1]

（1960年10月22日）

祝您们在进一步加强革命力量的团结，保卫与推进革命的斗争中，在菲德尔·卡斯特罗[2]英雄领袖的领导下，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古巴万岁！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万岁！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1960年10月22日答谢古巴人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稿的修改。

[2] 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政府总理。

关于为黄绍竑、刘王立明[1]摘掉右派帽子的批语[2]

（1960年10月26日）

送总理、富春阅。

黄绍竑、刘王立明二人以摘掉右派帽子较为有利。请总理、富春最后确定。如今后发现他们又有严重反动，甚或反革命行为，那时酌情再处，我们仍有主动。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二时

---

[1] 黄绍竑，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曾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2]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1960年10月14日关于当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黄绍竑从划为右派分子后，没有发现什么反动言论。刘王立明划为右派分子后，学习积极，承认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问题。反右前（1956年8月）她在世界妇女节制会上抵制过台湾代表，驳斥帝国主义污蔑'中国贩卖鸦片'的谰言。我们反复考虑似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为有利。是否摘掉，请中央决定。"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将这一报告转送周恩来审阅后再送毛泽东等。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报告上。10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当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黄绍竑、刘王立明均名列其中。

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1]的批语

（1960年10月26日）

请刘、周[2]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毛

廿六日上午

[1] 指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1960年10月21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印发胡乔木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生产的建议[1]的批语

（1960年10月27日）

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

毛泽东

1960年10月27日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60年10月27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有其重大意义：1. 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 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3. 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此外，它几乎不与农作物争地、争水、争肥、争劳力。因此，我想建议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及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公社），在各省农业会议上讨论，并逐级负责作出安排。南方可以终年生产，北方冬天要修温室，现冬天就要到来，更是时不可失。"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这个建议。

印发河北省关于农村口粮标准、办好食堂和分配等问题的措施的批语

（1960年10月27日）

此件[1]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考。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1960年10月20日口头汇报的要点，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农村口粮的安排，坚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明年全省包产产量为182亿斤，力争增产20亿斤，征购54.6亿斤。增产的20亿斤全部为储备粮，其中2/5为小队所有，2/5为大队（基本核算单位）所有，1/5为公社所有。公社动用储备粮，要经过县里批准；小队和大队的储备粮，实行民主管理，采取大队、小队、群众三级商量和两把锁的制度，防止浪费和损耗。（二）办好食堂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专门给食堂拨出菜地，社员自留地在外，这样办好食堂有物质基础；二是派最好的干部认真办食堂，建立制度，杜绝各种不合理现象。（三）今年分配坚决做到“两卡”“一抓”“七落实”。“两卡”，一是卡总收入70%给社员；二是卡分配给社员的部分中工资占70%，供给部分占30%。“一抓”，即抓财务管理。“七落实”，是指分配中的征购、口粮、工资、种子、饲料、肥料价款、超产奖励等项目落实。（四）对于处理“共产风”问题，决心按中央新精神办理，彻底清理和偿还公社化以来“一平二调”的部分，并立即组织工作组搞试点。

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1]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1960年10月28日、29日）

一

田家英[2]同志：

写得很好，略有修改[3]，请你及伯达[4]同志加以斟酌。如认为可以，即可付印。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上午

---

[1] 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而作的，发表在1960年11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务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3] 本篇三、四、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二

退田家英同志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上午

三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当时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在好几年内占领了党的领导机关，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大批正确领导同志打下去，使这些同志抬不起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看不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的由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急于夺取大城市。

四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胜利，在当时革命力量削弱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迅速地重振起来，保证中国革命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五

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摧毁革命人民的国家机器，而革命人民的神圣任务，就是保卫、发展和强化这个革命的国家机器，以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在随后打倒那敢于向革命力量进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目的。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0年11月2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发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安徽省委1960年10月28日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认真看一遍，吸取安徽经验，结合你们自己的情况，定出办法，迅速施行，越快越好。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内，开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并向中央都写一个报告，是为至要。

中央

1960年11月2日

二

恩来、富春、震林[2]同志阅后，两天内请富春用电报发出，勿误为盼！

附件用后退我。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二时

---

[1]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各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给中央和毛泽东并华东局等的这个报告说："从十月初开始，我们以县为单位分别召开了生产组长以上的五级干部大会，全面检查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巩固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指示及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到会干部及社员代表，全省共计三十六万五千余人。会议的开法是：（一）由县委书记作报告，总结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指出某些社队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检查县委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的缺点，表示领导决心。（二）讲解省人民委员会两次布告所宣布的各项具体政策，其中包括加强生产小组责任制；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实行定产量、定措施、定工分、定奖惩的制度；加强耕畜、农具的保养和使用；认真执行评工记分、超分奖励办法；保留社员必需的自留地；合理处理社员私人积肥；充分利用空隙地，交生产小组集体种植，用于改善社员生活；大量种菜；大量养猪；干部要参加劳动；实行劳逸结合。（三）在弄清政策、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检查评比，表扬好干部，揭发和处理坏人坏事。（四）各级领导订出贯彻执行政策的具体措施，安排好当前的生产。为把会议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县的会议结束后，各地都分别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普遍进行传达，逐条讲解省人委的两次布告。同时，抓紧政策兑现。由于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政策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人人兴高采烈，

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目前在贯彻政策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们已责成各级党委普遍进行复查，保证中央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及各项政策落实兑现。”

[2] 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的批语和修改

（1960年11月3日）

一

恩来同志：

作了一些修改[2]，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3]谈一下，最后酌定。

毛

三日早

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4]

二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在1967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

三

实现了基本社有制，甚至像现在的国营工厂一样，变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即是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

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

五

一心一意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力争1961年多打粮食，获得大丰收。并且力争以后几年，例如说，一连六七年（1961年至1967年）使粮食和农业作物得到大丰收，使粮食问题基本过关，至少初步过关。中央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努力执行中央政策，端正工作作风，就可以做到。

六

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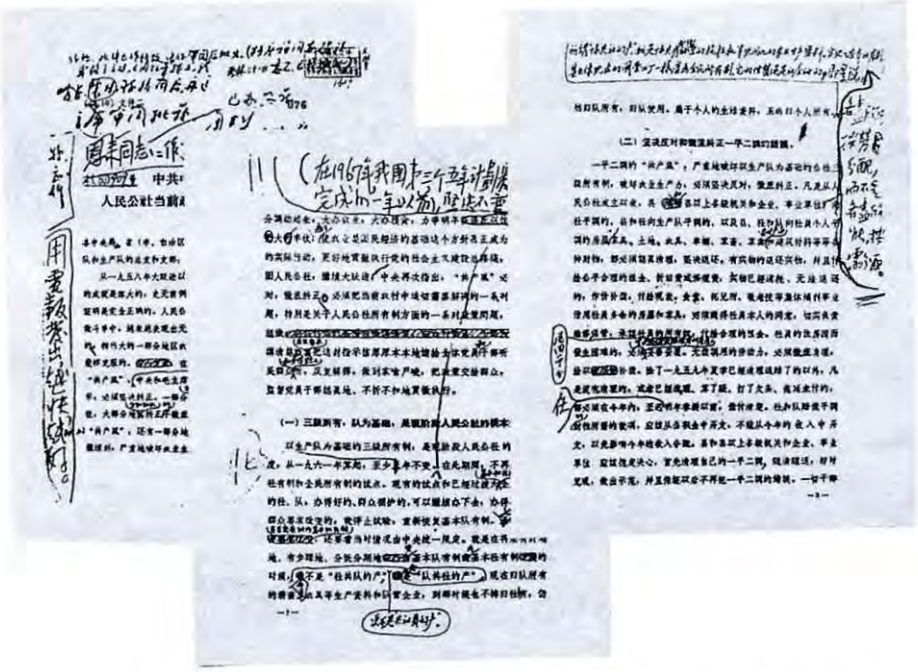
[1] 周恩来1960年10月31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2] 本篇二至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此外，在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的第四页上，毛泽东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一句中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改为“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在第七页上，将“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小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一句中的“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将“公积金和公益金合计的比例，一般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十为宜”一句中的“百分之五到十为宜”，改为“百分之五左右为宜”。在第八页上，将“对于收入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可以更低一些，也可以不提成”一句中的“可以更低一些，也可以不提成”，改为“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在第十页上，将“三五年内，县以上各级各单位都不许再从农村抽调劳动力”一句中的“三五年内”，改为“五年内”。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中，以上各处都遵照了毛泽东的修改。

[3] 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正人，即陈正人，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的最后一页上，将下发日期改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一紧急指示信。



1960年11月3日，受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党全国。图为毛泽东对指示信的批语和修改的手稿。

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会见南非共产党主席达杜。

1960年11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北京亲切交谈。

1960年11月，毛泽东设宴欢迎胡志明访问北京。

1960年11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宴会上亲切交谈。

在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1]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3日）

退富春[2]办。

---

[1] 周恩来1960年10月23日报送毛泽东等核阅的这一中央通知稿说，中央曾多次指示全党同志不请客，不送礼，不讲阔气，不讲排场，各地区各部门执行这一指示是有成绩的，但也有少数地区和部门执行得不够坚决。为纠正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再作如下规定：（一）一切机关、厂矿、企业、部队、学校、团体、人民公社，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或变相赠送礼物。（二）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只能对直接主管部门送一份样品。不许以献礼或其他任何名义赠送上级领导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三）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下去视察和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得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生活招待一切从简，禁止举办宴会和特殊招待，吃饭应按标准收取费用和粮票。（四）精简会议。凡不需要或者可以不开的会议，应当一律不开；凡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应当不开；凡性质重复、任务相同的会议，应当合并召开；凡必须召开的会议，应当压缩参加人数，并且严格执行财政部规定的会议开支标准。（五）从中央机关到人民公社，今后7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产性建设。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新建时，须报中央或省、市、自治区批准。现有招待所必须精简人员和设备，提高使用效率。在审阅时，毛泽东将这一通知稿的下发日期改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60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四十三年来，世界局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占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地区取得了胜利。现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蓬勃发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勃列日涅夫的电报。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

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空前孤立，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道路。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大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是挫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有力保证。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胜利实现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七年计划方面，在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人民将继续同苏联人民一道，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携手前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正在改变着自己国家的面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兄弟般的援助。对此，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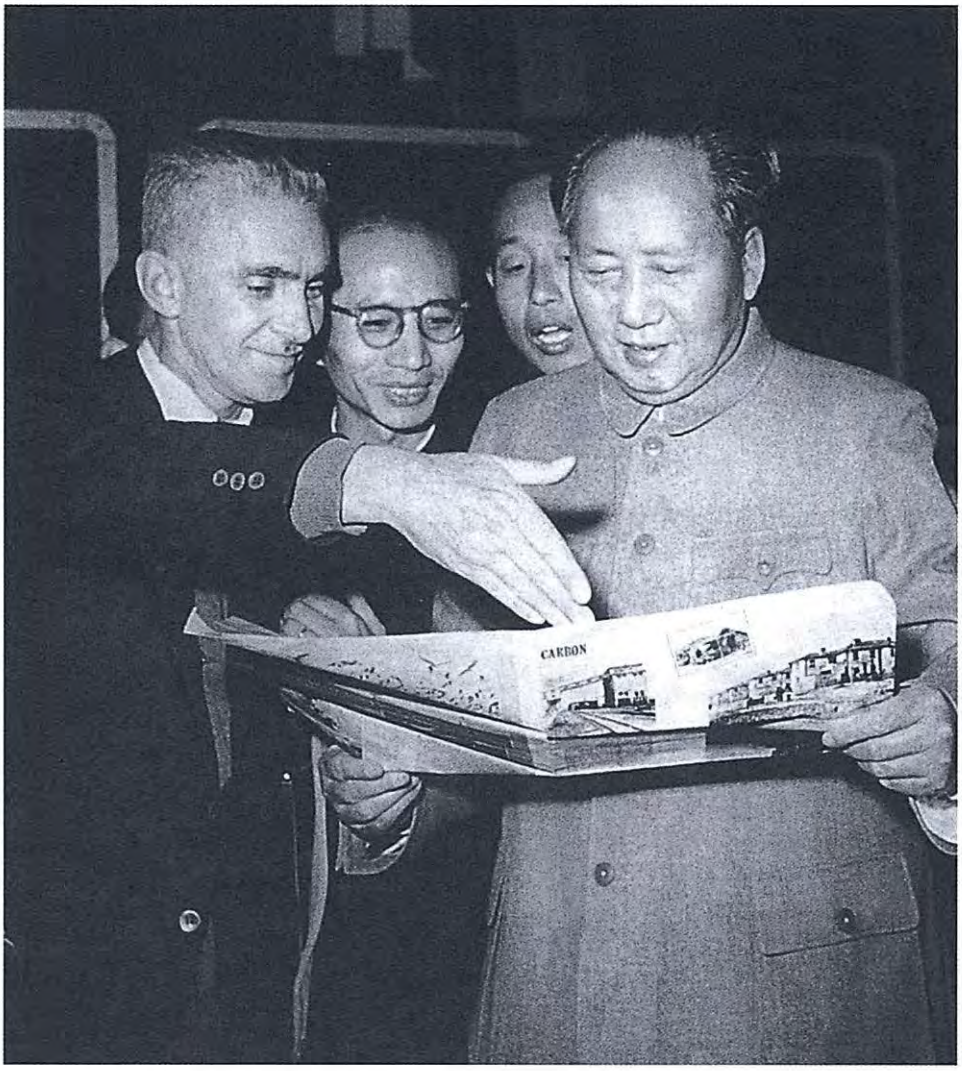
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坚如磐石的中苏友谊和团结，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妄想破坏这个友谊和团结的任何企图，过去没有得逞，现在和将来也永远不会得逞。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继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1月6日于北京

1960年11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国新闻工作者。



1960年11月，毛泽东和来华访问的巴西记者在一起。

对《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1]一文的批语

（1960年11月11日）

退陈伯达[2]同志：

此文看过，可用。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廿四时

---

[1] 指拟在《红旗》1960年第二十二期上发表的《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的社论稿。社论稿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经济问题中的首要地位，同时又讲过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这两件事是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是正确地表述了农业需要同工业密切地同时并进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为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进一步处理农业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主要是在各个经济部门更合理地安排劳动力，使农业生产第一线保持足够的劳动力；一个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坚持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这将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为此，我们要积极推行农业技术改造，但在目前只能在局部地方逐步实现农业

机械化。因此，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发展的头等要素，也是保证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头等要素。农村中劳动力的合理安排，最重要的是解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方面的安排问题。不能任意地从农业生产方面抽调劳动力。党中央提出在各个经济部门合理安排劳动力，使农业生产第一线能够保持和配备足够劳动力这个方针，是一个掌握经济规律的问题。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力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我们要避免劳动力浪费。妥善地解决劳动力节约和合理分配，就农村来说，这是同坚持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分不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最好的根本制度，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制度，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1960年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十二期发表了这个社论。

[2]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对《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等文章的批语[1]

（1960年11月12日）

请林克[2]找到这些刊物和报纸（载了那些人的文章的），送我一阅。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0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该版在《学术动态》栏目中登载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和《河南哲学工作者讨论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两篇述评。第一篇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哲学工作者就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及质变状态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是由薛靖在《新建设》1960年第六期发表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一文引起的。继而言立在《新建设》第七期上发表不同意见。以后，《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又发表了周书文、吴秉元、唐凯麟、砢几等人的讨论文章。现在这个讨论已初步展开。文章还简要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观点。第二篇说，据《中州评论》十八期报道，河南省一些哲学工作者8月底到9月初对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但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统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多数人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而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60年11月15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1960年11月10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的第一页上。中央五人小组的这一报告说，中央一级机关各单位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掀起了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据11月9日统计，已初步确定下放干部10176人，占中央机关干部的7.33%。这次干部下放农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大力宣传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要求下放的高潮，做到了大多数干部心情愉快，树立了改变农村面貌的壮志，使留下的干部也受到了教育。为确保下放干部政治好，身体好，完全自愿，到农村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准备在名单公布后，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干部组织起来，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和决议。同时对每个人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了解和审查，凡不符合条件的坚决调换，对确实不愿下去的也决不勉强。宁肯下放人数少些，也不能降低质量。对下放干部的分配，重点加强农村，适当照顾其他基层。到农村去的重点是那些农业生产任务重、问题多、基层严重不纯的地区。这些干部下去后，原单位的党组织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次下放的干部，一般要下放3年，少数编内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轮换办法。五人小组的报告讲到对这次下放的干部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毛泽东在“大讲形势”4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一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五日晨

二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1960年11月15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

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二

即送周、朱、富春、震林、先念、伯达[5]同志阅后，请富春办。

因文件较长，只能印送，请富春注意，印送越快越好。不发西藏、新疆。

毛泽东

11月15日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0年11月12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送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二）省委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全省大部分县都已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三）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11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3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账，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建立

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会议打算开10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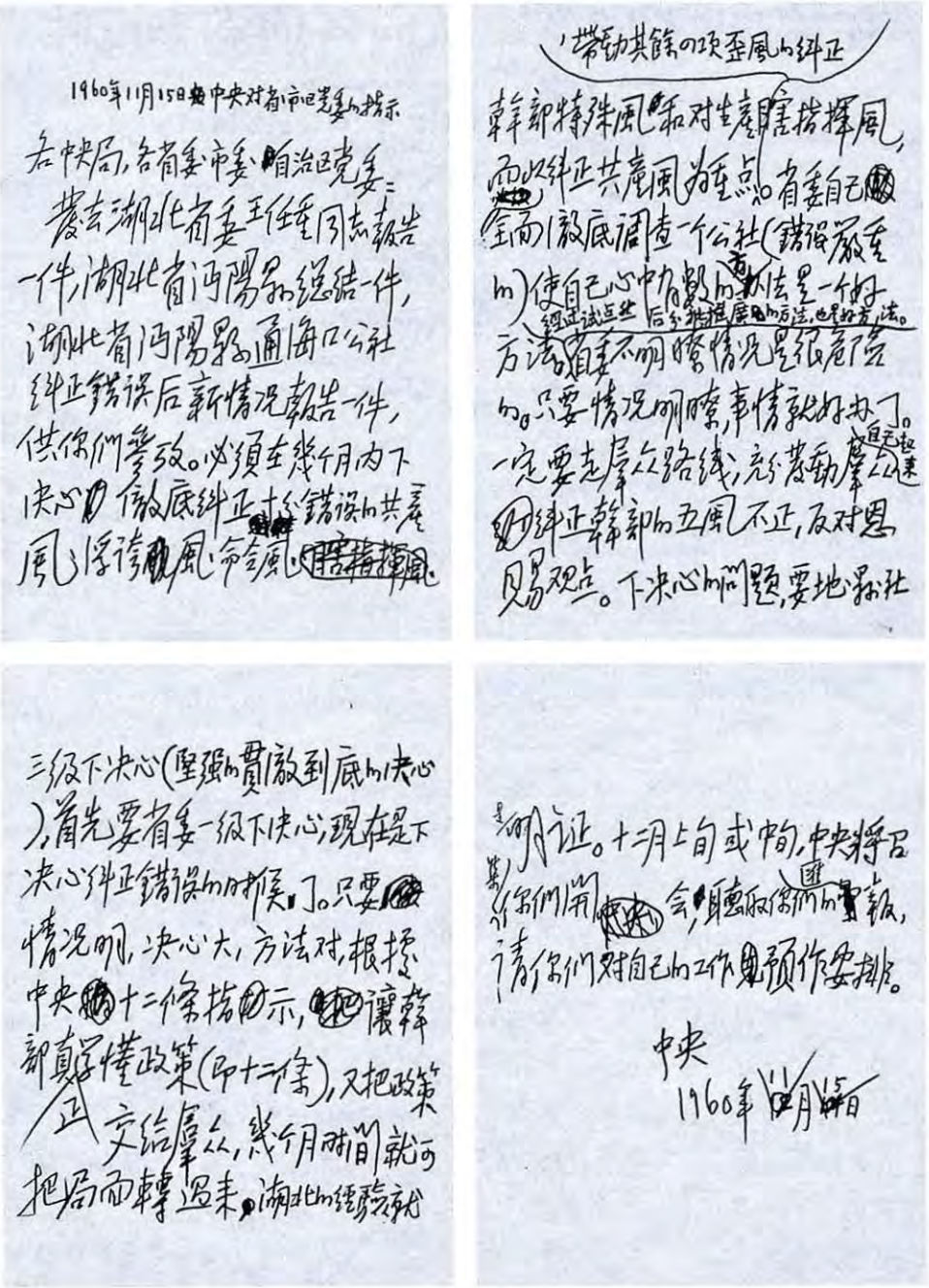
[2] 指中共沔阳县委1960年11月3日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3] 指中共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1960年11月9日关于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变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海口公社经过这次贯彻省委“十项政策”、坚决纠正“五风”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心情舒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消除了，对党的政策信任了，普遍树立了兴家立业、当家做主的思想，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生产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经营条件。干部作风有了显著改变，参加劳动已开始形成制度，通过生产了解了实际情况，克服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通过处理“共产风”，干部的政策水平有了提高，纠正了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干部工作也好做了。这些变化，大大推动了生产和生活，使得生产出现高潮，生活面貌发生了改观，鼓舞了社员群众夺取明年大跃进的信心。今年冬季，将根据中

央“十二条指示”，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4]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

[5]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先念，即李先念，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在林彪[1]不同意军队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15日）

请富春告肖华[2]照林彪同志意见[3]办理。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 林彪1960年11月10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说：送上总政治部关于通令各地驻军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的建议一份。我认为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顾虑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会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并不比地方同志熟悉，且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在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工作中，如该地党委规定要军队担任反映地方情况的任务，军队可照指示负责反映，这作为局部的具体做法是可以的。如该地党委并未规定军队这项任务时，则军队不可任意干预。军队对地方的意见只能向军队政治部反映。考虑到上述情况，因此我不同意通令军队把反映地方情况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在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1]的第二次报告[2]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20日）

---

[1]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2] 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5日给中央、西北局的这个报告说，我省三级干部会议从11月6日开始，在肯定大跃进以来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检查了省委在执行中央有关农村人民公社方针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从会议头几天揭发的材料来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我省是相当普遍、严重的。省、地、县、社各级和工农商学兵各部门，都向公社和生产队伸手拿东西，都有“平调”。全省560个公社，“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占29%，没有刮的只占1%。“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挫伤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耕畜、劳力大量减少，耕作粗糙，播种面积缩小，产量下降，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与1958年冬季的“共产风”相比较，去年以来的“共产风”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大办食堂时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很多。去年算账以后之所以又刮起“共产风”，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在讨论中，大家检查了以下四种思想：（一）急于过渡。（二）不能正确理解政策与任务的关系。（三）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盲目执行。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判断一种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刮“共产风”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上、作风上的错误，在方向上也是一种严重的偏差。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方法，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严肃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一

可看，应看。

二

陈伯达[1]同志：

此件送上一阅，请于阅后退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七时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中央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1]的情况简报[2]的批语

（1960年11月23日）

一

各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

[1]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2] 中共四川省委给西南局并报中央、毛泽东的这一简报的内容如下：一、接到中央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后，各试点公社都采取了干部会、社员代表会和社员大会等形式，原原本本地逐条予以宣读讲解。虽然不同类型的试点公社各有不同的反应，但总的情况是好的，都很快地起到了安定人心、激发群众积极性、推动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作用，使部分干部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和其他歪风开始有所收敛和改变。二、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拥护的重点各有侧重。少数人则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顾虑和抵触情绪，其中大多是乘一平二调之机手脚不干净，或在工作上、作风上有严重错误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地、富、反、坏等分子乘机破坏和富裕农民浑水摸鱼。三、试点中已经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及时的，因而具有强大的威力。省委决定，凡生产进度慢、任务完成不好的地方，立即进行中央规定的十二条政策的宣传，表明兑现的决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做出成绩，以便集中力量在12月份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发去四川省委1960年11月20日简报一件，供你们参考。

中央

1960年11月23日

二

周、富春、震林[1]阅后，即用电报发去，然后交伯达[2]一阅，原件用后退毛。

---

[1] 周，指周恩来。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对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11月25日）

周总理：

此件[1]如未看过，请看一下，退回子恢同志。子恢同志最近考察了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四省，有些好的意见，你有暇时，可找他一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60年8月26日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讨论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时，具体讨论了重点商品粮地区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深入发动群众改造落后队以外，还必须从负担政策、粮价和使用国家扶助穷队资金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发展生产。近几年这些地区不断发生问题，今年春季发生饿、病、逃荒现象的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在一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几年来生产发展很慢，有的甚至停顿下来，致使群众情绪低落，生产力受到一定破坏。除了领导和工作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负担过重，收入少。商品粮重点县中，有10个县1959年粮食征购任务平均每亩负担在300斤以上。商品粮重点产区，农业税又比其他地方重，

越是人均产量高的地方，农业税率就越高。此外，粮价低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我们研究了这些情况后，认为要大办粮食，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根据几年来的情况，在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各县市之间的征购任务。（二）降低重点商品粮地区的农业税率，原则上不超过定产产量的11%。（三）有重点地调整粮价，准备把产商品粮1000万斤以上的公社，每斤提高一分钱。（四）国家扶助穷队的资金，主要用在重点商品粮地区，帮助这些地区的穷队发展生产。11月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给毛泽东写信说："你那天说没有看到《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现将此电报查出送上，请收阅。"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邓子恢的来信上。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

（1960年11月28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1]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

[1] 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1]，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

---

[1] 指毛泽东1958年8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二

周、富春、谭震林、陈伯达[1]同志阅后，用电报发去。原件退毛。

[1] 周，指周恩来。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的手稿。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11月28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浙江省委1960年11月20日报告[1]一件，供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反映了浙江的实际情形，对各地有参考价值。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二

周、富春、震林、伯达[2]阅后，用电报发去。不发西藏。除中央批语外，原件也不发浙江。原件用后退毛。

---

[1]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给中央、华东局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一）9月底、10月初，省委根据中央大办

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讨论了今冬明春的工作，以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为主题，开展整风整社。会后，多数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进行整社的试点工作。11月4日，接到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当即传达下去，已普遍和群众见面，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前的生产。但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还存在着怕变等忧虑。目前我们正在把运动逐步引向深入，踏实解决思想问题、各项政策问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二）11月14日，省委常委开会，讨论了中央指示，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深刻体会到“五风”的严重危害。“五风”屡反屡犯的根源是我们对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现阶段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两个根本问题理解不深，执行不坚决。在讨论中，大家指出：1. 过去对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认识不足。对农村中出现的严重情况，没有着重从所有制和政策方面来检查，而简单化地认为这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这次讨论，才认识到这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只有认真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把所有制踏实稳定下来，不乱出新花样，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2. 对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过去也认识不足。由于我们对农业产量估计过高，在实际工作中不自觉地削弱了农业这个基础。一方面，在安排劳动力和安排计划中，忽略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安排；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不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办事。3. 对干部中的“五风”，过去虽然反复进行批评，但没有抓到根本问题。从领导上来检查，一是对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各项政策认识不够明确，对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不够；二是在任务要求上过多、过死、过急，不实事求是，使得有些干部不敢讲真话，以致滋长起虚报浮夸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上到下，大家一齐检查，一齐改正。（三）今后工作安排。1. 省委决定在11月至12月，先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以县为单位举行的五级干部会议，着重解决对中央指示的认识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彻底揭发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划清思想、政策界限，表扬好的干部，批评处理极少数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2. 从现在到明年2月底以前，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风整社运动。3.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对极少数坏分子，及时严肃处理。属于思想作风问

题的，留待运动后期，按中央指示的原则加以处理。

[2] 周，指周恩来。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0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六年来，勤劳、勇敢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战胜了重重困难，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以高速度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祖国的面貌。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提前一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业生产指标和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并且以更高的热情和信心迎接规模宏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深信，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辉煌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阴谋，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对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尊敬。中国共产党因为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一个坚强的战友而引以自豪。

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兄弟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始终团结一致，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中国人民深深感谢阿尔巴尼亚人民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加强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友谊，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完全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深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今后共同斗争中，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衷心地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胜利。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1月28日于北京

关于资本家下放问题的批语[1]

（1960年11月29日）

恩来同志：

第四、第五、第六页请看一下，资本家下放农村很紧张，似以下放城市企业为好，如何，请酌定。童少生的意见似可考虑。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九日五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1960年11月25日编印的一期内部刊物上。这期刊物的第四、第五页刊载《北京市资产阶级分子对精简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普遍感到紧张、恐慌》一文。文章说，北京市资产阶级分子对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不仅中下层有震动，而且上层也有震动。有的上层人士说："现在真是紧张得不得了，我是衷心地跟着共产党走，但越来越感到困难。"东城区工商联负责人说：我实在过不了这三关，一是劳动关，二是个人主义关，三是生活方式关。在中下层，由于下放的可能性更大，有的感到前途茫茫，有的心情紧张，精神恍惚，甚至有咒骂共产党的。近来装病请假、领取定息、吃团圆饭、抢购商品的人有所增加。这期刊物的第六页刊载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童少生对私方人员下放的若干具体建议。建议说，私方人员的下放可采用几种办法，第一种是采用现在干部下放的办法，由国家机关管起来。他们在公社劳动，虽然工资领得多，但不直接在公社拿，公社不会有意见，这些下去的人保持了原薪，也可以安心。第二种是下放到工矿，等于从一个工业区调到另一个工业区，这没有什么问题。第三种是采用重庆的办法，把年老的集中起来搞农场，干部或年轻的轮流下去。第四种是采用在原系统或原单位搞蔬菜基地的办法，工资仍在原单位领取。

河南党外人士反映一条[1]，可以看看。

[1] 指这期内部刊物上刊载的《河南一些党外人士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一文。文章说，河南一些党外人士阅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政协曾经组织他们进行座谈。座谈中，一般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政策，有人认为这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对症良药。不少人相信中央的政策贯彻下去后，农村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农业问题可望得到解决。他们都表示，向他们传达党内文件，让他们全面了解农村问题，是党对他们的信任，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因而很受感动。在学习中，还有人谈到，这次“中央是以纠正偏差来刺激生产积极性”，这个指示“对于稳定生产情绪会起很大作用”，过去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也有人认为“底下干部闹得太不像话啦”，“不整也不行啦”。

1960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

196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黎笋。

1960年12月，毛泽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志清亲切握手。

1960年12月，毛泽东和胡志明观看中国文化部举行的欢迎胡志明及越南代表团的演出。

1960年12月，毛泽东、胡志明和演员们握手。

给黄炎培[1]的信

（1960年12月5日）

任之先生：

惠书收读，甚谢！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回去后对法新社记者讲了一篇话，叙述我规劝他不杀俘虏的政策[2]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力。这篇谈话登在不久前出版的《参考资料》[3]上，现在找不到了。现在找到十二月三日下午版《参考资料》第41页[4]寄上。美国刊物上所载的这些话，就是阿巴斯总理对法国记者所说的，可以一阅。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参见《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

[3] 这篇谈话登在新华通讯社1960年11月22日下午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九七四期上，题为《法〈快报〉记者评述阿巴斯对他谈毛主席的谈话》。

[4] 此页刊载了新华通讯社1960年11月12日发自日内瓦的电讯稿《美〈民族〉周刊注意毛主席对阿巴斯谈俘虏政策》。其中说到，美国《民族》周刊本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恐怖的手段和效果》，摘要如下：阿尔及利亚

战争打破了这样的幻想——酷刑已经随着宗教裁判而过去了。在这个可怕的战争中，阿尔及利亚人擅长使用暗杀手段，而法国人则使用酷刑，但都没有收到效果。在过去一两个星期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受到极其不同的两方面人士的劝告。巴黎大主教和法国军队的副主教发表了一封教书，谈到了罗马天主教在这方面的责任。毛泽东在阿巴斯访问北京时对阿巴斯发表的父辈般的谈话补充了这位红衣主教反对军事上使用残酷手段的说教。据突尼斯《行动》报报道，毛先生对阿巴斯先生说，在对日本和对国民党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杀过一个俘虏。毛的忠告是值得深思的，虽然它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忠告。

《红旗》编辑部给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的信[1]

（1960年12月6日）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2]，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3]，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6日

---

[1] 这封信是毛泽东于1960年11月28日写的。12月6日，他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信中个别地方也相应作了修改。

[2] 这篇文章是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

员会写的，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文章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利用旧机床部件、汽车变速箱、工字钢和钢轨等，根据具体加工对象，拼凑成各种积木式的活动机床，解决了小厂不能制造大设备的困难，使工厂产值跃增了7倍。对于这一经验，我们专业的师生连续两年进行了研究、总结和提高。机床是用来切削加工的机器，存在着切削刀具与工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着机床的发展和变化，无论车、铣、钻、刨、磨床等，都是如此。一般地说，在这一矛盾中，工件系统经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转向刀具系统。在一般大型机床中，工件越大，机床也就越大。积木式机床抓住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工件系统与刀具系统分开，使之固定在地面上不动，省去了工件运动的部分，这样刀具系统就不受工件大小的影响，小机床也能干大活，解决了缺少大机床的困难。由此可见，积木式机床是符合机床发展规律的，它使加工大型零件机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工件系统转化到刀具系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主要是：(1) 根据对切削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条件。(2) 精密、特种机床和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联系起来，设计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以在普通机床厂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3) 进一步研究“以小干大”的积木式机床对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具有很大意义。(4) 许多新的加工方法，由于在加工的同时也改变工件的性能，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5) 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机器。(6) 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在科研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红旗》杂志1960年第二十四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3] 《红旗》杂志1961年第九、第十期合刊发表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教师集体讨论、侯镇冰等人执笔写成的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

1960年12月9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归来。

转发《代食品会议情况反映》的批语

（1960年12月12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你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虽然已过去一个月了，但是仍然有用。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1960年11月12日整理的关于代食品会议情况的材料。其要点是：（一）各地代表一致认为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明确了推广代食品的方针、政策，解决了很大问题。有的说，过去对粮食、蔬菜只重视数量，没有强调质量，只考虑如何用代食品填饱肚子，现在才懂得还要注意营养。今后要根据每种作物的不同养分来安排生产，为此要求科研部门提供各种作物所含养分的资料。（二）对于大搞代食品，各地劲头很大，一些干部已打电话回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三）关于如何开展推广工作问题，各地都进行了讨论，打算建立机构，安排劳力，做好生产计划，进行技术培训。（四）大家一致认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做好思想工作，改变群众对菌类的看法，同时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0年12月14日、21日）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960年10月20日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草案中说，9月14日至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作出如下决议：（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三）大兴“三八”作风；（四）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反对不良倾向；（五）思想工作要着重抓活的思想；（六）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七）加强青年工作；（八）政治指导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九）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十）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十一）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民兵工作；（十二）加强党委对部队政治思想的领导；（十三）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十四）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2] 本篇一是为审阅、印发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1960年10月20日）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对这一决议草案的修改，本篇四是对这一决议修正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篇五是在这一决议修正稿中加写的文字；本篇六是在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2月21日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

刘、朱、周、邓、彭[1]各同志：

此件经过修改，修改处并已征得军委及总政方面几个同志（罗、肖、刘志坚[2]）的同意，现送上，请审阅。希望在十天左右时间内阅完，交尚昆[3]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先发军事系统。文件虽长，但不难读。修改是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的一个小组进行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二

会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肖，指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就仍然存在。

三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

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好好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用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五

民兵必须注意成分的纯洁。民兵必须放在可靠的党员干部的领导之下。

六

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

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部署报告的批语

（1960年12月22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湖南省委1960年12月18日报告[1]一件，供你们参考。

中央

1960年12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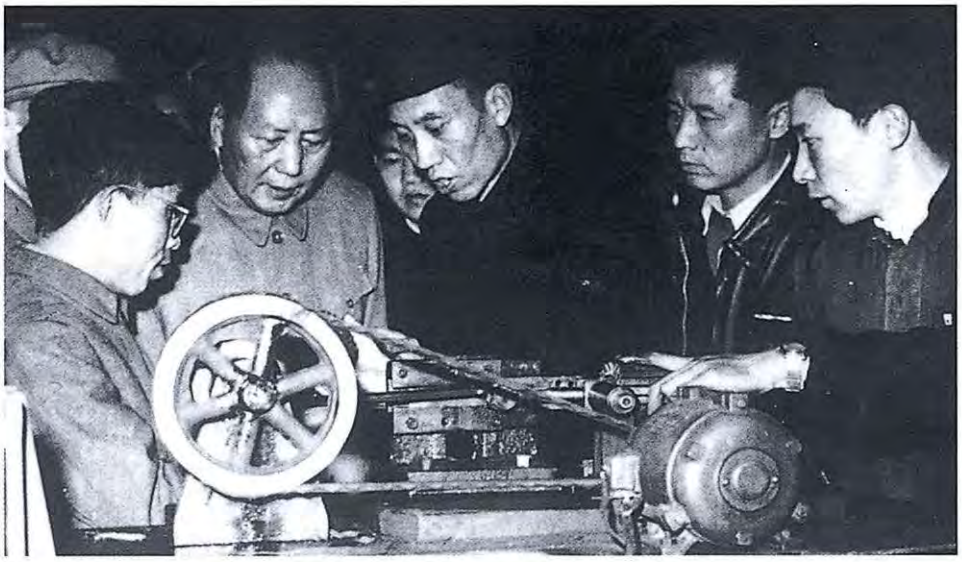
---

[1]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我们准备在明年春耕大忙之前，从根本上把目前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彻底扭转过来。办法是坚决采取湖北省通海口公社的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期分批，由点到面。先搞情况严重的社队，再搞问题较多的社队。全省计划分三批铺开。已从11月初开始试点，大部分可在12月下旬告一段落。这批试点对后面两批的工作关系极大，我们要求不得潦草结束，一定要扎实搞好。与此同时，各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彻底解决领导上的问题。明年1月初可铺开第二批试点，1个月后，再铺开第三批。在集中力量搞点的同时，面上的工作由公社党委召开作业组组长即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来解决。对中央十二条指示，凡公社力所能及的，都要作出具体规定，贯彻执行。搞好这次运动的另一个关键，是整社工作队的干部不仅数量要大，而且质量要好，带队骨干的政治水平和理解能力一定要高于现有公社书记的水平。因此在组织整社队伍时，应对现有工作队进行认真的整顿。

二

刘、邓、彭真[1]阅后，交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到中央会议[3]各同志。不发西藏。

毛



1960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汽车电器厂视察。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印发关于河北省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简报[1]的批语

（1960年12月23日）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河北工作组关于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的简报，题为《鲜明的对照》，载于中央办公厅1960年12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六六四号。简报说，最近我们在河北省唐山市着重考察了丰润县王官营公社、玉田县沙流河公社和亮甲店公社。这三个公社两年来同样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但由于对党的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中王官营公社地处丘陵山区，土地瘠薄，水利条件不好，两年来却保持了连续跃进，年年增产，生活安排好，群众情绪高，劳力外流很少。这主要是他们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一）坚持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二）劳力安排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三）大种高产作物和广种多收；（四）公社干部作风踏实，联系群众好，头脑比较清醒，不乱出新花样。沙流河公社自然条件比王官营公社好得多，粮食产量原来也高。但从1958年起，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这种现象主要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造成的。直至最近，他们对于错误还不敢大胆揭露，采取隐瞒态度，党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至今未和群众见面。亮甲店公社土质肥沃，地势低洼，去年遭受严重水灾，估产过高，购了过头粮；干部作风恶劣，乱搞反瞒产，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今年3月，他们在一部分队进行“三反”，初步改变了干部作风，纯洁了组织，比较认真地解决了一平二调的问题。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丰收，人均产粮近800斤。目前群众情绪已安定下来，外流人口也纷纷回来了。以上三个公社的事实，证明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一

各位同志：

此件请你们迅速一看，并加以讨论。全国的情形，我看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好的、坏的、中等的三类。此件可以一直发到公社，请你们办理。

毛泽东

1960年12月23日于北京

二

伯达[1]即阅，送尚昆[2]印发到会各同志[3]。

---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谭震林关于粮食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0年12月23日）

印发各同志[2]，研究、讨论，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60年12月23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1960年12月1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谭震林的报告说，今年粮食总产量估计为3700亿斤，或者略多一点，入仓量估计为3200亿至3300亿斤，全部统计好要到明年1月底。由于事前认识不足，在10月底以前吃粮指标还没有完全落实，前松后紧现象严重，农村口粮都很低，城市统销标准和出口也无法再压。根据这种情况，目前农村工作除认真做好整风整社工作外，首先必须抓紧粮食入仓工作；第二，要抓紧安排生活，认真办好食堂；第三，要认真做到最近3个月少吃，才能保证明年春季不发生闹粮事件。鉴于今年的经验，明年必须采取前紧后松的办法，夏收一开始就抓紧过秤入仓，计划用粮，采取低标准、瓜菜代、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政策。争取明年丰收是一件大事，要达到比今年多收是完全可能的。明年农村口粮必须控制在每人每天1斤，城市统销每月42亿斤，这个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在批示印发时，毛泽东将谭震林的报告拟题为《粮的情况和用粮计划》。

[2] 指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1]

（1960年12月24日）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

[1] 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毛泽东等祝贺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12月24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德两国所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它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两国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友谊而努力。

祝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2月24日于北京

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当前市场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60年12月25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

[1] 中共陕西省委给西北局并报中央的这个报告说，目前我省市场总的形势很好，但许多主要商品的货源供应比较紧张，与群众需要尚有很大差距，如不及时解决，市场可能发生波动。为此，省委已成立市场领导小组，通盘布置，分批解决。当前突击抓，平时定期抓，个别问题随时抓，至少每月抓一次。对当前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商品，省委已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等特殊措施，分别予以解决；对缺门商品和明年上海等三大城市对我省减少或停止供应的商品，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抓商品生产，力争逐步达到自给，所需原料纳入国家计划，由各主管部门负责供应。小商品生产实行五定办法，并以产品定厂名。农副产品的生产，特别是棉、油、烟、糖等经济作物和蔬菜，由农业部门安排好明年生产计划，任务落实到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当前正在抓紧农产品和野生植物的采收，以增加货源；同时大抓商品分配，依靠群众做好供应工作，坚决反对私分商品、随便照顾、自立规章和商品供应“走后门”；迅速恢复农业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原料就地加工，节约运力。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应加强修理服务。同时要广泛开展经济工作宣传，号召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支援国家建设，争取我省市场情况的好转。

发去陕西省委1960年12月22日关于抓紧解决市场问题的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请各省、市、区党委在市场方面，仿照陕西的办法，切实抓紧解决。

中央

1960年12月25日

二

刘、邓、彭真、先念[1]、周总理阅后，尚昆[2]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到会各同志[3]。

毛泽东

廿五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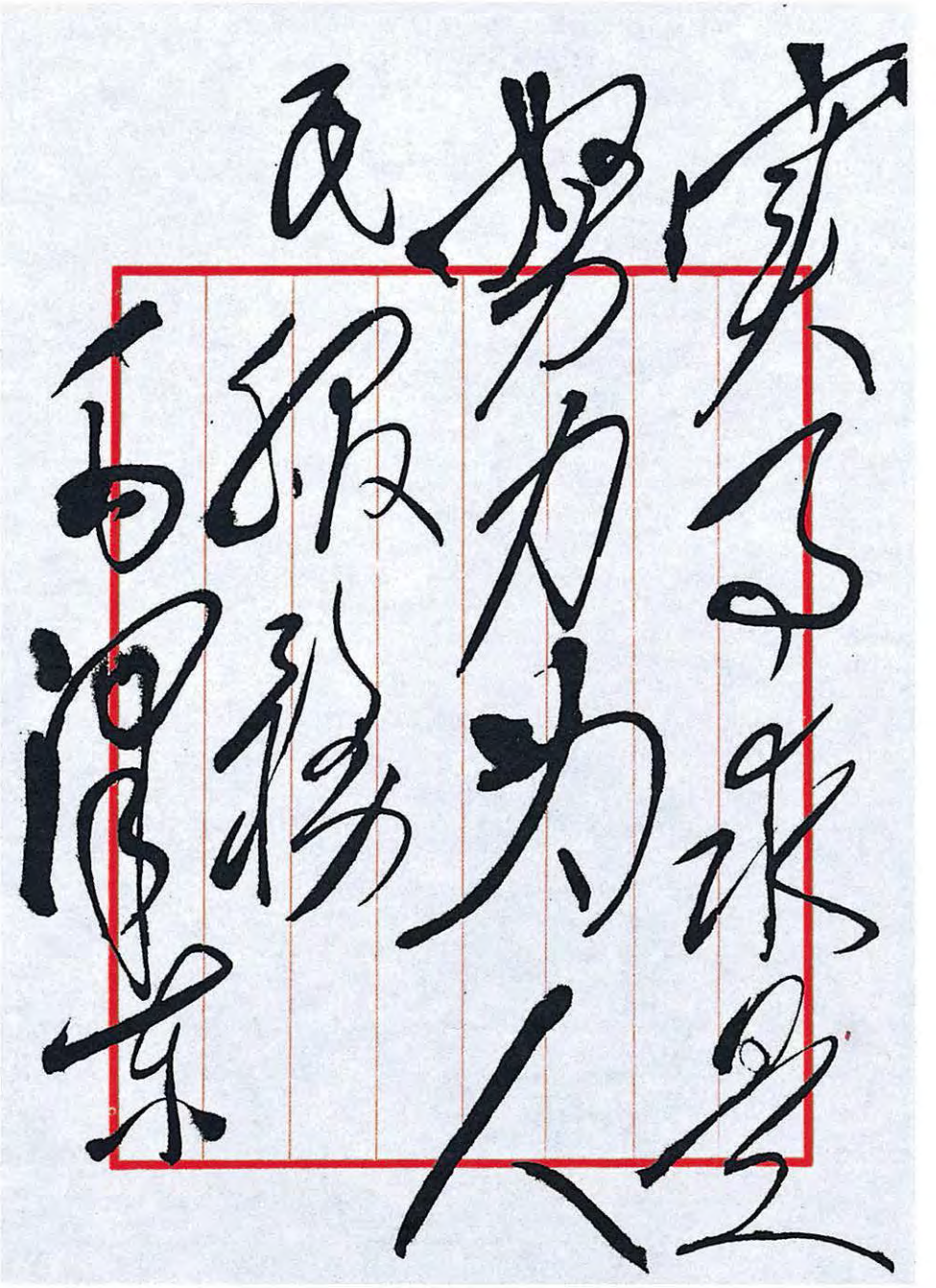
为杨颖[1]题词

（1960年12月25日）

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1] 杨颖，当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处长。



毛泽东为杨颖的题词。

要结合实际总结革命战争经验[1]

（1960年12月25日）

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2]。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还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

[1] 这是毛泽东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2] 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们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诬为“江西罗明路线”，遭到错误斗争。

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1]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能睡觉。准备了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

[1]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

（1960年12月26日）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1]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2]，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

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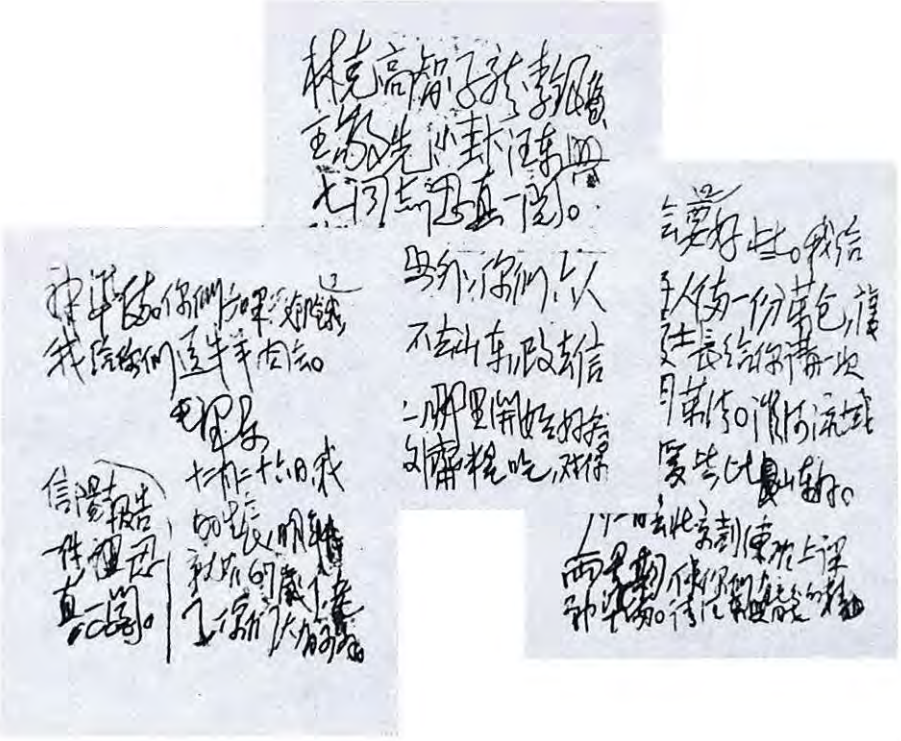
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子龙，即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李银桥，当时任毛泽东的卫士长。王敬先，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小封，指封耀松，当时是毛泽东的卫士。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 后来中共河南省委安排林克等6人去了许昌专区。

信阳报告[1]一件，认真一阅。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生日。在纷至沓来的灾情面前，毛泽东心里惦念着劳动群众。这天，他写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派他们下去调查，以求了解真实情况。图为该信的手稿。

[1]　指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印发人民来信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的批语

（1960年12月28日）

此件[1]印发各同志[2]。信内所提问题，请各组予以讨论。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0年12月17日整理的材料。材料中说，自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后，我们陆续收到各地的有关来信40多件。这些来信一致对中央指示信表示了极大的拥护，认为完全反映了农民当前的希望和要求。由于政策深入人心，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来信还提出以下问题：一、对政策能否兑现尚有怀疑。二、对指示信中规定超产主要奖现金不感兴趣，要求奖实物。三、对增产增购有意见，要求定产定购。此外，个别来信还提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大，不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私养猪没有时间，农村干部要求实行休假制度等问题。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文的批语[1]

（1960年12月30日）

此件印发各同志[2]。锦州的经验很好，可在各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中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60年12月26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一三期上刊载的这篇文章说，辽宁省委工业部10月24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辽宁省从五六月份以来，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闹粮的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闹粮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取这一办法的单位，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四〇一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省委10月30日转发这一报告时指出，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办法在于深透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树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同时在干部中狠反右倾畏难情绪。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

（1960年12月30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1961年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新年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进一步强大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进一步削弱的一年。刚结束不久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深信，在新的一年里，各国人民必将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过去的一年，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世界强大和平堡垒的苏联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苏联人民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都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一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

好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不久以前，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久经考验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衷心地预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更为光辉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祝全体苏联人民新年快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2月30日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

印发关于美、英、苏农业劳动力负担情况资料的批语

（1960年12月30日）

一

印发各同志[1]阅。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二

陈伯达同志交来的参考资料[2]，他说未经详细研究。

---

[1]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摘抄的这份资料，内容如下：（一）1958年，美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30个人消费的农产品。（二）同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供应了全国需要农产品的50%，平均每个劳动力要供应26.7人的消费。（三）同年，苏联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6.4人的消费。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

（1960年12月30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

---

[1] 这是毛泽东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主要内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

[2] 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12条。

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1]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

---

[1]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1]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2]，十四句话[3]，也搞了六条指示[4]，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

---

[1] 李世民，即唐太宗（599—649），626年至649年在位。

[2] 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3] 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3月5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

[4]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1]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2]，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

---

[1] 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错误地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之后，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做的错误结论也得到纠正。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郑州会议记录》。

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1]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0年12月31日、1961年1月1日）

一

发给各同志[3]。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

刘、周、朱、陈、邓、彭真[4]即阅，尚昆[5]印发。

三

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这三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

---

[1] 指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报告说，从12月8日至14日，我们先后召开了地委常委和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对今后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作了部署。（一）我区整风运动已普遍展开，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结合整风，广泛宣传贯彻了中央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普遍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安排群众生活，发放大批救济物资，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疾病的蔓延，开展多种经营，执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度，活跃集市贸易，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二）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 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 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 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4. 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5. 组织处理工作是体现政策和巩固斗争成果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6. 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7. 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三）对当前要做好的几项工作作了安排。

[2] 本篇一是对中共信阳地委报告写的批语，毛泽东为这个报告拟题：《一个重要文件》；本篇二是在中央1961年1月1日转发信阳地委情况报告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中央指示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毛岸青[1]的信

（1960年）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全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2]和她的妹妹少华[3]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4]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

[1] 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当时在大连治病。

[2] 思齐，即刘思齐，现名刘松林，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

[3] 少华，即张少华，现名邵华，1960年与毛岸青结婚。

[4] 娇娇，即李敏，毛泽东的女儿。

给林克[1]的信

（1960年）

林克同志：

冯契[2]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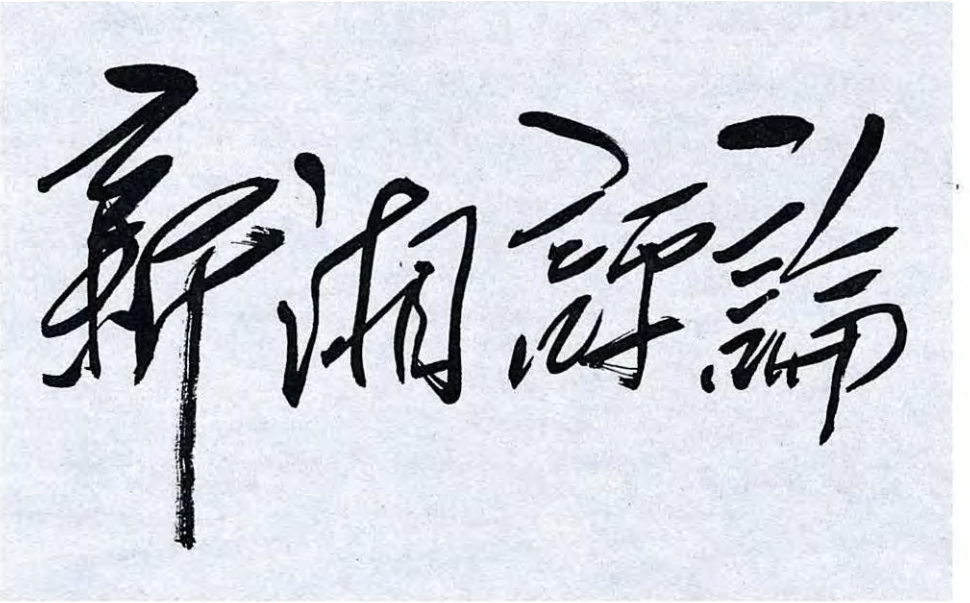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冯契，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为《新湘评论》题名[1]

（1960年）

新湘评论



毛泽东为《新湘评论》题写的刊名。

[1] 《新湘评论》是中共湖南省委主管主办的机关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毛泽东1960年亲笔题写《新湘评论》刊名。

请林克[1]查找现、战二韵所在声部的批语

（1960年）

林克同志：

现、战二韵，请你细心找一下，在去声。我找了老一会，不见，怪哉！或在上声也未可知。[2]

毛泽东

廿九日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现、战二韵，均在去声部。

1961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等对信阳问题批示的文件[1]的批语

（1961年1月5日）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南局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给各地委、郑州市委的指示。指示说，1月1日晚接到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北京电话传来毛主席对信阳地委报告的批示（见《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之一），又于2日早晨接到中南局对这一报告的批示，省委常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些批示对于指导我省正在开展着的整风整社运动，特别是对于第三类县、社、队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揭开盖子，迅速夺回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任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主席和中南局的指示，学习信阳地区的经验，进一步分析本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明确指导思想，不断进行分类站队，凡是属于被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县、社、队，一律采取信阳地区的办法，坚决地、迅速地夺回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补课搞彻底，绝不能有“夹生饭”。目前，我省的整风整社运动已经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全省局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为了加强对整风整社运动的具体领导，上级党的组织要具体地帮助下级党的组织分析情况，分类站队，分清问题性质，划清界限，正确贯彻政策，讲究策略步骤。凡是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盖子已经彻底揭开的地方，应当十分注意总结和传播经验，并且要不断地整顿和纯洁整风队伍，以提高队伍的政策思想水平，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政策和违法乱纪现象，必须及时地严肃处理，并且要以实际事例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改进作风。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一、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数日前已发给你们参考，谅已收到。

中央

1961年1月5日

二

刘、邓、彭[2]阅，尚昆[3]办，同时印发到会[4]各同志。

毛

---

[1] 指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1日批转了这个报告。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当时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1]

（1961年1月9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1961年1月8日关于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颁发？目前是在全国20%的县、社、队夺取政权的问题，是否缓一下再发为宜？（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

毛泽东

一月九日

关于推广锦州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经验的批语[1]

（1961年1月10日）

值得推广，但要注意解决一些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下面各

[1] 这是在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61年1月9日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上写的批语，毛泽东为批语和报告拟了一个题目《锦州经验是否值得推广?》。黄火青、周扬的报告说，锦州四〇一厂去年5月到7月，发生了职工闹粮问题。闹粮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心理紧张。造成心理紧张的原因有三：（一）城市副食品和蔬菜供应紧张；（二）这个工厂的职工家属绝大部分住在附近农村，农村粮食定量低，对职工有直接影响；（三）这一时期，工厂招收了七八百名盲流人员，这些人成分极其复杂，进厂后在工人中散布紧张情绪，扰乱了工厂秩序，引起工人不安。针对这种情况，厂领导于8月初，一方面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与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3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无计划用粮等问题，实行了民主管理，保证职工按计划吃够自己的定量，而且吃得较好。在上述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接着进行了调整粮食定量的工作，号召职工节约粮食，压低了部分职工超过标准的部分。现在的实际问题是：一、职工家属的定量低，对职工仍有很大影响，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家属工作。二、一部分由工人中新提拔的干部，因为变换工种，吃粮标准下降幅度过大，应该有所照顾。三、对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照顾不够。四、全厂还有20多个浮肿病人。

件[1]，印发各同志[2]研究。

毛泽东

一月十日

[1]　指周扬1961年1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和他随信向毛泽东报送的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1月3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上刊载的《目前学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情况》、中央宣传部1961年1月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二期上刊载的《从关心群众生活和耐心教育着手进行治安工作的一些好办法》。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

（1961年1月13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

[1] 这是毛泽东1961年1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

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1]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

[1] 指毛泽东1959年3月30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

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

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1年1月18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又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

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出了乱子的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上。

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二百四十亿斤粮食，硬说有四百五十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

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地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地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

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两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到一千九百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七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经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两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地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

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二十，好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一万个单位，烂掉了四百个，占百分之四，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一、二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

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图为悬挂八字方针标语的沈阳重型机器厂的车间。

给田家英[1]的信

（1961年1月20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2]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3]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一篇文章。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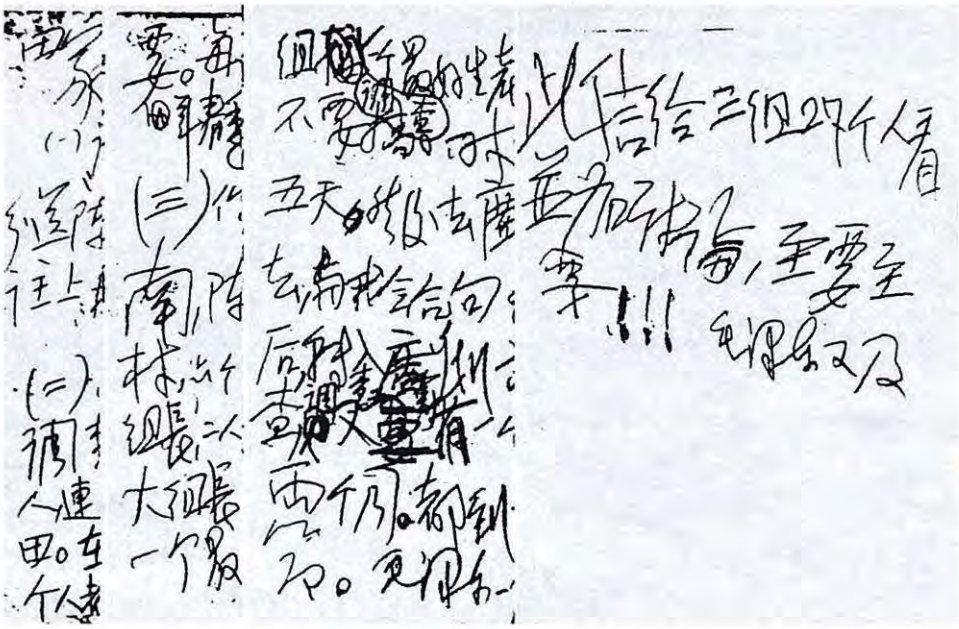
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致田家英信的手稿。

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1年1月20日）

一

剩下的两年都这样做。

二

即送乔木、冷西：

已阅，很好。即刻发稿，明日（廿一）在全国见报[2]。同时，

---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61年1月19日晚送审的公报稿中一段文字旁写的批语，这段文字是："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和提高的方针。"本篇二是在胡乔木、吴冷西1月20日送审的公报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在1月20日送审稿中加写的话。

[2] 1961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立刻翻成几种外文，今夜广播。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六时五十分

有一点修改[1]，请注意。

毛

又及

三

所有这些工作，全会认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

[1] 胡乔木、吴冷西1月20日的送审稿中写道："鉴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经在农村和城市的工作人员中进行整风运动，并且已经收到成效。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这一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把经过认真考查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极少数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防止和制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即本篇三。此外，毛泽东还在送审稿中"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一语前加了"以队为基础的"几个字。

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1]

（1961年1月23日、24日）

一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

[1] 《不怕鬼的故事》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一本小册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出版。1961年1月16日，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将他为该书写的序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处修改。本篇一、二、四、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六是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此外，毛泽东还将这篇序文的写作日期改为1961年1月23日。1月24日晨，何其芳将毛泽东的修改稿誊清打印后再次送审，毛泽东又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七。

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1]

二

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

三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

[1] 在何其芳1961年1月16日的送审稿中，这段话的原文是：“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小而至于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鬼类’。”第一次审阅时，毛泽东将文中的“大而至于帝国主义、反动派”改为“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国际修正主义，国内天灾、人祸，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复辟、篡夺地方政权和经济组织”。《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对这段话又作过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四

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精神上武装了全国人民，加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在今后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最后战胜国内反动阶级残余力量、争取建成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继续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同样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五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六

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

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0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1]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七

即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2]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3]。另请着手

[1]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3] 这篇序文后来分别载于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和1961年《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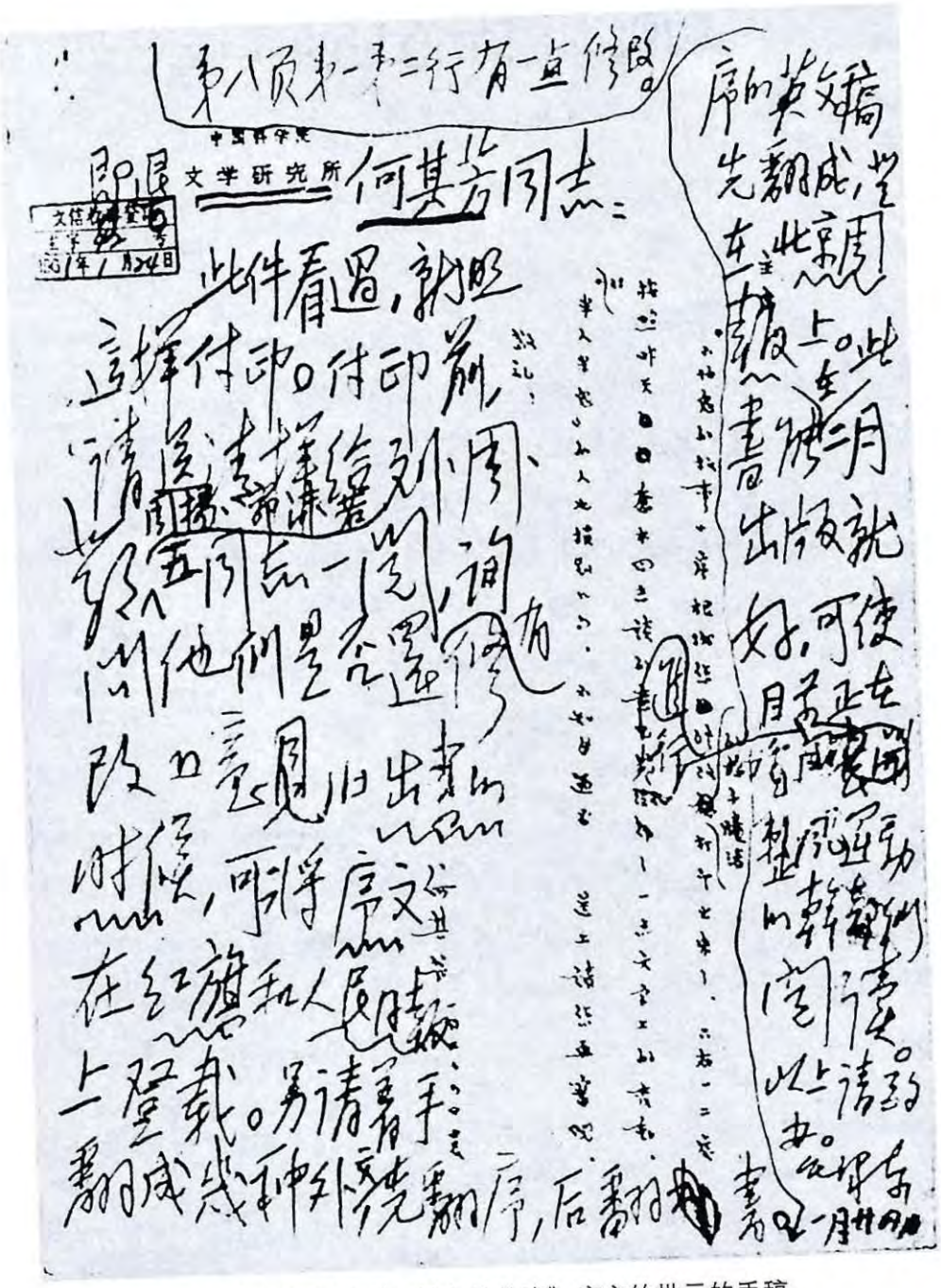
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1]。

[1] 这一次只是个别文字上的修改，1月23日对此处已作过修改，两次修改的综合，即本篇五。



毛泽东对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批示的手稿。

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1961年1月2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来了几个月了吧！到各地看了一看吗？

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称班禅）：去年国庆节前来到北京，参加了建国十一周年国庆典礼后，同李部长等去南方各地参观了两个月。

毛：看一看好。我们国家还有困难。这方面有成绩，那方面有缺点，总的很好。过去农业和轻工业方面差一点，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我们准备用两三年时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则采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和规格的方针。把薄弱门类补齐。在人民方面，连续三年大跃进，现在要搞劳逸结合。就像打仗一样，打了一次大仗以后，就需要休整一下。采取这些措施，估计有两年最多三年的时间把农业、轻工业提上去，情况就会好转。好起来并不是说农业就可以过关，农业过关至少得有十年左右或更多一点时间。苏联搞了四十三年，农业还没有过关。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有这个问题，粮食、棉花、油料及其他农产品不够。

你们那里才进行了平叛[1]和改革，基本上做得好，也发生了些

---

[1]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发动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17日，达赖喇嘛和一些主要叛乱分子逃往印度。19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很快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

毛病，不仅日喀则发生毛病，各地都有。毛病是“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在内地也是这样。

达赖[1]利用康巴人[2]搞叛乱，有从西康[3]、青海逃进西藏的几千万把人，他们以山南为根据地，后来同藏北黑河[4]等地叛匪南北两路打拉萨，目的是赶张国华[5]走路。逼得我们平叛嘛！

现在你们那里要纠正“左”的偏向。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

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真正实行赎买，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不要动不动开斗争会。北京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他们自己开会，自己讨论改造，是和风细雨地开会。这种会取个名字叫“神仙会”，是个好办法。

第三是宗教方面，听说你的意思是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留那么几千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这样看，过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2] 康巴人，指聚居在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在内的地区的藏族，又称康巴或康人。

[3]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4] 黑河，今那曲县。

[5]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去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间有十一万多人当喇嘛，养活不了，太多了，对发展生产和人口都不利。我还不清楚，过去十一万多人当喇嘛，是不是都念经？

班禅：不是的。寺庙喇嘛中，真正懂得宗教的，对佛学经典有研究的人，大都是中间阶层。寺庙上层喇嘛中很少有人真正研究经典，下层喇嘛是寺庙的奴隶，忙于支差干活，没有时间学经，有些连字也不识。下层喇嘛中有些人是为了避差当了喇嘛的，有些人是迫于生活而当了喇嘛，还有些是被派差当了喇嘛，比如有的地方一家有三个儿子，必须送一个去当喇嘛。派喇嘛差的情况，在大寺庙中比较少，小寺庙大部分都派喇嘛差。

毛：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比如你，在宗教方面是专长，如果不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和缺少一般知识，那你的领导工作就很难做。

班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给李部长谈过，专门学佛学经典的那批人，必须使他们学点政治、科学和文化知识。如果他们光学经典而不学政治和科学，完全钻到经典里去，因为这些经典本质上是唯心的东西，那末即使他们政治上不反动的话，也会自然地同革命对抗。

毛：佛学不可不学。我们办了个佛学院，两年毕业，专搞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再拿两年专门研究佛学。政治上好，在佛学方面却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我国现在有佛学学问的人，你当然是一个，其他除了喜饶嘉措[1]以外还有谁？很少吧？

---

[1] 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李维汉：还有阿旺嘉措、赵朴初[1]等几个人。

周恩来：喜饶嘉措去东南亚佛教国家访问，那些国家流传的是小乘佛教[2]，因他懂得小乘，同他们很说得来。

毛：西藏是大乘[3]，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4]，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释迦牟尼[5]讲的是什么经，是大乘吧？

班禅：释迦牟尼讲的经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的是小乘，中期讲的是大乘。

毛：《莲华经》和《金刚经》你们西藏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6]著的书还多吧？

班禅：有很多，传说他著的经典共有五百个大象驮的那样多，这可能有些夸大，不过他讲的经事实上是很多的。从梵文译成藏文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西藏的佛经，有从梵文译成汉文，而后从汉文译成藏文的，但是从汉文原著译成藏文的很少。藏文中有关于医学、算术等方面的不少的书，是从汉文译成藏文的。西藏也有《金刚经》，那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

毛：《金刚经》这一部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

[1] 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2] 小乘佛教，佛教派别之一。

[3] 大乘，即大乘佛教，佛教派别之一。

[4] 密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5] 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6]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班禅：佛经对于世界的看法，尽管它本身仍然是唯心的，但是同其他教派有很大的不同。

毛：刚才我讲的是务业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西藏像喜饶嘉措那样有学问的人不多吧！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三个问题。一、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二、对上层要安排好生活和职位，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三、宗教问题，有几千人学经，学政治和各种知识；同时使他们懂得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

第四个问题，反右必出“左”，不仅日喀则有，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纠正，必须纠正。斗错了的赔不是，有些坏人挑拨离间的，要处理坏人。比如你的父母，没有正式斗，有些群众到家里去搜查了，计晋美、拉敏[1]等人的家也搜查过，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应向他们赔不是。你们是爱国进步人士，从香日德起就同我们合作。那时我们的军队到了青海，你们怀疑，怕我们整你们，跑了，以后回来，我们合作了。没有解放军护送，你们也回不去。九世班禅就死在玉树。我们一起合作了这样久，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始终一致合作。请你代我问候你的父母、计晋美和拉敏，他们是好人，是爱国进步的。

---

[1]　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拉敏，即拉敏·益喜楚臣，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们信任你，信任和你一道做事的那些人。你们还怀疑不怀疑？

班禅：没有。

毛：可能还有一点，将来再看，你可以看事实，再看十年，看是真信任还是假信任。你们和达赖集团的历史不同，有很大区别。我们同你们没有打过仗，同达赖集团打了两仗。第一仗在昌都[1]，消灭了他们的主力。不久达赖跑到了亚东。以后订了协议[2]，达赖是很勉强的。他们派了两路代表，一路是阿沛[3]，由昌都到北京来，另一路在印度加尔各答时，尼赫鲁[4]不让来，他们也不想来。后来看到不行了，这才来了。阿沛是被我们说服了，他真正爱国，同我们合作。

第一次打的结果，是签订了十七条协议。第二仗就是平叛。他先打我们，想赶我们走，逼得我们没法子，不得不平叛。在那以前，我们想说服他，同时也知道他同印度的关系。那时在你们看来，会觉得我们信任达赖比信任你们还大，如决定不打第一枪、六年不改革。处在你的地位，是会那么想的。我们考虑到当时一百二

---

[1] 指昌都战役。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6月，中共中央确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的10项条件。西藏地方政府拒绝谈判，并将藏军2/3的兵力调集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人民解放军被迫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至24日结束，昌都获得解放。

[2]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3]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

[4]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十万人口中，信达赖的是绝大多数。前藏、后藏、昌都、康区[1]、阿里，还有青海、甘肃的一部分地区，群众对他有很大的迷信。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第一枪。不经过一个过程，没有法子，群众无法了解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他们先在康区，以后又在拉萨，几千人先打我们，我们才由被动转为主动，才进行平叛，才能在群众中说明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一九五五年由北京回去后就开始了。一九五七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一九五八年布置了两年。

这第二仗，你是参加了的，同我们合作打的。

第五个问题，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区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搞个条例。现在积极筹备选举，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全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

你们回去就筹备，先把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用选举的办法建立起来，以后就好选自治区的人民代表了。这样好不好？

班禅：好。

毛：第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我已经同张代表[2]，还有工委的一个副书记郭锡兰同志谈了。工委过去也有缺点，同你商量事情，你就那么满意吗？（对张经武说：整个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各方面的情况，

---

[1] 康区，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在内的地区。

[2] 张代表，指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

应使他充分了解。）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听说你有这个作风，很好。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工委给我们汇报说他们对你满意，觉得你讲真话。有时你同他们开个座谈会，把你的牢骚也发出来，双方一讲就通了。

前藏和昌都方面的事，过去你没有管，平叛前也不好管。现在我劝你要关心这两方面的事情，同这两方面的上层和劳动人民多联系，多了解情况，这样经过若干年，你的威信就可以建立起来。你进藏九年中，有七年不管前藏和昌都，从一九五九年起才管了，今后应该联系他们，熟悉情况。

我和在座的同志们都有这个经验，并不是人民一开始就信任我们，很长一个时期并不信任，干部也在看，看我们到底做坏事还是做好事。经过工作，大家觉得我们为人民服务还不错，慢慢地才信任和选择我们。我们年纪大了，你年轻，才二十几岁，很有希望，像是早上的太阳，我们是下午的太阳。我们在没有去见上帝以前，还有事可做，帮助你们做点事。唱戏要有老生，小生总比老生活跃得多。

我现在非常高兴，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话。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方面的人才。

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班禅：培养藏族干部问题，是很重要的，但西藏的人口太少了，今后还要更多的汉族干部去帮助。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

（1961年1月2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2]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以下简称黑）：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3]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4]运动，代表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

[2] 浅沼，指浅沼稻次郎。

[3] 岸信介，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日本内阁前首相。

[4] “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

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一九六〇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1]、三木[2]、高碕[3]、河

---

[1] 松村，指松村谦三（1883—1971），日本自由民主党前顾问、前众议员，1959年以后5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1962年9月访华时同中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

[2] 三木，指三木武夫（1907—1988），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1958年曾任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在对外关系上积极主张发展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3] 高碕，指高碕达之助（1885—1964），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20世纪60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日中贸易。

野[1]、石桥[2]，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非常有必要。

黑：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近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这很好。

黑：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

---

[1] 河野，指河野一郎（1898—1965），20世纪60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职。

[2] 石桥，指石桥湛山（1884—1973），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20世纪60年代初期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1972年12月他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1959年、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

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反对很有必要。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1]以前，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2]在广州领导

---

[1]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2] 黄兴（1874—1916），湖南善化二都（今属长沙县）人。1904年在长沙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与孙中山筹划成立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先后领导了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1]，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

---

[1] 造神派，是1905年至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他们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主张“改善”马克思主义，鼓吹创造一种“无神”的“社会主义”宗教，宣称只有宗教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1912年后，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造神派学说迅速破灭。

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1]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

---

[1] 南乡三郎，1955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1956年曾两次访问中国，1958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承志：现在还没有定。

毛：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

不管池田[1]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

---

[1] 池田，指池田勇人（1899—1965），1960年至1964年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向来访的巴西共产党和洪都拉斯共产党学习考察团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

对《光明日报》《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

（1961年2月15日）

一

好文章[1]。

---

[1] 指何明1961年2月11日在《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文章说："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先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带着框框下去，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看到、听到自己所要看、所要听的情况，把事情看走了样子。虚心，是非常要紧的；框框，是害人害事的。可是，指导原则和框框却是两回事。"文章联系中国哲学史上宋尹学派和荀子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不是框框。这是从实际抽出来而又经过实际证明了的真理，是'望远镜'，是'显微镜'，是解剖'麻雀'的解剖刀。但话还得说回来，不要只是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往客观事物头上硬套，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说，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而是自己造的框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要分清；不要带着框框，而要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去进行调查研究。"

二

陈伯达[1]同志：

何明[2]是谁？1957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3]，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4]、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晨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2] 何明，即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哲学史组组长。

[3] 可能指《光明日报》1957年8月10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4] 艾思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编辑。任继愈，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罗瑞卿[1]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考察报告[2]的批语

（1961年2月27日）

退林彪同志。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指罗瑞卿1961年2月10日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报告说，最近我在昆明、成都、重庆、武汉等地看了几个连队，并同一些团、师、军和大军区的负责干部谈了话，听了几个单位的汇报。现将一些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一）两忆三查运动，大多数单位已进入结束阶段，正在把运动落实到创造四好连队和争做五好战士的工作上。这次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比较好。运动的实际效果表明，两忆三查是毛泽东思想和部队实际结合的一个最好的活的教育方法，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式整军运动。（二）今年的军队整风，在基层主要是切实搞好创造四好连队的运动；机关整风，主要是在去年整得不彻底的单位进行补课。今年整风的重点应是民兵工作。（三）今年应当结合创造四好连队和继续培养三八作风，认真地抓一下连队管理工作。（四）军事训练部门应当重视和研究加强部队的锻炼问题，想方设法将我们军队的战斗经验和传统传给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应该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五）连队战士生活中也有些具体问题如洗澡、理发、做饭等，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六）干部家属问题，大体上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干部的家属在政治上、作风上存在严重问题，建议总政治部认真抓一下。

此件已阅，很好。建议每个军区派有能力的人去调查一两个连队，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如何，请酌。

这几天牙痛，谈话待过几天通知你。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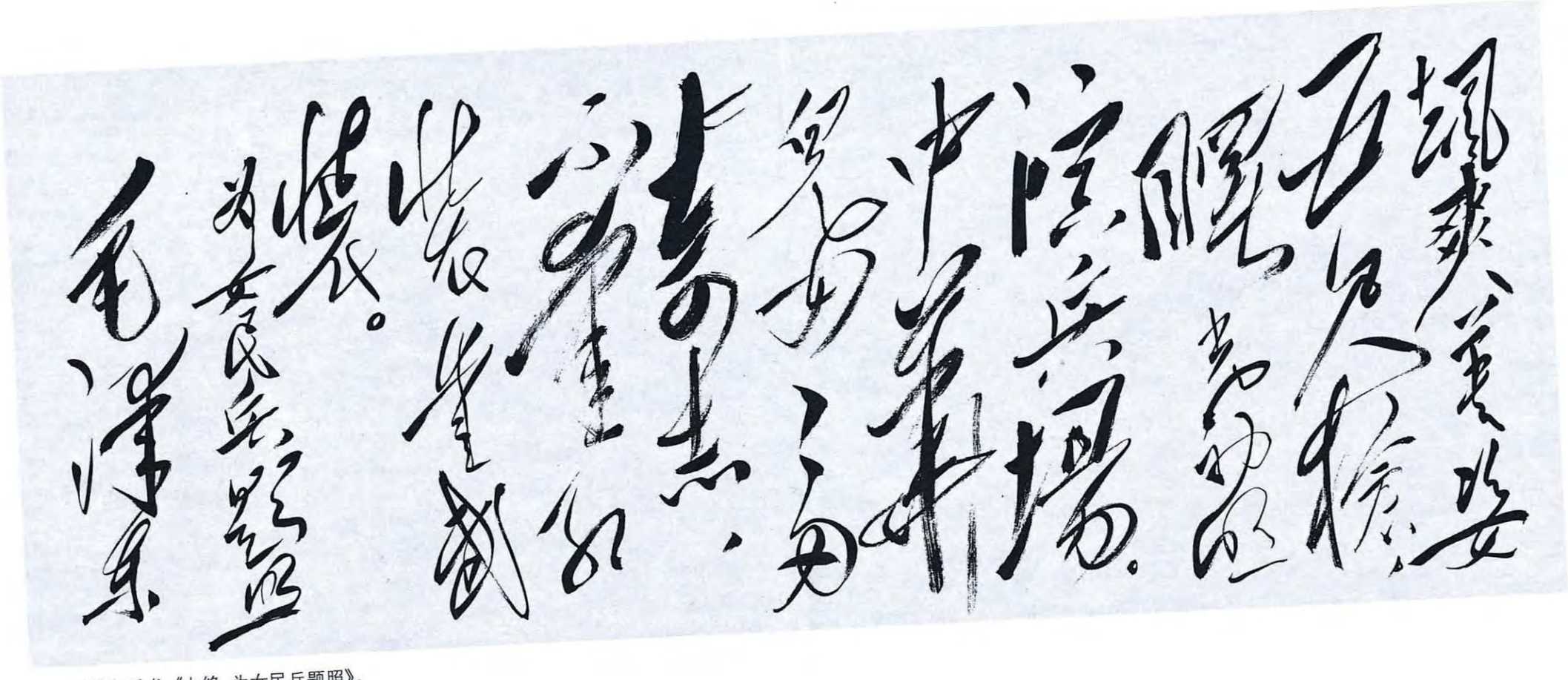
1961年2月，毛泽东和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1961年2月）

飒爽[1]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1] 飒爽，形容敏捷勇健。唐杜甫《丹青引》："英姿飒爽来酣战。"



毛泽东手书《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1961年3月5日）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但是接着在群众中间反右就坏事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但由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庐山会议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右，结果就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1961年3月5日)

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有二百多户，十一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因为是一个大队，所以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了。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把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八十几户，有三四个小队。过去二百多户的生产大队望不到边，这一头不知道那一头干什么，也很不好管理。现在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几个富队在一起，几个中等队在一起，几个穷队在一起。这样队与队之间经济情况都差不多，不发生拉平的问题。这是解决队与队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还有在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不要老是要下面报“账”不要发那么多文件

（1961年3月5日）

我们过去老是要下面报“账”，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后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发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边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想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文件不要批得过多。过去我也是个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比如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发了好不好？这都是多余的，每年有那么几个文件就行了。就像少奇同志批的纪登奎关于河南灵宝的经验那一类文件有一些就行了，不要多了。我就不信，每年发那么多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

公社划小不划小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

（1961年3月5日）

工业企业有大、中、小，太大了就不好管。农业不比工业，公社大了就更不好管。因为公社里男女老少都有，不像军队那样，有组织有纪律，还都是男的。

公社划小不划小，分不分，不要只听干部的意见，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有些干部肯定不愿意分，他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说什么没有房子，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有许多困难等等。我们只要得到了群众也就得到了干部。我们把生产指挥权下放有什么不好？如果按有些干部的意见，社员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也不能下放。那样，我们就得不到群众，就不能取信于民。

关于请朱德、陆定一[1]参加南三区会议[2]等问题的批语

（1961年3月10日）

一

陶铸[3]同志：

（一）请邀朱德、陆定一两同志参加我们的会；（二）陆定一同志在新会、花县两处参观后给我的信[4]，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三月十日早上

二

鲁言、田家英、陈、胡[5]阅，退毛。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

[3]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4]　指陆定一1961年2月27日关于参观新会县人民公社的情况和3月1日关于参观花县人民公社的情况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第一封信说，23日在新会县同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座谈，主要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农村工作在过去一直都是顺利的，农业是增产的，到了人民公社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问题。党向民说，人民公社以来，他感觉有三点不同：第一点，没有经过试点。过去，无论土改、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都经过试点，试点时很谨慎，规模小。试点本身就是对群众很好的宣传。群众看到新办法比老办法更有利于生产，就自然而然地赞成新办法了。而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过去那种试点过程，立即全面铺开，一哄而起。第二点，以前因为经过试点，中央规定的办法很具体。人民公社则不然，办法不具体，不细致，有的问题反复多次。第三点，过去管理制度规定得严密，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不严密。以上这些话，我认为是中肯的，它使我想到现在许多地方采取新的措施时，也务必稳妥一些，先试点，后推广。第二封信说，昨天去花县参观，才知道那里不仅3年来年年增产，而且全县6个公社，有3个公社坚持了以社有制为基础的试验。这种试验，近来很少听说了，但花县信心十足。看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一类的地区是一个极端，花县一类的地区又是一个极端。一个坏极，一个好极。花县虽然不大，但其成功将有极大意义，横扫那些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悲观情绪。

[5]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和批语

（1961年3月11日）

一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1]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2]。

毛泽东

1961年3月十一日

---

[1] 《调查工作》一文的石印本，最初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农民赖茂基于1957年2月捐献的，当时保存在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1958年11月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录在文物清单上。1959年8月，由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于1960年底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毛泽东阅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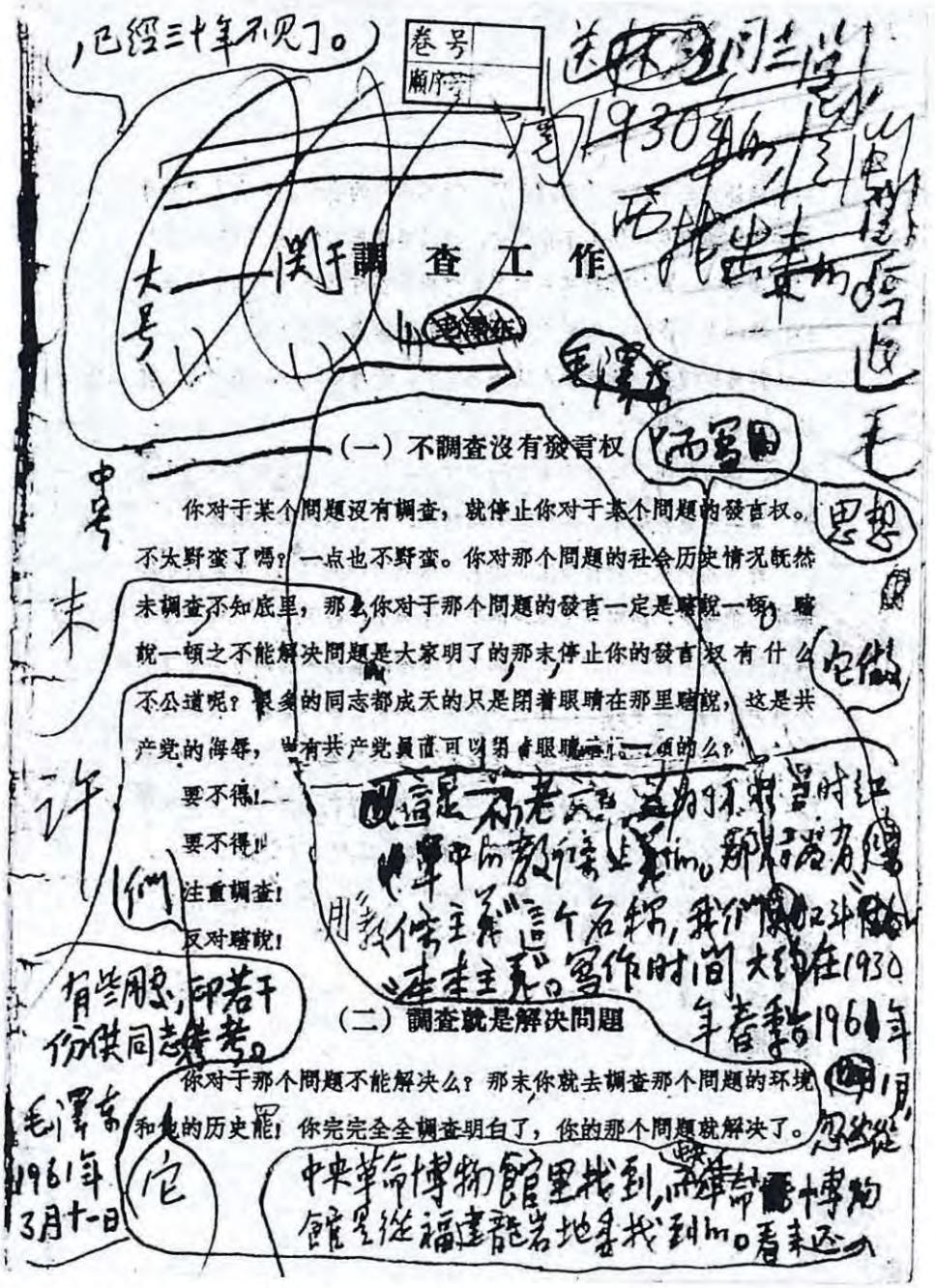
[2] 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确定为1930年5月。

二

送林彪[1]同志阅，1930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調查工作

（一）不調查沒有發言权

你对于某个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問題的發言权。不太野蛮了嗎？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問題的社会历史情况既然未調查不知底里，那么你对于那个問題的發言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决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很多的同志都成天的只是閉着眼睛在那里瞎說，这是共产党的侮辱，当有共产党員而可以閉着眼睛瞎說一頓的么？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調查！

反对瞎說！

（二）調查就是解决問題

你对于那个問題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調查那个問題的环境和它的历史罷！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的那个問題就解决了。

毛澤东修改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手稿（部分）。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1961年3月13日）

刘、周、陈、邓、彭[1]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2]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3]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北三区会议。

[3]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1]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2]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

[1] 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召集这三个地区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称南三区会议。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

（1961年3月13日）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2]，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南三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召开。

[2] 指《关于调查工作》。

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2]他们会后还要回

---

[1] 指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1]，武昌会议的决议[2]，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3]。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

---

[1]　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3]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

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一次座谈会记录[1]的批语

（1961年3月16日）

[1] 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记录。记录中说，3月14、15日，广东省委和北京来的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总支书记梁纪南、公社宣教委员苏品芳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一、社队规模问题。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座谈中，对于其他大队内各小队之间的贫富差别，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解决办法：（1）对富村的包产指标可以低些，使它能够多得超产奖励；（2）帮助穷村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3）中等村发展了生产，也能增加收入。他们认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理由是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济，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二、分配问题。过去搞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得食，因此可以考虑打破这个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这样就可以调动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三、食堂问题。他们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四、定征定购问题。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3年不变，能5年不变就更好。定征定购后，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储备粮，要逐步使队队、社社、县县都有储备粮，同时也要逐步使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储备。

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1]讨论。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一时

[1]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南海县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上调任务包干办法的批语[1]

（1961年3月16日）

印发各同志[2]。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上。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在整风整社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大队、生产队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仍有意见。生产好的队认为超产不能多吃，减产队也和自己一样按标准吃粮，这是“共产风”没有彻底反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沥西大队试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为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大队的生产面貌完全改观。

[2]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南三区会议[1]情况简报第三号的批语

（1961年3月17日）

此件[2]印发各同志[3]。此件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研究。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指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

[2] 指1961年3月13日编印的南三区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简报摘要登载了会议各组12日下午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的发言。其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指出：（一）从山东情况看，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有一个公社的示范章程性质的条例。（二）提议再搞一个党内文件，着重解决党内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以供领导掌握。（三）对目前农村形势需要加以分析，要使全党认清现在的形势，肯定中央十二条等政策完全正确，肯定几个月来整风抓对了，提高全党信心，只要继续抓下去，大有希望。目前领导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1）必须及早下决心把工业和各项事业过多的劳动力砍下去，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否则各项事业与农业关系摆不好，粮食问题无法解决。（2）坚决把许多权力，特别是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让他们对生产负责，发挥积极性，不能再瞎指挥了。（3）领导要真正吸取教训，特别

是一定要按照主席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我们为什么不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执行政策。党内生活不够健康，使下情不能上达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党内还有许多问题，如党政党社关系、干部民主作风、监察工作以及教育提高干部等，都要予以解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认为，为了把3年来人民公社的丰富经验加以比较系统的总结，搞两个文件比较好，一个是条例或示范章程，一个是党内指示。条例或章程除了肯定人民公社已有的正确经验，防止和克服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做法外，还可以参考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使之条例化。党内指示可以包括3个方面：1. 要大讲形势，大鼓干劲。2. 继续讲清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主要是讲农业与其他生产部门的关系，最好能够规定一定的具体的比例。3.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改进干部的作风，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学习等等。4. 全党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痛改不切实际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少犯或不犯错误。中南小组在讨论工作条例草案第三部分（生产大队问题）时，认为实行四固定“一般至少十年不变”这个规定太死了，可否改为“这一制度在相当的时期内不变”；包产问题最好规定包产的时间，可以一年一包，也可以两三年一包；对于如何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利用资源，合理使用劳力，放手经营多种零星副业，是一个极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在工作条例上要强调一下。

[3]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华东几个同志[1]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61年3月17日）

此件[2]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3]研究。讨论公社条例[4]问题时，请认真考虑这些意见。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谭启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2] 指南三区会议文件《华东几个同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内容如下：（一）组织规模问题。调整社、队规模，要

根据生产和收入水平、地理情况、原来的基础、群众自愿等条件，由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做到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调整以后，稳定一个时期，同所有制一样，至少7年不变，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队不宜过大，一般20户左右；生产大队一般维持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以相当于原来的乡为宜。（二）管理体制问题。公社要集中力量抓农业生产，商业、文教、卫生、金融、工业等工作，有些要收归县以上部门管理；公社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抓政策、方针，抓计划，抓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其他生产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活安排、技术措施等，主要由生产大队和小队当家，公社不能瞎指挥；要发扬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三大民主。（三）党政社关系问题。党的领导主要是抓好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经常性的全面安排，要实行以下的领导方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最基本的方法是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做出样子（典型示范）。（四）干部问题。应当认真选好、管好、教育好干部。公社、大队、队三级干部都要实行民主选举，要依靠领导考察和群众监督管好干部，要教育干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经营管理问题。要恢复高级社时期的一系列好的经营管理办法。群众的意见是：1. 生产管理权要交还生产队和小队，上面不要乱指挥。2. 选好当家人。高级社时期有些干部对经营管理有经验，以后被撤职，现在社员要求这些人再当干部。报告还列举了目前农村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其他几个问题：一、粮食征购要定下来，"三定"不定，人心不定。二、农村生产资料供应，国家不可能全包下来，应组织各县、社、队之间有计划地进行物资交流。三、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和农村非农业人口，争取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四、社有经济的管理应当建立一定的群众监督制度，一部分应当收归县管。

[3]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4]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

印发两份农村见闻材料的批语

（1961年3月18日）

印发各同志[1]。这两个材料[2]都可看。河北省的工作大有起色。但交河县太大了，九十多万人，应分为两个县。公社也太大，只有二十三个，四万多人一社，太大了。交河整风还未贯彻，12条[3]群众还不知道，应当加紧整社。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1年3月1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八十期上刊登的《杨放之同志谈农村见闻》和《河北省和北京郊区农村的新气象》两份材料。这两份材料反映了春节期间农村群众生活安排得好、群众生产情绪高的情况和目前农村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3]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

印发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经验[1]的批语

（1961年3月19日）

印发各同志。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1961年3月17日报送毛泽东的材料，题为《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四川省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的经验》。材料说，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区是一个收入水平较高的管理区，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2月份在这个管理区发动群众讨论了1960年决算分配的问题，提供群众讨论的3种分配方案是：(1) 只包老小两头，劳动力全部按劳分配；(2) 包老小两头，照顾困难户，其余劳动力实行小部分伙食供给；(3) 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实行小部分的伙食供给。讨论的结果，赞成第三种方案的人最多，占81.2%。理由是：(1) 可以解决10%的困难户的问题。(2) 劳动力强的可以多劳多得，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南充专区500多个公社中，实行第三种方案的公社最多，占76.84%。四川省委已经把火花公社的决算分配经验批转各县参考，指出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既要考虑当地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又要照顾绝大多数社员的意见。不论采取哪种方案，供给部分都不能超过三成。

印发《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1]的批语

（1961年3月19日）

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2]研究采纳。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报送的《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材料。这个材料说，在3月15、16日的小组会议上，东北的同志根据北三区会议期间东北小组的酝酿、讨论，对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办好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有一部分规模偏大，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不能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更充分的调动。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做好对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的调整工作。目前农村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如下：一、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调整的原则是有利于加强领导，发展生产，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增强团结，并照顾历史和自然条件。根据这一原则，公社大体上一乡一社，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二、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同意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适当扩大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三、分配问题。主要是克服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吃、多劳多得，适当缩小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公社最近几年内从基本核算单位少提或不提公积金。四、食堂问题。

积极办好，自愿参加，适当划小。五、公社财务问题。加强公社各级财务管理，建立和健全财会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六、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待遇问题。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助”，严格控制误工补工的范围。七、农村商业问题。恢复供销社组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办商业。八、农村手工业问题。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为农业生产服务。九、劳动力问题。继续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十、畜力问题。留够饲料，建立饲料基地，压缩一批城市畜力回农村。此外，还有农村运力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粮食定购问题、调整工农业产品差价问题、合理分配城乡人民公社生活资料问题、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增产问题、调整农业税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党组织问题等，一共是18个问题。

[2]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1]的批语

（1961年3月22日）

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1961年3月22日报送的一份关于农村分配问题的调查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河北省霸县堂二里一位贫农说，“别看现在出勤的不少，但不出活”，“主要因为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另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按劳分配就是好，多劳可以多得，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也不能叫困难户过不去，大伙也要帮助他们，劳力多的也不会干活不积极。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供给制是暗的帮助，好像是该着替他们干的。”二、广东省高鹤县环城公社云益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和工分带粮以后，只要在派工等方面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各户加以照顾，他们也不会超支。有一位贫农代表说：“实行三七开，不光劳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生产搞不好，供给部分再大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另一位贫农说：“口粮按人发，有些社员就不出工，实行了工分带粮，出勤的立即增多了。”高鹤县委的干部说：“我们作过调查，有80%的人要求供给与工资三七开，并实行工分带粮。”这份调查材料是由两位跟陈伯达一起来广东作调查的工作人员写的，他们来前还在河北调查过上述问题。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3月23日）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1]。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

[1]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

线[1]。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2]。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3]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4]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

---

[1] 1929年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会议开了3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2]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出了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

[3] 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4] 刘安恭（1899—1929），四川永川人。1929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

会搞翻的。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上。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1]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

[1] 《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1]，当时立三路线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2]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

---

[1]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2]　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

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

---

[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1955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176篇，毛泽东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1]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2]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3]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4]他们讲

---

[1]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

[2] 指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 指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4] 赫鲁晓夫（1894—1971），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

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1]上，凯丰[2]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

---

[1]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 凯丰，即何克全（1906—1955），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的修改[1]

（1961年3月23日）

一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二

请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

[1]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信是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起草的。本篇一是毛泽东为这一指示信加写的标题；本篇二是毛泽东为指示信确定的印发范围；本篇三是对指示信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毛泽东还将指示信的日期署为“1961年3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一指示。

三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在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1961年3月29日）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1年3月2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三期上转载的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材料（原载于山东省委办公厅3月17日编印的《农村工作情况》第五号）。这个材料说，最近，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了4次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会。在这几次座谈会上，县、社的同志都一致要求把目前的大县、大社划小。从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几年来之所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乱偷乱拿，小队不重视大田生产，社员生产不积极，不爱护耕畜、农具及公共财产，除了经营管理跟不上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目前的生产队，从形式上看权力很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计划、包产、分配等权力都在生产队的手里，但实际上劳力、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是由生产小队管理使用，各项生产任务是由小队承担，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也都取决于生产小队，所以生产小队才是真正的“实力派”。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就是直接的生产单位。在核算单位以下，设常年固定的只包工不包产的生产小队，不设包产单位。因此，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小高级社和大初级社，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核算单位和大包产单位。生产队的户数一般以五六十户为宜，生产小队一般以10户左右为宜。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应当实行地片、劳力固定，耕畜、农具也应固定给小队使用。

陶铸、陈伯达[1]同志：

你们一到，请即看此件。下午一时左右，我们谈话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上午四时

阅后退毛。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961年3月，毛泽东和陶铸、曾志在广州珠岛合影。

关于查找南宋几部诗文集的批语[1]

（1961年3月）

找南宋张元干[2]的《归来集》。

找南宋张孝祥[3]的于湖集、词。

找南宋洪皓[4]的诗文集。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61年3月17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一九八期增刊的封面上。

[2] 张元干，南宋初词人，著有《归来集》《芦川词》等。

[3] 张孝祥，号于湖居士，南宋豪放派词人，著有《于湖集》《于湖词》等。

[4] 洪皓，南宋初官吏，工诗词，著有《鄱阳集》《松漠纪闻》《帝王通要》等。

为《南宁晚报》题写报头[1]

（1961年3月）

南宁晚报

毛泽东为《南宁晚报》题写的报头。

[1] 《南宁晚报》由南宁日报社主办，创刊于1956年9月15日，创刊初名是《南宁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改名为《南宁日报》。1961年3月1日，中共南宁市委《南宁日报》改名为《南宁晚报》，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4月3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兄弟的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勤劳勇敢的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深信，在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基础上，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

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4月3日

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1]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的批语

（1961年4月11日）

汪东兴[2]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3]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4]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

---

[1]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此时随毛泽东在长沙。

[3]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

[4]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1]二同志。

毛泽东

1961年4月11日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印发胡乔木[1]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调查材料的批语

（1961年4月15日）

张平化[2]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3]一件及附文四件[4]，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5]各一份，送我20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4月15日上午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正在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3] 指胡乔木1961年4月14日为报送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等材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昨天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湘乡县，发现经

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该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对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的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发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进行。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看来，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湘潭。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4] 指胡乔木向毛泽东报送的4份材料：一、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我们和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一起，研究了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一个坚决要散的食堂。经过5个晚上的讨论，这个食堂在分散时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房屋、菜地、柴山、养猪、困难户等，都一一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我们认为，韶山公社解决旺冲生产队食堂问题的经验是好的，可以推广。二、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的情况简报。简报说，自中央调查组入社以来，全社各队层层召开了干部会、党团员积极分子会、社员会等，对农业六十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第20条，关于“三包一奖”制，包产指标一定要落实，要留有余地。社员对此积极拥护，但对超产实物奖励办法，持有不同意见。对于增产部分，一部分社员主张按倒四六分成，即生产队六成，大队和国家得四成，国家比大队要少得。大部分社员主张把产量包死，按今年三定任务加增产增购任务，若再多增产也不增购。（二）第26条和第27条，关于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好办法。（三）关于第33条，大家一致认为按劳分配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对供给与工资的比例问题，绝大部分社员赞成按三七

开分配。许多生产队提出，大队三七开，生产队全部按劳分配。（四）第34条，关于公共食堂，多数人不自愿办。我们认为，对于群众确实不自愿办的，应积极帮助做好分散工作，全面安排社员生活。三、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农业六十条与干部、群众见面后，杨家生产队召开了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马上散食堂。接着又开了社员会，经过讨论，从第二天起就正式分伙做饭。据干部和部分社员向我们反映，散食堂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第一，节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节省了烧柴。第五，社员用粮更加灵活，更加精打细算，能节约用粮。第六，为吃粮、吃菜而互相怀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来，真正是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为好。四、毛华初访问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材料说，4月1日，我回到曾在20多年前居住过的家乡东茅塘访问。乡亲们普遍反映，食堂办得不好，房子又挤又破，锅灶没有了，生活不如前几年了，山林破坏太严重。在访问中，大家对以下几个问题谈了看法：第一，食堂问题。大家主张目前仍维持全年指标到户，按月发粮，食堂煮饭，自己种菜，到插秧后再分伙。第二，养猪问题。大家认为只要每人有七厘到一分自留地，粮食到户，有细糠碎米，经过今年和明年，就会发展起来。第三，山林的管理问题。大家认为只要按高级社时的办法去管就能管好。具体做法是：山权属公家，包给私人培育管理。看来这个办法值得研究采纳。对树木，也可以研究一个包管、包培育、分成奖励的办法。

[5]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时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湖南帮助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报告的批语

（1961年4月15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西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1]一件发去，

---

[1] 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广州会议的指示精神和毛泽东1930年春《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非常恳切，语重心长，对大家教育极深。大家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几年来的工作，痛感过去对调查研究重视不够，做得很差。加强这一工作，在今天已不是坐而言的问题，重要的是起而行的问题。会议决定，西北局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西北局机关的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地轮流下去，书记处的大多数同志和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带领干部下去。目前，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农村，同时也要用一定的力量进行城市调查。调查的内容和力量，要按照全面规划、各有重点的原则进行统一组织。下去之前，认真地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强调调查研究工作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虚心向下级干部和群众学习。要密切结合当地的中心工作，在农村主要是结合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12条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贯彻执行，通过调查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着的两个平均主义和其他问题，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供你们参考。

中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小平[1]同志阅办。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和古巴文化代表团[1]的谈话

（1961年4月19日）

毛主席向古巴朋友们说：中国和古巴是两个友好的国家，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在一些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中，都有一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1] 指以古巴教育部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

给臧克家[1]的信

（1961年4月24日）

克家同志：

来信及附文收到。此事不忙，待我返京面谈再作决定为宜。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

祝健进！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杭州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给邓小平[1]的信

（1961年4月25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3]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4]，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

[3] 广州会议，指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4] “五风”，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1]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2]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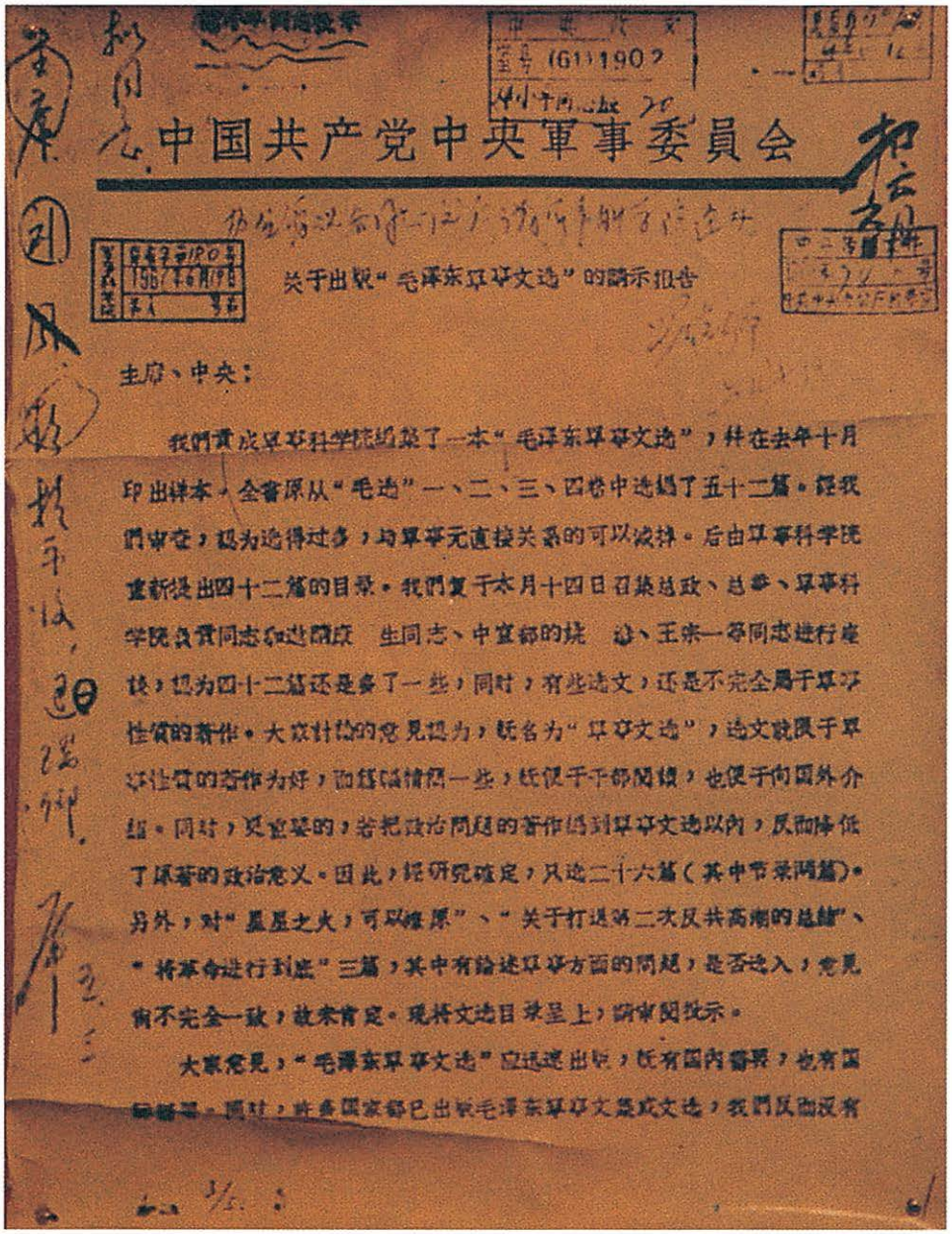
---

[1] 这次会议即后来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致邓小平信的手稿。

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交谈。



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員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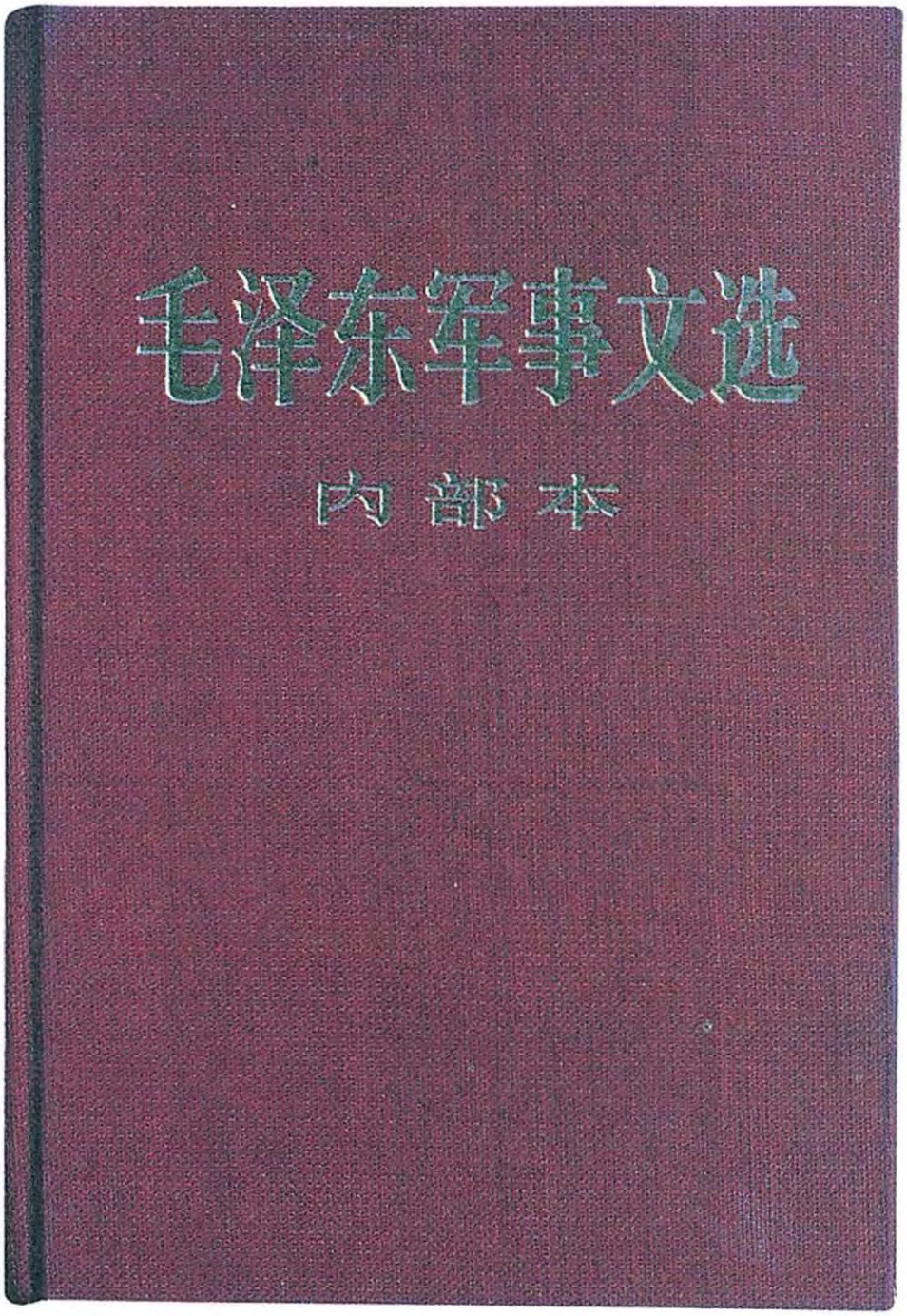
关于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的請示报告

主席、中央：

我們責成军事科学院編選了一本"毛泽东军事文选"，并在去年十月印出样本。全書原从"毛选"一、二、三、四卷中选编了五十二篇。經我們审查，認为选得过多，与军事无直接关系的可以删掉。后由军事科学院重新提出四十二篇的目录。我們复于本月十四日召集总政、总参、军事科学院負責同志和总政主任、生同志、中宣部的陆定一、王张一等同志进行座談，認为四十二篇还是多了一些，同时，有些选文，还是不完全属于军事性質的著作。大家共同的意見認为，既名为"军事文选"，选文就限于军事性質的著作为好，而篇幅精簡一些，既便于干部閱讀，也便于向国外介紹。同时，更重要的，若把政治問題的著作选到军事文选以内，反而降低了原著的政治意义。因此，經研究确定，只选二十六篇（其中节录两篇）。另外，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結"、"将革命进行到底"三篇，其中有論述军事方面的問題，是否选入，意見尚不完全一致，故未肯定。現将文选目录呈上，請审閱批示。

大家意見，"毛泽东军事文选"应迅速出版，既有国内需要，也有国际需要。同时，許多国家都已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集或文选，我們反而没有

1961年4月，毛泽东、邓小平对军事科学院关于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请示报告的批示。



军事科学院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1]

（1961年4月27日）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如阿拉伯国家，又如印度尼西亚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还未解决，越南附近的老挝斗争很尖锐，越南南部斗争也很尖锐，再就是南朝鲜最近有群众运动。所有这些斗争的性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又如日本，去年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艾森豪威尔想去日本访问，但没有去成，日本人民向他关门了。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海峡用打炮的方法欢迎他，他到台湾那天，我们的大炮开了一天。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美国霸占了台湾，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斗争中的国家。美帝国主义到处捣乱。但你们非洲那里目前捣乱的主要是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帝国主义。还有拉丁美洲，我最近见了古巴文化代表团，是在本月十九日。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就在那天，古巴把侵略者消灭了。你们知道这消息吗？古巴打了胜仗。拉丁美洲有两亿人口，你们非洲也有两亿人口，阿拉伯国家有八千万人口。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我听到有消息说，这次万隆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议上，要把亚非团结扩大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和几内亚、约旦、南非、塞内加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外宾的谈话。

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原来没有胜利的国家，如几内亚不是已经胜利了吗？非洲还有些国家已经胜利了，如阿联[1]原来是英国属地，它也独立了。在亚洲，印度尼西亚原来是荷兰殖民地，它也独立了。我们中国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现在独立了，但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只有九百万人口，而中国解放了的地方有六亿多人口。又如古巴已经独立了。古巴的情况很值得研究，它距美国那么近，只有一百八十公里，独立了两年多，真正动员了全国人民来驱逐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我国也是一个例子。中国革命单是武装斗争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打了二十二年。

中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又胜利，又失败，经过这些曲折，最后取得胜利。失败的时候是政策上犯了错误。我们党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就是同蒋介石合作的北伐战争遭到了失败。后来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武装斗争，但斗争中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叫它教条主义的错误，后来又批评了这种错误。没有这些错误和纠正错误，就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取得胜利。这些教训不仅是我们的，也可以供所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朋友们作为国际经验来研究参考。犯错误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比如人们生病，有些病菌会给他们免疫力，像肺结核，得过它以后，不会再犯；又如伤寒症也是这样，得了一次不再得。我们犯过右的、“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和人民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线。

---

[1] 阿联，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71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

帝国主义为非洲人民创造了斗争条件，创造了埋葬帝国主义的条件，创造了非洲人民独立自主的条件。如它使非洲人民中产生了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又如，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使一部分非洲人受到教育，这些人变成知识分子，我看你们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你们开办学校，本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培养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后来有些人走到革命一方面去了，发生了分化。拿中国来说，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培养的知识分子，有的跟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跑了，有的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先进分子，还有的是中间派。帝国主义迫使我们走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使你们掌握了语言工具。你们有的讲英语，有的讲法语，大体上就是讲这两种语言。这些语言已变成殖民地通用的了，也许你们非洲各地用本地语互相听不懂，但你们可以利用英文、法文。利用英文、法文团结起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帝国主义教育出反对它的人。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对此自己并不自觉。如我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时候，有许多人是在日本学习过的，他们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有许多将军是由日本军事学校出来的；还有些不是将军，是搞文化、政治工作的，如廖承志同志，他会讲日本语。现在日本情况不同了，已变成为战败国了，它被美国控制着。

我刚才说过，革命是可能胜利的。举了几内亚的例子，也举了

古巴的例子，还举了我国的例子，说明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几内亚民主党就是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杜尔总统是联系群众的领袖。人民觉悟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他们的觉悟不是一天所能提高的，要经过自己实践，得到了经验教训，才能有所提高。只要有领导核心，如有几内亚民主党及其他革命政党作为团结、宣传的核心，人民群众觉悟就会逐渐提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现在觉悟提高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已逐渐清楚。在早几年他们对美帝国主义认识还不够，现在也逐渐了解了。美国说它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殖民地。这一条看起来似乎有点像，它没有殖民地，可以拿来欺骗人，但它的殖民地实际上比英国、法国要广得多，或可称为半殖民地，如它用泛美组织[1]来控制拉丁美洲，用北大西洋集团[2]、中央条约组织[3]、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集团来控制广大的欧洲和亚洲，

---

[1] 泛美组织是由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1890年4月，1910年改称泛美联盟。1948年4月又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即受到美国的操纵和控制，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联合谴责美国的经济掠夺和贸易歧视政策，美国在该组织中的霸主地位日趋衰落。

[2] 这里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宣布成立。

[3] 这里指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英、美两国为控制中东地区和遏制苏联而筹组的军事集团，1955年11月根据《巴格达条约》成立。其成员国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1959年3月伊拉克正式宣布退出。随着成员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分歧的日益扩大，1979年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也相继宣布退出，同年9月28日该组织解散。

现在又利用联合国组织侵略非洲，如在刚果[1]。

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1] 刚果，今扎伊尔。

对杨朔《樱花雨》一文的批语[1]

（1961年4月）

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

[1] 《樱花雨》是著名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杨朔写的一篇旅日游记，载于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苏步青、谈家桢、陈望道、周谷城、周同庆、谭其骧、刘大杰、朱东润、卢于道9位复旦教授及上海各界代表。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劳动模范欢度五一劳动节。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陈望道、周谷城教授。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视察上海电机厂时和工人们在一起。

为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起草的通知和批语

（1961年5月4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

中央

1961年5月4日

[1]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

二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你与在京各同志商酌。如以为可，即用电报发出。

毛泽东

五月四日上午三时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本篇一。

对张平化[1]关于湖南工作来信的批语

（1961年5月5日）

小平同志：

此信[2]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五月工作会议[3]时，是否印发到会各同志，那时再定。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

毛泽东

五月五日，在上海。

---

[1]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张平化1961年4月14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信中说，主席4月11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半年来我省的整风整社运动有一定成效，但只在一些动手较早、领导较强的重点县做得比较好，大部分地区还不彻底，一部分地区甚至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做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3]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

给李井泉、陈正人[1]的信

（1961年5月6日）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2]，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

[1]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1961年4月25日通知中提出的关于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这些题目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转发周恩来关于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汇报的批语

（1961年5月7日）

此报[1]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上午四时四十分于上海

---

[1] 指周恩来1961年5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的记录稿。周恩来在汇报中说，我到邯郸已有5天了，5天中找了一些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谈话，开了座谈会，有4个问题需要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人力和畜力问题。

关于下连队调查极为有用
给林彪[1]的批语

（1961年5月7日）

徐业夫[2]同志：

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

毛泽东

1961年5月7日，在上海。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转发李井泉[1]关于粮食问题来信的批语

（1961年5月9日）

李井泉同志此信[2]，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9日上午2时，于上海。

---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李井泉1961年5月8日关于粮食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在南充、内江两地同干部、社员谈话和座谈时，听到的反映都比较强烈，主要是感到口粮标准低，要求增加口粮；按高级社时的分配办法，实行粮食三定；口粮按人口分配后，多余的粮食按劳动工分分配；及早宣布、固定国家征购任务。在我省两年来粮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个要求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也是合理的，这需要在小春分配中解决，以利于大春生产，争取今年的粮食丰收。我们对于粮食分配的原则是：大队统一掌握粮食，各级共同负责保管，按低标准供应，分期分批到户，超产队适当增加口粮，奖励粮按照工分分配。

转发胡乔木[1]关于湖南调查来信[2]的批语

（1961年5月9日）

胡乔木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9日上午3时，于上海。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胡乔木1961年5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们调查组最近同湖南省委一起，对农业六十条提出了初步的修改意见，准备再调查一下以前没有很多了解的商业和手工业问题。现将最近调查情况简要报告如下：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另一个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怕也难持久。对于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湖南省委对解决食堂问题决心很大，预计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5个公社作成立供销合作社的试点。原供销部的工作人员虽对由国家干部转为集体干部感到震动，但显著改变了对社员顾客的态度，马上到各生产队去征求意见。韶山供销社最近即可成立，属公社领导，独立核算。三、农村手工业问题。为了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恢复市场供应，中南局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建议各省都可以进行一些试点工作。四、

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农村。湘潭市委已就这个问题写了专题报告，省委准备在最近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要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我们在长沙还附带问了一些城市工商业调查和城市整风的情况。这方面确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

关于胡乔木[1]推迟返京、继续调查的批语

（1961年5月9日）

湖南省委转胡乔木同志：

你的信[2]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小平[3]同志：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

毛泽东

五月九日下午四时半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胡乔木1961年5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湖南省委转胡乔木同志：

你们信收到，很好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湖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小平同志、起草委员会同志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

毛泽东

五月九日下午四时半（一九六一年）

毛泽东致胡乔木、邓小平信的手稿。

1961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会见宋庆龄。

毛泽东和宋庆龄在一起。

《人民领袖与和平使者》（中国画）

转发邓小平、彭真[1]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

（1961年5月13日）

此信[2]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13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2] 指邓小平、彭真1961年5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及各县一个多月的调查情况来看，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农业六十条指示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许多措施还需要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一、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分调整完毕。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实行责任制，使农民心里有了底，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多数生产队赞成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对包产指标高的队，超产粮的征购比例也可以低于40%。征购后的余粮，应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

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三、关于供给制问题。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四、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问题。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的，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没有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一般都减了产。五、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自愿结合的。六、关于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牲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减少死亡，同时繁殖也会较快。七、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织生产。

给张平化[1]的信

（1961年5月14日）

此信[2]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

[1] 张平化（1907—2001），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张平化1961年5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情况。

转发李井泉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来信[1]的批语

（1961年5月15日）

[1] 指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问题，我们在南充县新民区结合整风进行了试点工作。这个区的供销合作社于1958年春同国营商业进行了合并，不久又将原来由小商贩组织起来的合作企业打乱合并，与国营商业统一核算，实际上过渡为国营商业性质。这些改变，在加强统一管理，增加国家部分收入，支援工业大跃进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阶级界限不清，部分物资城乡交流不畅，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等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消极因素。第一，国、合商业合并前，供销合作社指导集体经济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活动办法，如合同、奖励、留量、返还、民主评级、协商议价等减少了，更多地搬用了国营商业的计划调拨、统购、派购的工作方法，这就使某些干部更容易滋长强迫命令和不等价交换的恶劣作风和行为；在农产品采购中，估买估卖、压级压价、掠夺农民。第二，国、合商业合并前，供销合作社要定期召开社员代表会议，理、监事会议，报告工作，检查缺点。现在，这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也无形中废止了，削弱了群众对供销社购销业务工作的支持和监督。第三，小商贩合作企业性质改变后，在工资制度上，一般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固定工资制，这就助长了很大一部分小商贩的消极经营思想，使服务质量降低，小商品经营减少，影响城乡物资交流，甚至营业亏本。事实证明，这样做也是不能完全适应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国营经济与人民公社经济，发挥集体商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恢复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农村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情况，应加强对小商贩的利用改造，对小商贩的组织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一

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15日

另印发到会[1]各同志。

二

小平[2]阅后发。

用保密电话。

[1]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王任重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来信[1]的批语

（1961年5月15日）

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同志。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原件退毛。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已于4月26日结束。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感到思想解放了，苦闷消除了，心情舒畅了。地委书记们认为，过去上边规定的框框太多、太死，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同时也要求今后划几条大杠杠，使大家有所遵循，不致左右为难。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在会上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到会同志感到满意。从这次会议看来，湖南的主要问题是：第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是非界限不清，一部分好同志被打击，党内斗争中出现的偏向没有及时纠正，使得强迫命令的作风发展起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第二，对1959年粮食估产过高，征购、外调过多，导致农民口粮下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这也是1960年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

1960年生产上的瞎指挥，是造成农业减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四，1959年大办水利时缺乏必要的控制，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事先没有经过勘查设计，结果劳民伤财，没有用处。这次会议对几个重大政策问题作了决定：第一，粮食征购50亿斤稻谷，外调5亿至6亿斤大米。第二，农业税定为10%，超过的一律减下来。第三，生产大队从可分配部分抽出5%左右供给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全部按劳分配。第四，食堂绝大部分已经散伙了，只有少数地方还有农忙食堂。

1961年5月，毛泽东和航空兵二十四师主要领导合影。

转发阎红彦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1]的批语

（1961年5月16日）

一

阎红彦[2]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16日

二

小平[3]同志：

此信请你阅后，用保密电话发去，另印发到会[4]各同志。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下午三时

---

[1] 指阎红彦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3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3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2%至3%，最多不超过5%。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10%至15%。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很快。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2] 阎红彦，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蚌埠火车站和省、市负责人，警卫，接待人员合影。

196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蚌埠车站和乘务员亲切交谈。

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一文[1]的批语和修改[2]

（1961年5月28日、30日）

一

此件印发工作会议[3]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毛泽东

1961年5月28日

二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

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毛泽东

1961年5月30日

三

目前我们许多领导机关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派出调查组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是很好的。有些人过去没有做过调查工作，现在工作里出了很多毛病，在未经过派出的机关、党委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对政策、态度和方法等方面反复讲明，并有一个强有力的组长以前，出毛病、闹笑话、成灾难，一定是难免的。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1961年5月12日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材料说，我们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几位同志，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来该厂做调查工作的情况，发现去冬来厂做调研的，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今春来的却如雨后春笋。总的说来，这些调查组来厂后，一方面帮助领导了解了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也帮助工厂做了一些事情，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调查工作中，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1) 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 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 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 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 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 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 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 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 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

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真正做好，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镀一层好看的金颜色，因此每一个做调查研究的同志，都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以求真正了解一些实际情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报送这一调查材料给毛泽东写的报告中说：“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的队伍很大地扩大了，人员复杂，作风不纯，有些很好的事，在某些地方，某种场合，往往办成不好的事。”本篇一就写在田家英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个材料时，拟题为《调查成灾的一例》。

[2] 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毛泽东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在一起。

转发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1961年5月29日）

印发工作会议[1]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2]，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

毛泽东

五月二十九日

尚昆[3]办。

---

[1]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调查组1961年5月5日写的调查材料之四，题为《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材料说，我们会同省、市商业部门的同志，在海城牛庄公社和其他一部分社队，对农村商业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在这期间，鞍山市又召开了一次财贸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也反映了不少意见。一、关于农村商业体制问题：（1）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自1958年公社化以后，农村商业工作就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变成一条腿，由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一种所有制，农村的商品交易就由包括集市贸易在内

的三条渠道变成一条渠道。从最近两年多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国营商业部门实行统一牌价，价格不尽合理，影响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造成人为的紧张；基层商业部门面向群众，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及以前了；社员群众对于供销社的关系已经疏远，不关心、监督和支持了，供销社经营管理水平也因此而下降了。(2) 改变体制的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国营商业的性质不变，加上一条民主管理、群众监督。这是一部分基层商业工作人员提出的办法。第二种意见是国营商业吸收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加集体所有制的成分。这是商业部门一部分中层干部的想法。第三种意见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农民一致同意这种办法。看来，第三种意见是一种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3) 国营商业与集体商业要有适当的分工。分工应当以刺激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为原则。办法可以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4) 必须贯彻执行勤俭经商的原则。二、怎样把农村商业工作做活一点？解决体制问题是一个根本环节，在政策上作某些调整也很重要。大家反映的意见如下：第一，要求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以奖励生产。第二，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第三，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目前有一些农村手工业品的收购价格，甚至还没有原料费高。第四，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凡是农村需要而又能够生产的，一般应就地加工。办法是逐步把农村的油坊、豆腐坊、粉坊、酒坊恢复起来。第五，在某些商品的供应上，要求适当照顾农村的产妇、婴儿、病人和老人的特殊需要。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为报送这个材料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读了胡耀邦同志带领的调查组所写的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陈伯达的报告上。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的批语

（1961年6月1日）

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1]，印发工作会议[2]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3]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

1961年6月1日

---

[1] 指毛泽东1961年4月11日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来湖南帮助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汪东兴的信；张平化1961年4月14日关于湖南农村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1961年5月11日关于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的信中汇报了他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到的一些情况，并对社员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2]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 参见毛泽东1961年4月11日给汪东兴的信。信中讲到湖南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宣传画）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第二、三阶段日程安排的批语

（1961年6月3日、4日）

一

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工作会议『在』讨论调查等四个问题，早已过去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讨论粮食、六十条、手工业条例、山林条例、商业条例[1]等五个问题之后，还要讨论湖南工作的四封信[2]，调查组下

---

[1] 六十条，指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在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讨论和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于6月19日正式下发。手工业条例，指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6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一草案。山林条例，指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6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一草案。商业条例，指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6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一草案。

[2] 指毛泽东1961年6月1日批示印发的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

去要遵守长辛店支部戚本禹同志的十多十少问题所提出的意见[1]。这是第二阶段，大约七天（一号起）可以够了（要休息一天）。第三阶段以四天时间讨论城市问题。五月廿一日以来十几天时间的工作，讲一讲会取得了什么成绩，鼓足干劲，干下去。再就是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似以八月上旬为较好）庐山会议[2]的时间问题和题目问题（城市整风和工业两个问题），一天就够了。这样8号或9号就可以结束了。以上你们如果同意的话，就请通知各中央局同志转三大组各同志。

毛泽东

六月三日上午十时

二

同意这样安排[3]，十二号结束会议。

毛泽东

六月四日上午

---

[1] 指戚本禹1961年5月12日《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中提出的关于克服调查研究工作中“十多十少”问题的意见。

[2] 指后来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

[3] 1961年6月3日，邓小平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毛泽东转报如下建议：正在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七号结束第二阶段，十一号结束城市工作（要四天），十二号庐山会议等问题。故八、九号不能结束。如城市工作只讨论两天，则十号可以结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此外，他还将邓小平的建议拟题为“四号起，九天工作安排问题”。后来这次会议于6月12日闭幕。

对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工作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61年6月4日）

[1] 指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于1961年5月15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群众，使农民逐步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我们党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最近农村许多三类社队的出现，证明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同农民结合起来，在乡村中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很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为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训练一批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队伍，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今年高中毕业生约有15万人、初中毕业生约有120万人不能升学，从中挑选3万到5万人，从今年下半年起，举办“抗大”式的政治学校，加以短期训练，派到农村参加工作或参加劳动，对加强人民公社工作有很大好处。这是一项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必须在今后几年内，持续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对这项工作予以足够重视，并且采取积极的办法做好这项工作。6月3日，刘少奇将这个指示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如认为可用，请批告小平同志提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经讨论后，中共中央于1961年6月23日发出了这一指示。

小平[1]同志：

此件请提交工作会议[2]讨论一下，如得同意，即可发出。

毛泽东

六月四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对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稿等的批语和修改[1]

（1961年6月11日、17日）

一

即退田家英同志。两件都已看过，很好，请即送小平[2]同志照办。

毛

11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6月10日报送的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赵明、曾源1961年2月关于王国藩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调查材料的批语；本篇二是在田家英6月10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稿上所作的一处修改（用宋体字排印）；本篇三是在6月15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在6月15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修改稿上所作的一处修改（用宋体字排印）；本篇五是在1961年6月15日下发这一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上写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

半年多以来，全党同志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面貌，已经大大改变，或者说正在迅速改变。

三

退尚昆[1]即办。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四

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五

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1]，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教育〈时候〉了。

[1] 指中共中央1961年6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6月19日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印发关于王国藩[1]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1961年6月11日）

这个经验[2]很好，印发会议[3]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1961年6月11日

---

[1] 王国藩，当时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社长。

[2]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赵明、曾源1961年2月关于王国藩社西铺生产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材料说，西铺生产大队是一个有174户人家的村子，王国藩就是在这里办起“穷棒子社”的。现在这个村是王国藩领导的建明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这个村由个体生产时期到合作化时期以至现在，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结合得好，互相促进，因此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一直在稳定地上升。而与西铺村一路之隔的东铺村，由于畜牧业逐年下降，粮食产量也不断下降。西铺村与东铺村粮畜发展的相互关系，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粮多、畜多、肥多，畜多、肥多、粮多的道理。西铺村生猪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坚持了公养与私养同时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社员养猪。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上，则贯彻了自养自繁的方针。

[3]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社在河北省北部的迁安县[1]。

[1]　应是遵化县。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

（1961年6月12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

[2] 指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1]。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2]。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3]，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4]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

---

[1]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2]　指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6条。

[3]　指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　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12条。

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2]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3]、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

---

[1] 指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2] 韩文公，即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3] 指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2]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

---

[1] 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3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2] 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2]、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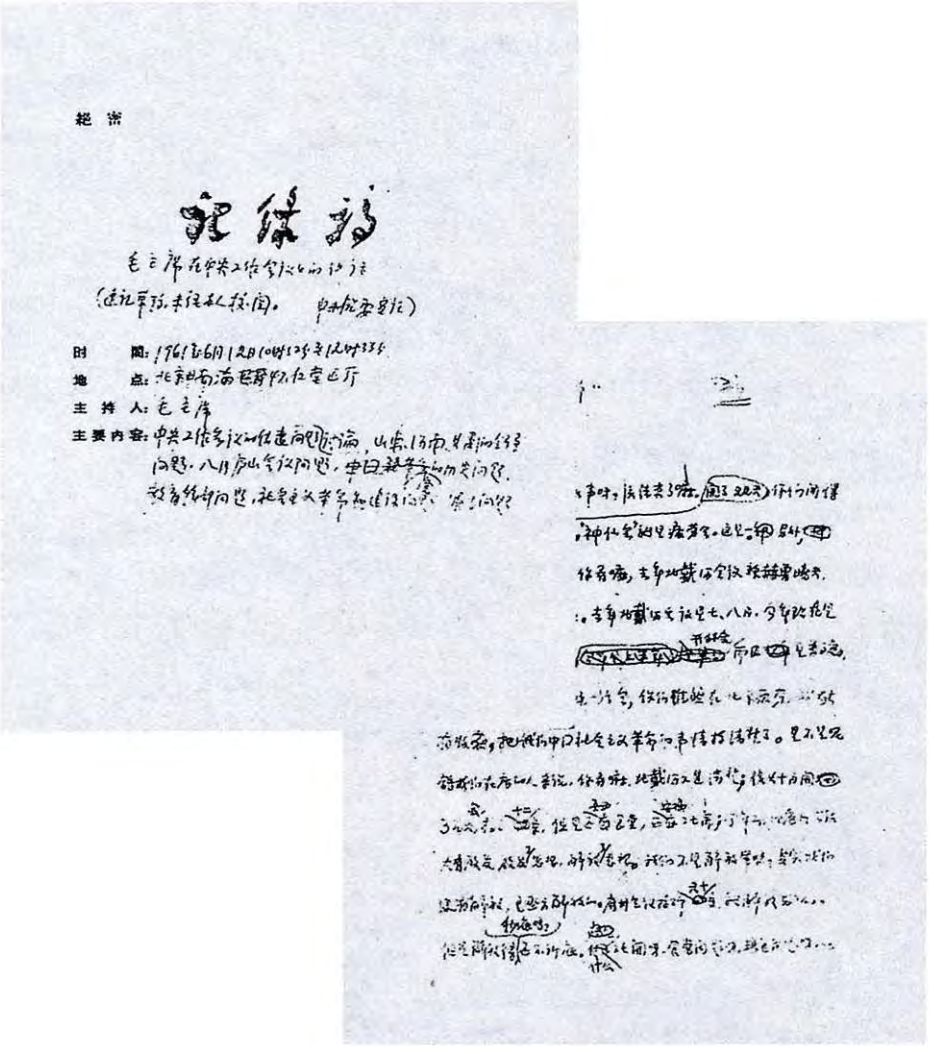
---

[1]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60条。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绝密

纪要

毛主席在中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时　间：1961年6月1日10时15分至12时35分

地　点：北京西苑招待所红楼西厅

主 持 人：毛主席

主要内容：中共工作会议的任务问题，山东、河南、甘肃的经济问题，八月庐山会议问题，中日韩关系的问题，教育统帅问题，北京市文教工作的问题，原子弹问题

1961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图为会议纪要。

给刘松林[1]的信

（1961年6月13日）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2]，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年10月至1961年8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2] 1962年2月，刘松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结婚。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

（1961年6月1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2]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2] 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1963年5月1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1961年6月，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一起。

1961年6月，毛泽东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一起。

1961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亲切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

给邓小平[1]的信

（1961年6月22日）

小平同志：

此件[2]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1961年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

对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1]

（1961年6月）

一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十二年，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2]，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3]。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翻身的道路了。[4]

---

[1] 这是对1961年6月23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文件印发的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内容又有所修改。

[2]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原文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3]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原文是“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4]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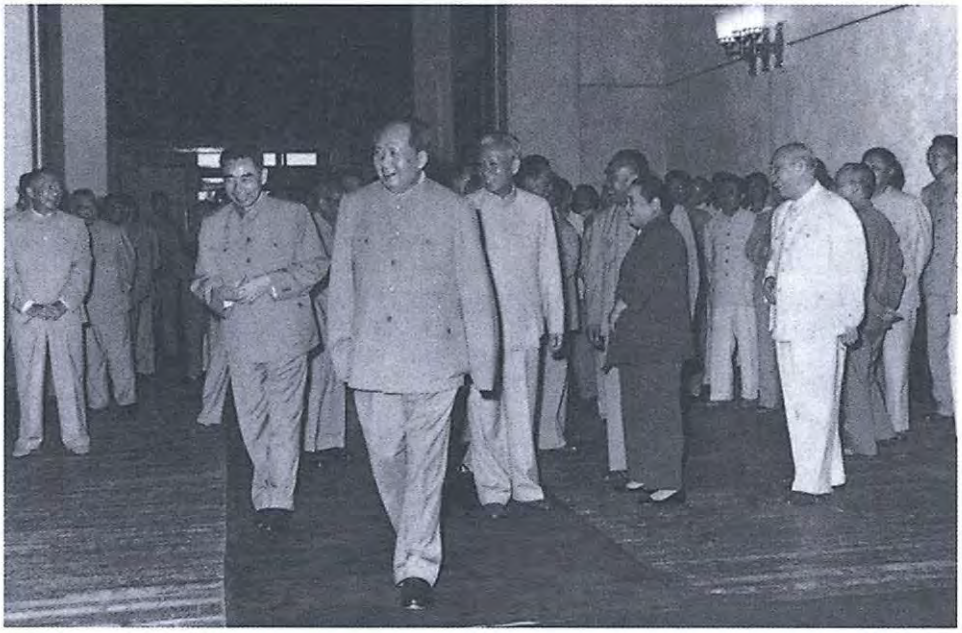
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人民民主革命得到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第一步的胜利[1]，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2]，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3]，不能不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欢呼。

---

[1]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

[2]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

[3]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伟大的影响”。



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61年，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和何香凝在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等和陈叔通等在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毛泽东、周恩来和献花的学生代表在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和献花的学生代表欧阳元在一起。

给张维[1]的信

（1961年7月9日）

楚珩兄：

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

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

[1] 张维，字楚珩，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来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电报

（1961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四十年来，英勇的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具有农牧业和工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在胜利地进行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基础上，正满怀信心地执行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宏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使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坚持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并为之欢欣鼓舞。

中蒙两国是亲密的兄弟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两国人民一直相互同情，相互支援。我们两国的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是牢不可破的。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为争取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斗争。我们深信，在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关系，必将日益发展。

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蒙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7月10日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

在关于日本经济政策和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份材料[1]上的批语

（1961年7月13日）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2]四同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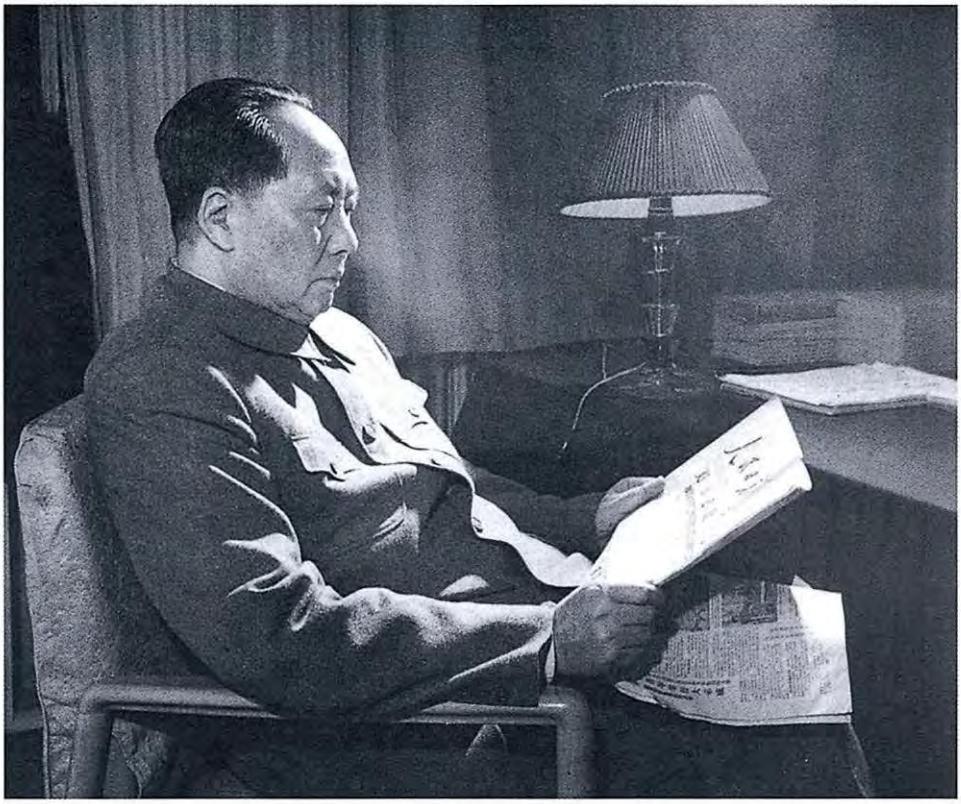
[1] 指1961年7月6日印发的一份内部材料。材料中说，日本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1960年2月根据防卫厅的要求，提出题为《从经济政策来分析防卫产业》的内部报告。该研究会理事长福田赳夫现任自由民主党决策机构政务调查会会长，顾问山际正道现任日本银行总裁。报告要点为：一、日本国防和军火生产的出发点：（1）日本的国防体制应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只能从局部战争的观点出发。（2）必须更加重视武器生产与国力的关系，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已超过了日本国力所能及的地位。（3）必须贯彻日美共同分担日本国防的想法，采取日美共同防御的体制。二、今后日本国防和军火生产的发展方向：（1）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2）日本军火生产应以能与民需品同时生产的军需品为限。（3）需要装备高性能战斗武器的空防由美国分担。三、目前日本国防和军火生产中所存在的偏向：（1）陆军兵员相对过多，空军飞机负担太重。（2）军火生产政策忽视地面、海上战斗力的发挥，与国内外形势发展背道而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在杭州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1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波兰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一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新的成就。目前，波兰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一年来，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以及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波兰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波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和团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深信，这种友谊和团

结，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1]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2]的基础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对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祝波兰人民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7月21日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2]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的电报

（1961年7月25日）

古巴《革命报》：

在“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1年7月25日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年7月30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

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1961年，毛泽东在散步。

关于同意会见古巴桑切斯少校的批语[1]

（1961年8月9日）

业夫[2]同志办。可以见，如对方能推迟回国时间二三天，可于十五日或十六日见面，地点临时通知。

毛

九日早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1961年8月3日关于拟请毛泽东接见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古巴人民社会党今年5月通过我国驻古巴使馆向我党提出，以中拉友协名义邀请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在访苏之后到中国访问。我们表示同意。桑切斯已于7月31日到达北京。他在出国前曾对我使馆人员说，他非常敬仰毛主席，到京后又多次表示敬仰毛主席之意，希望能见到毛主席。鉴于桑切斯是1956年跟卡斯特罗乘“格玛拉”号游艇在古巴登陆的81人之一，是冲破巴蒂斯塔军队包围的12个英雄之一，在今年4月反对美国雇佣军入侵的斗争中很坚决，并且受了伤，此次是第一次来华访问，我们意见，如毛主席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一次比较好。

[2] 业夫，即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祝贺苏联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电报

（1961年8月9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在苏联胜利发射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在人类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创造了新的奇迹。这一光辉成就，将大大鼓舞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祝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攀上新的高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1年8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8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解放十六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开展了全民性的千里马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朝鲜人民在1960年提前一年全面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满怀信心地为胜利实现宏伟的七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把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成就。

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各项主张，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爱国正义斗争。我

们深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的最后胜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对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近，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是对我国人民的有力支持和巨大鼓舞。我们两国所签订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全面加强了我们两国的互助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从而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祝兄弟的朝鲜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8月14日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金日成。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8月16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六周年的时候，谨向你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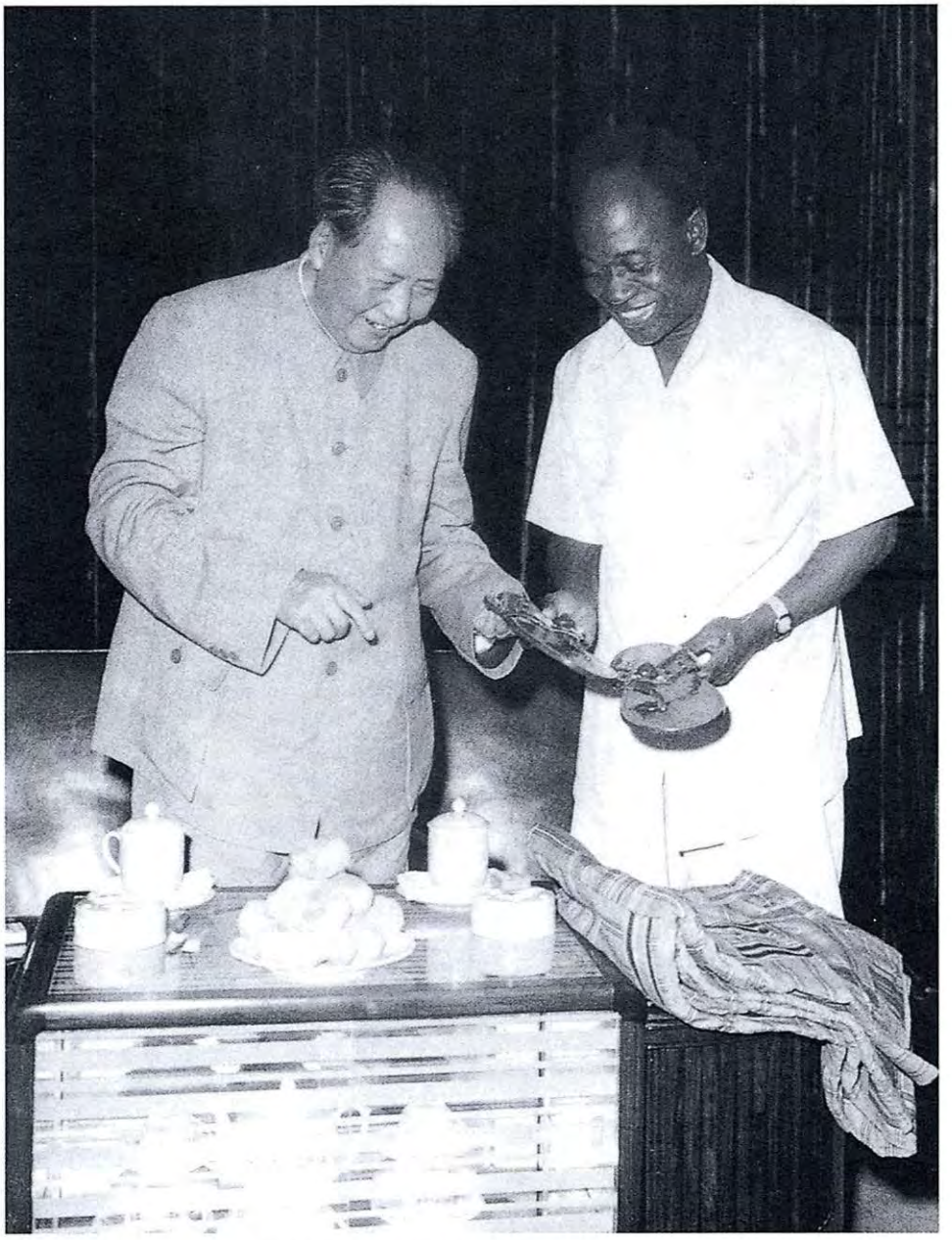
祝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和成就。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

1961年8月16日

1961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巴西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

1961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



1961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并观看他赠送的礼物。

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1]

（1961年8月19日）

对国际问题，我们的看法同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2]的看法一样。莫斯科会议还不到一年，是去年十一月开的。世界大战究竟打不打？声明上已有回答，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你们会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呀，你没有肯定到底打不打呀。问题在于：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使大家认为是共产党说不会打了，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及干部学习团谈话的一部分。

[2]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声明就国际局势、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迫切问题，分别作了阐述。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声明还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

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古巴现在准备着，美国虽没有直接进攻，但组织了它的走狗登陆。古巴面临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参加进攻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他们在那里准备着。

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一套，还要碰钉子

（1961年8月23日）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时期的右倾错误，就是说，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延安整风，才搞出了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理论和具体政策。对于民主革命，即阶级斗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都有了一套经验。

讲到社会主义，我们则不甚了了。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讲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出的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不会。会不会遭到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已经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才会有社会主义的经验。

给胡乔木[1]的信

（1961年8月25日）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2]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3]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4]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八月二十五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参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曹操集》中作："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谷羽，胡乔木的夫人。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无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遵地疗养为宜，但氣候转移，莫事游山玩水，宜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你八、九、十三个月休养打算，不要作几个打算。如果急转直下，没有疗效。你的病近似陈雪屏、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原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正在进步。可以效法。问谷雨好。如你到地疗养，若宜远去，以上事项，请你们二人商量决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在林彪关于总政选印《毛选》部分文章的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61年8月29日）

田家英[2]同志：

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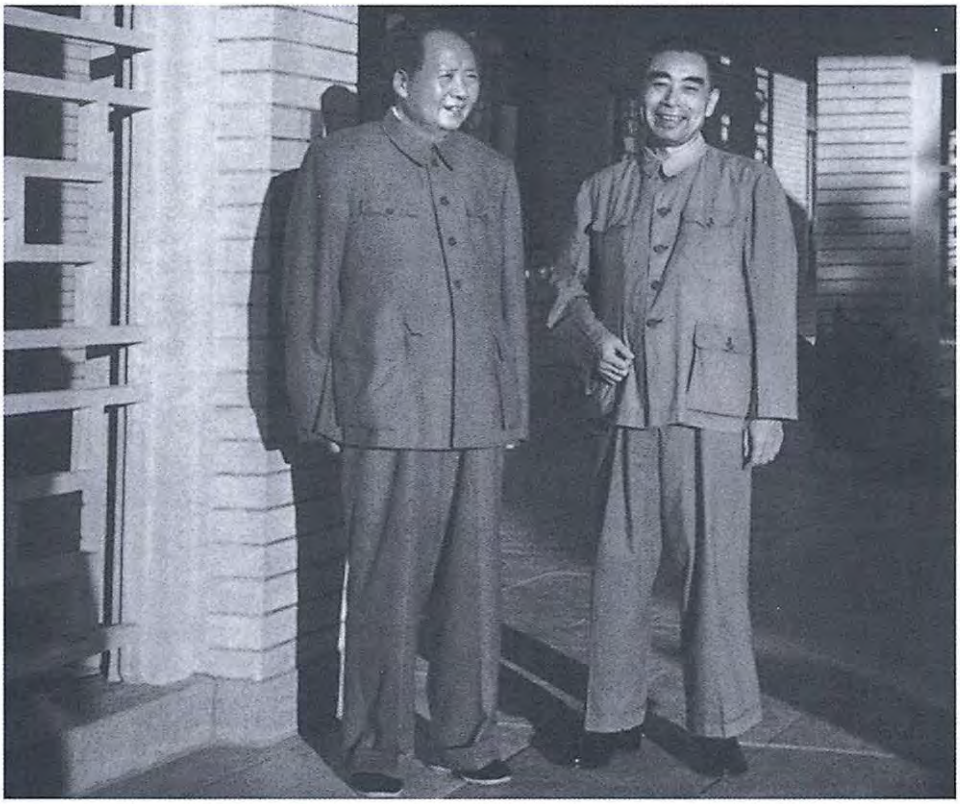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1年8月2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如有意见，即请指示，如无指示，即由总政出版了。"同年，总政宣传部即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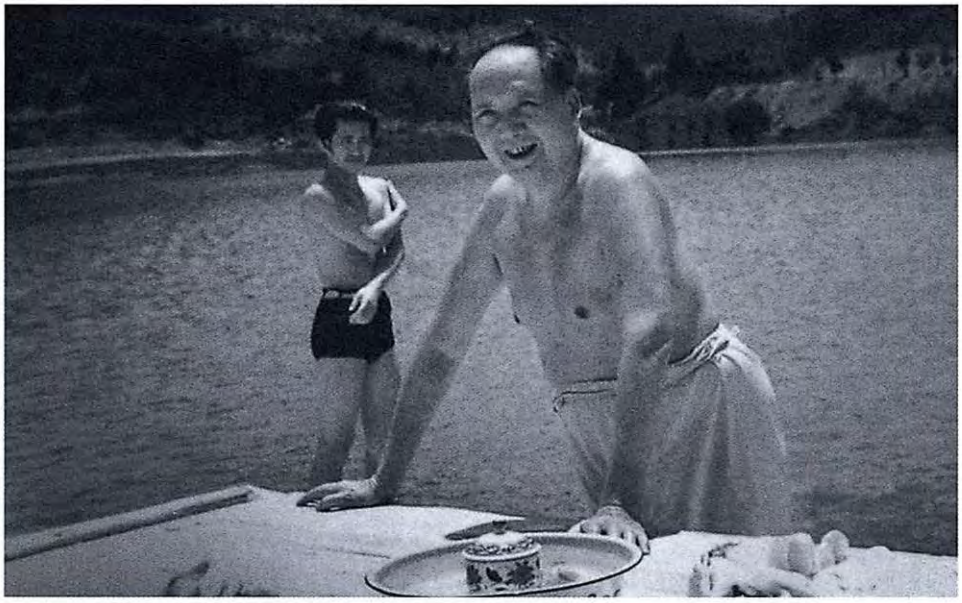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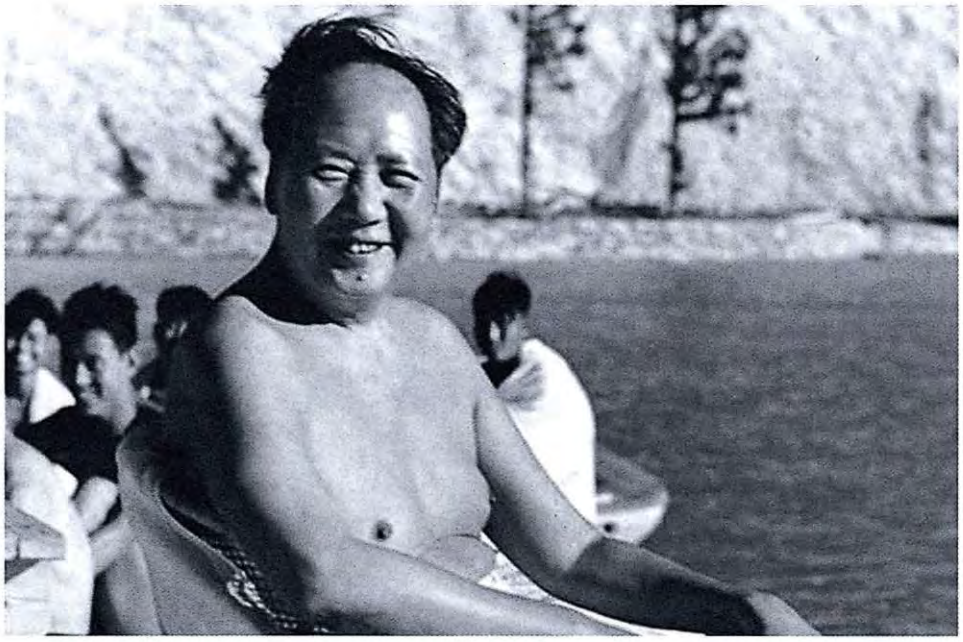
1961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和陈云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在庐山亲切交谈。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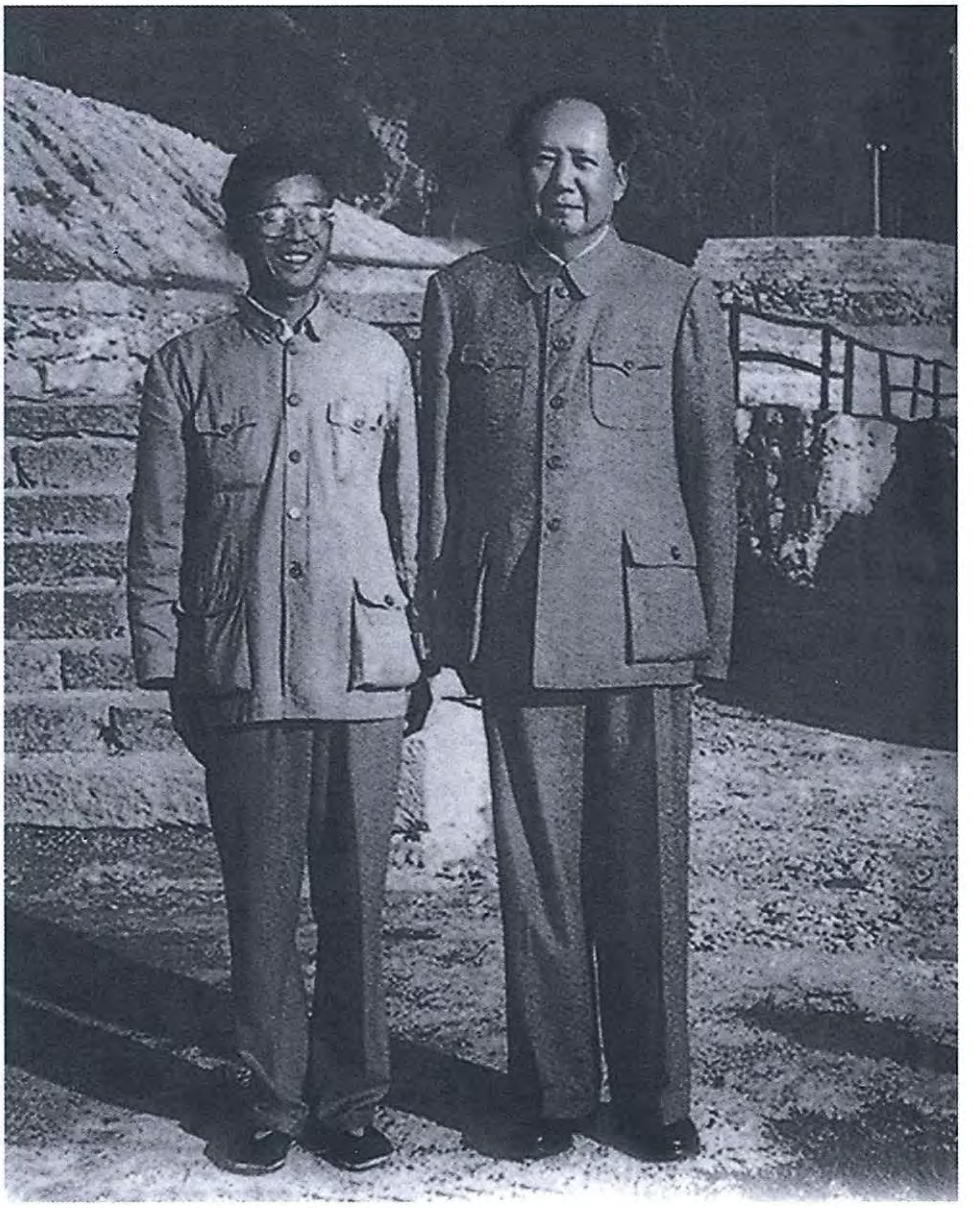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1961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和新华记者林克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散步。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和《文汇报》记者徐大刚合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和《南方日报》记者曹桂江合影。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9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为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每一个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坚持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维护印度支那的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阻挠，日内瓦协议的条款，未能完满实施，越南人民和平

统一祖国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南越卖国集团的恐怖统治、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并且深信，这一斗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悠久的传统友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铸成了我们两个兄弟邻邦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几年来，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不断发展和扩大。最近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我国的友好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越两国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亲密的兄弟友谊，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和平的事业。

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像长江、红河一样长流不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9月1日

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1年9月6日）

此件[1]很好，印发各同志[2]。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编印的《农村简讯》第一七五号上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基本情况。自农业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二、存在的问题。（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3年、5年甚至10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

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三、各地的部署。（一）普遍对贯彻实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法、步骤、退赔、甄别、粮食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发了指示。有些地方对于社办工业、自留地、养猪等具体问题，根据中央的政策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二）各地县的三级干部会，一般可在8月中旬开完，同时普遍作出了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规划。（三）普遍要求在8、9两月内，以退赔、在夏收中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大力加强经营管理工作等，作为贯彻农业六十条的主要内容。（四）进行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

[2]　指当时正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给董必武[1]的信

（1961年9月8日）

必武同志：

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2]，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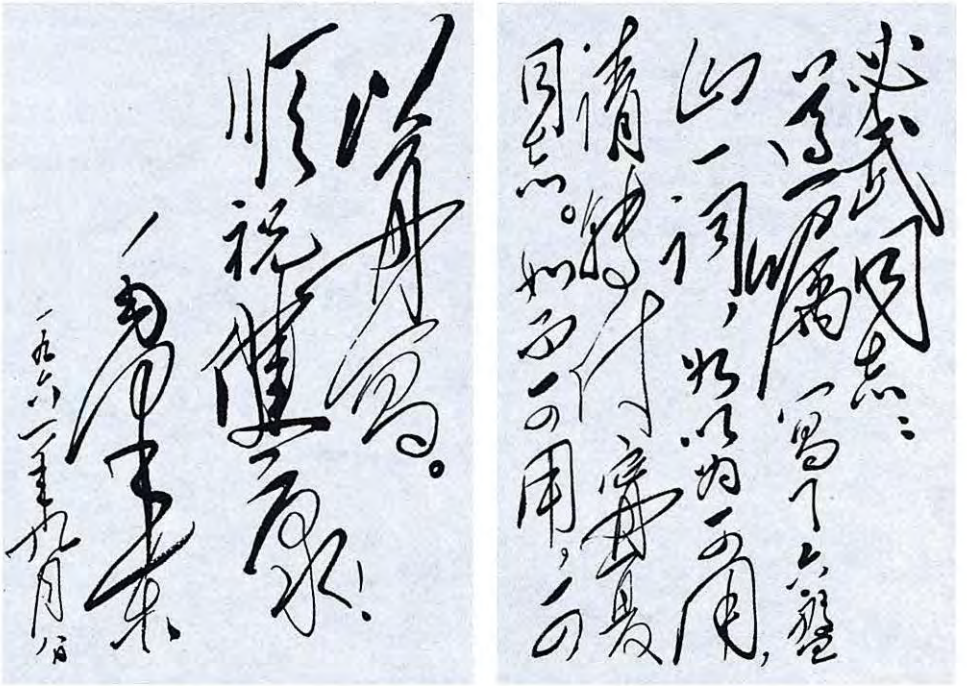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指毛泽东1935年10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致董必武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1年9月8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一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巴尔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了积极的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所获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保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兄弟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我们深信，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指导下，这种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

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9月8日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

（1961年9月9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2]。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1]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故名。李进即江青。

[2] 仍从容，指飞渡的乱云。

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上的批语

（1961年9月）

这个插句可以不要[1]。

毛

[1] 1961年9月13日印发供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指出："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其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是这次印发的修正稿中新加的。毛泽东在审阅经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修改后的这一决定（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这9个字，并写了这一批语。

毛泽东手书《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1]

（1961年9月16日）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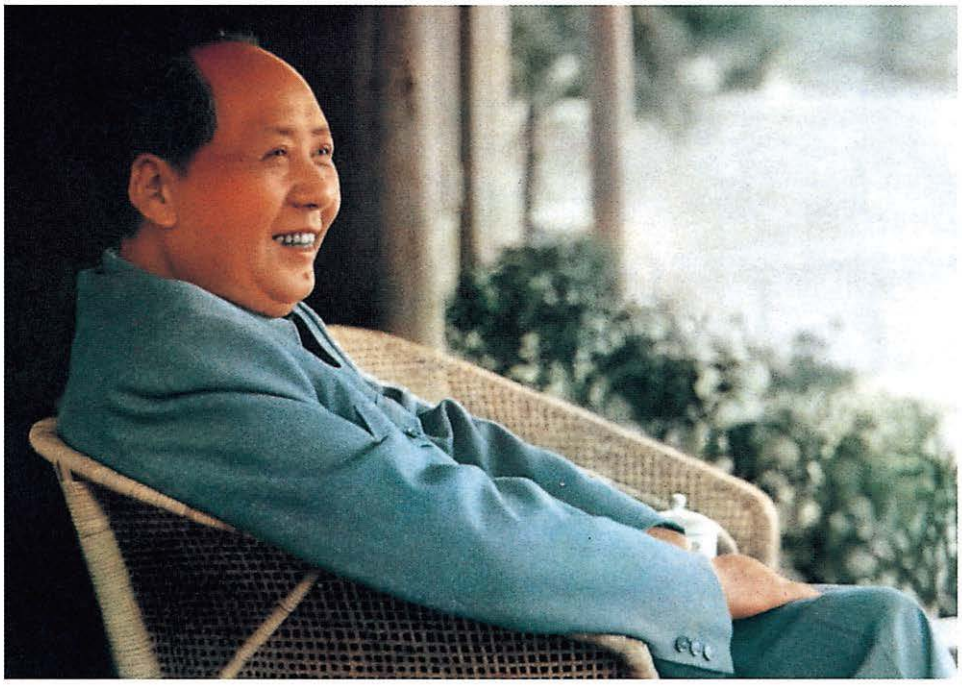
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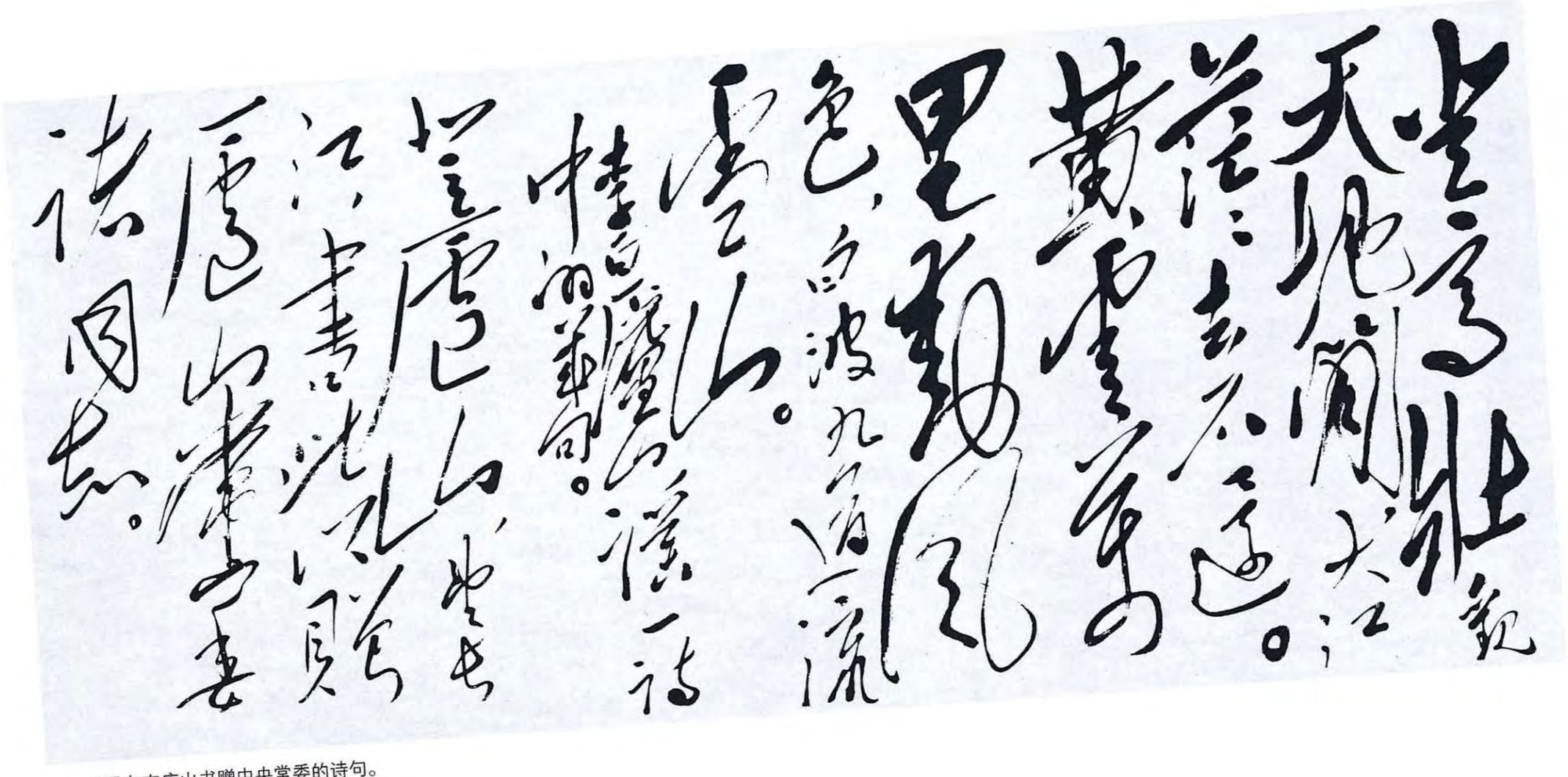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1]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4句，赠中央常委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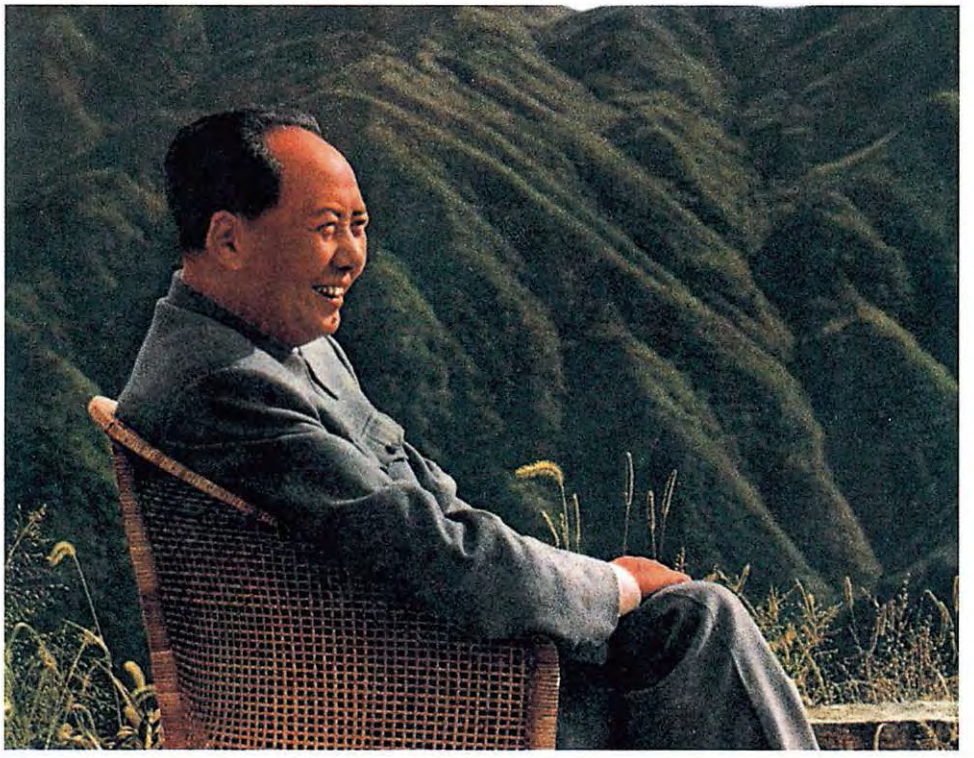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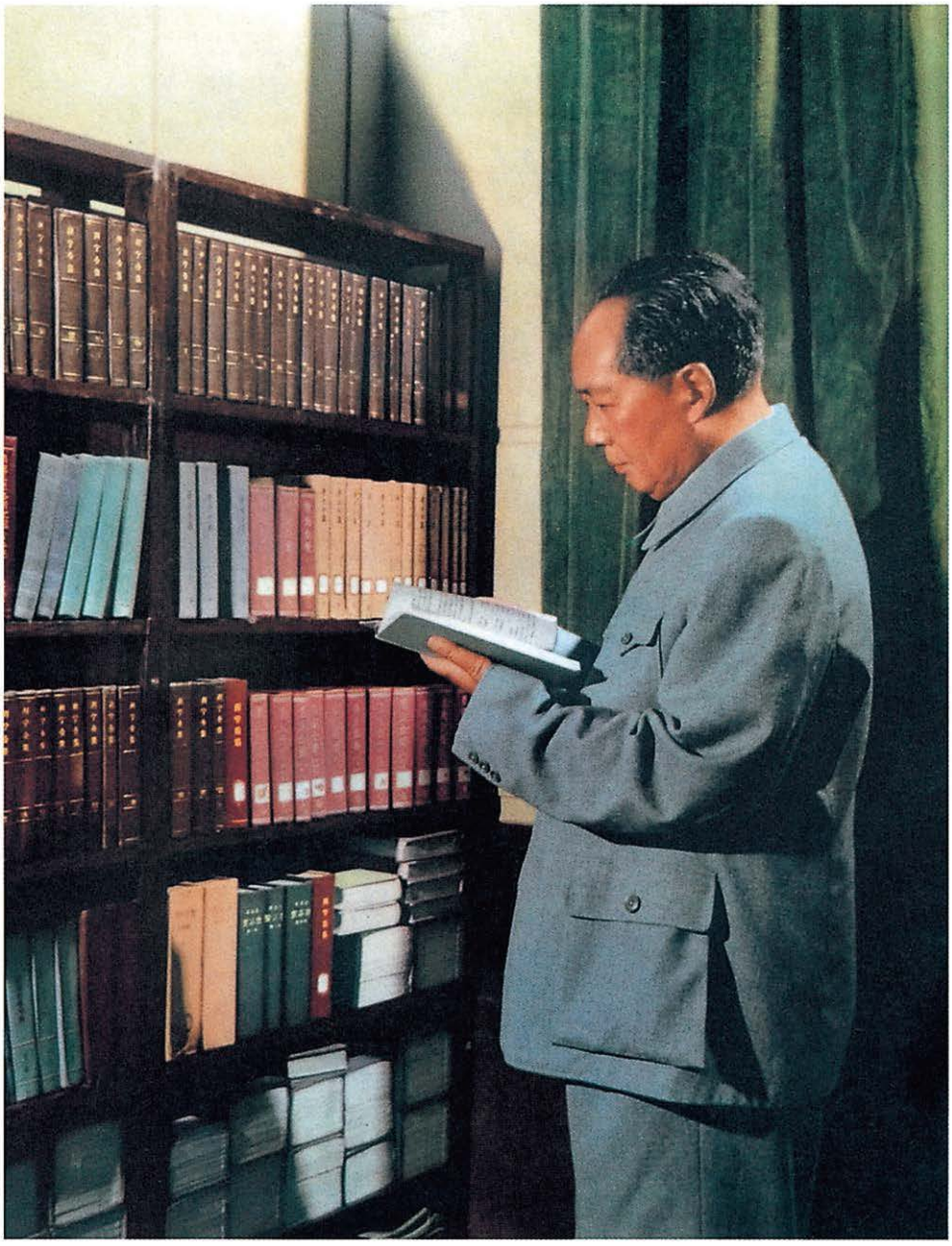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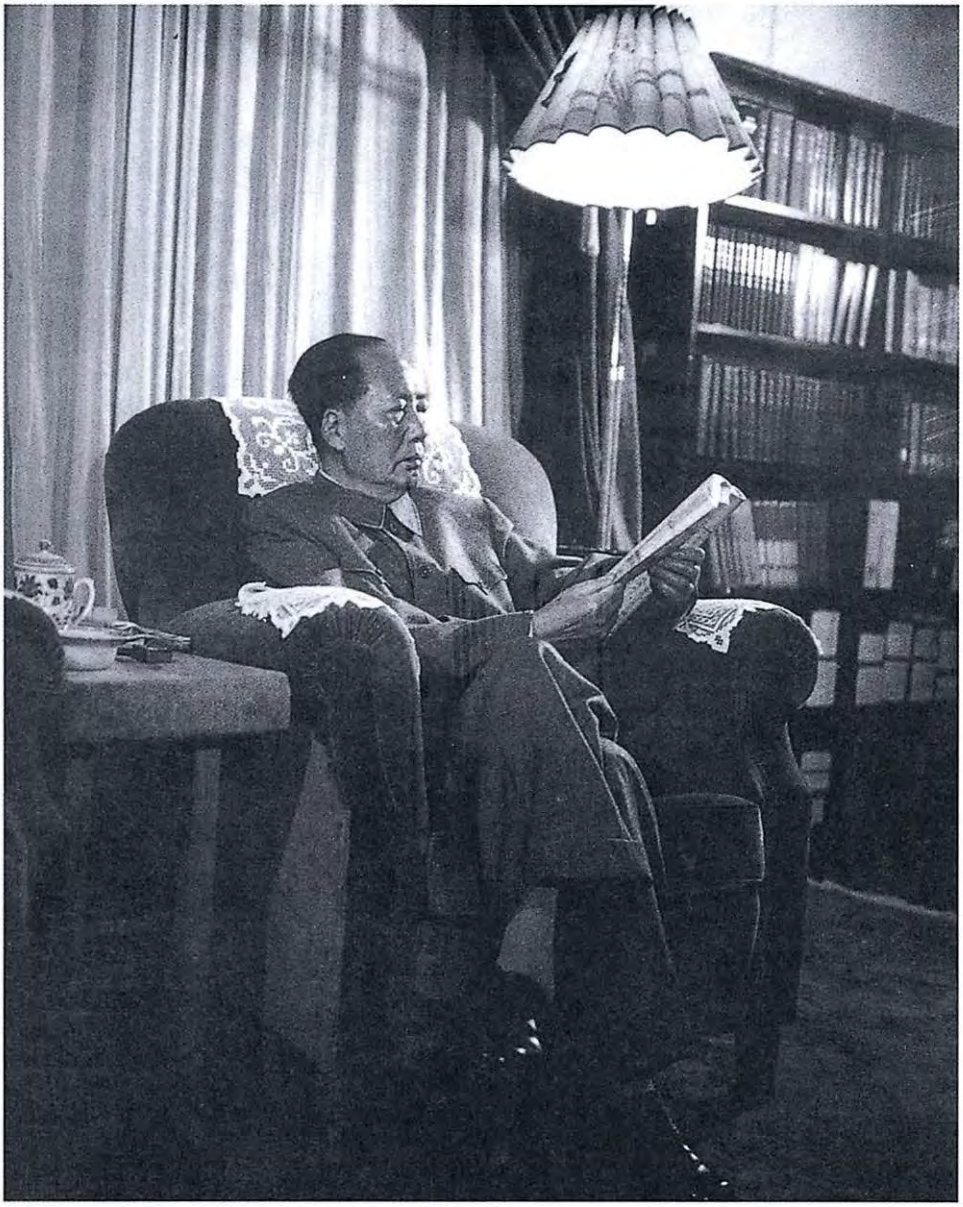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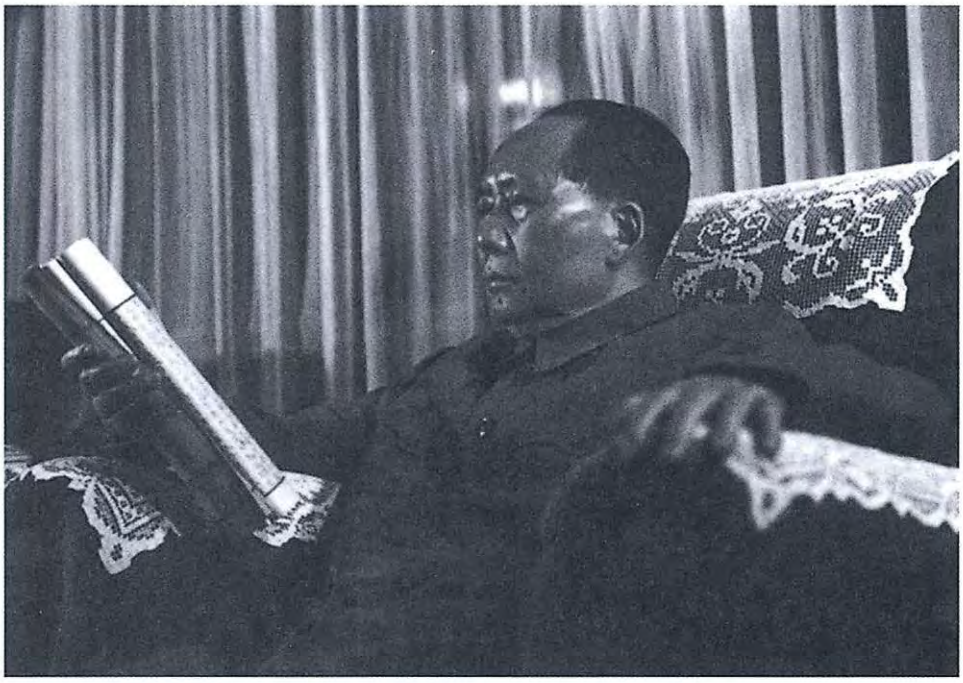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查阅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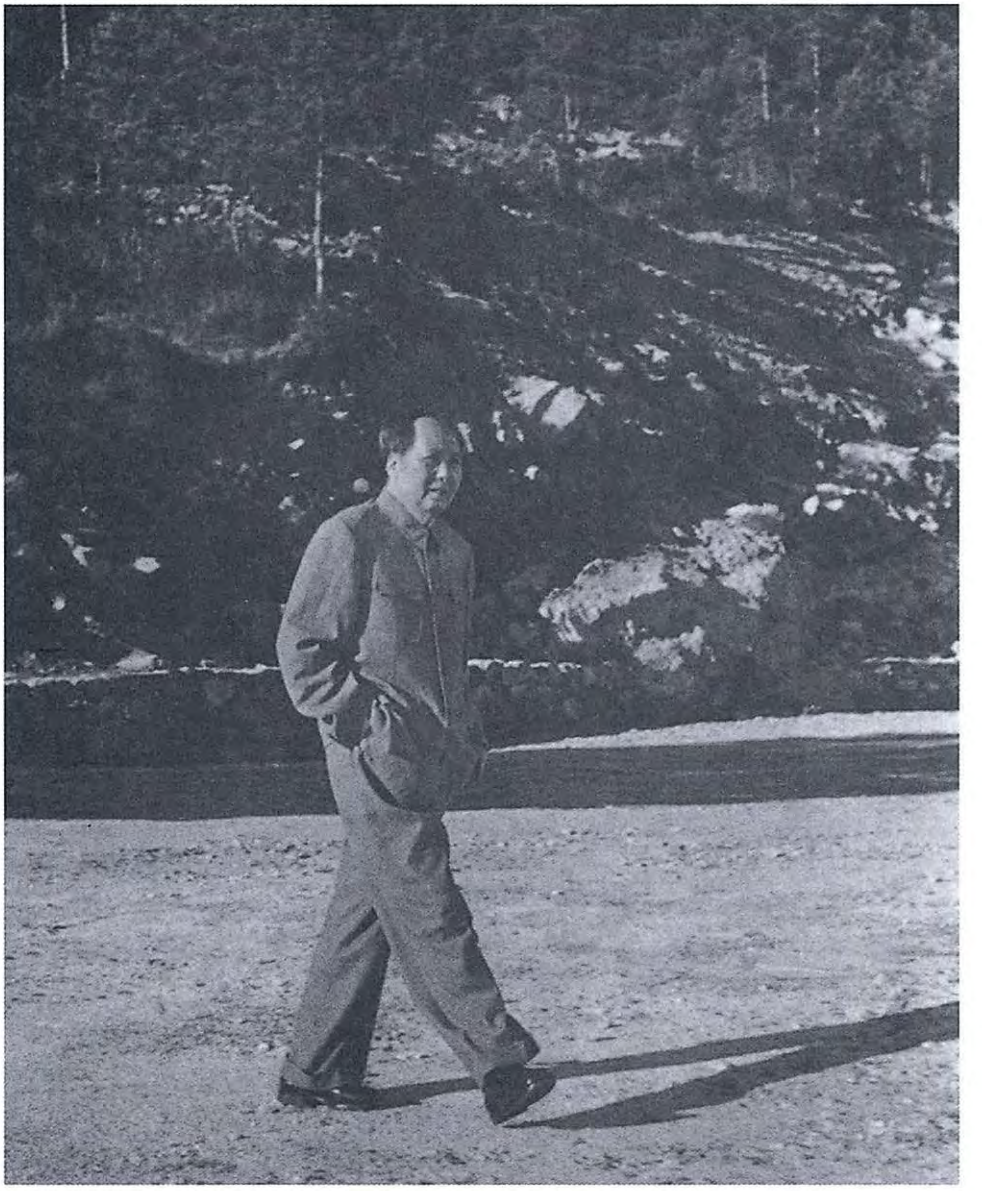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看世界地图。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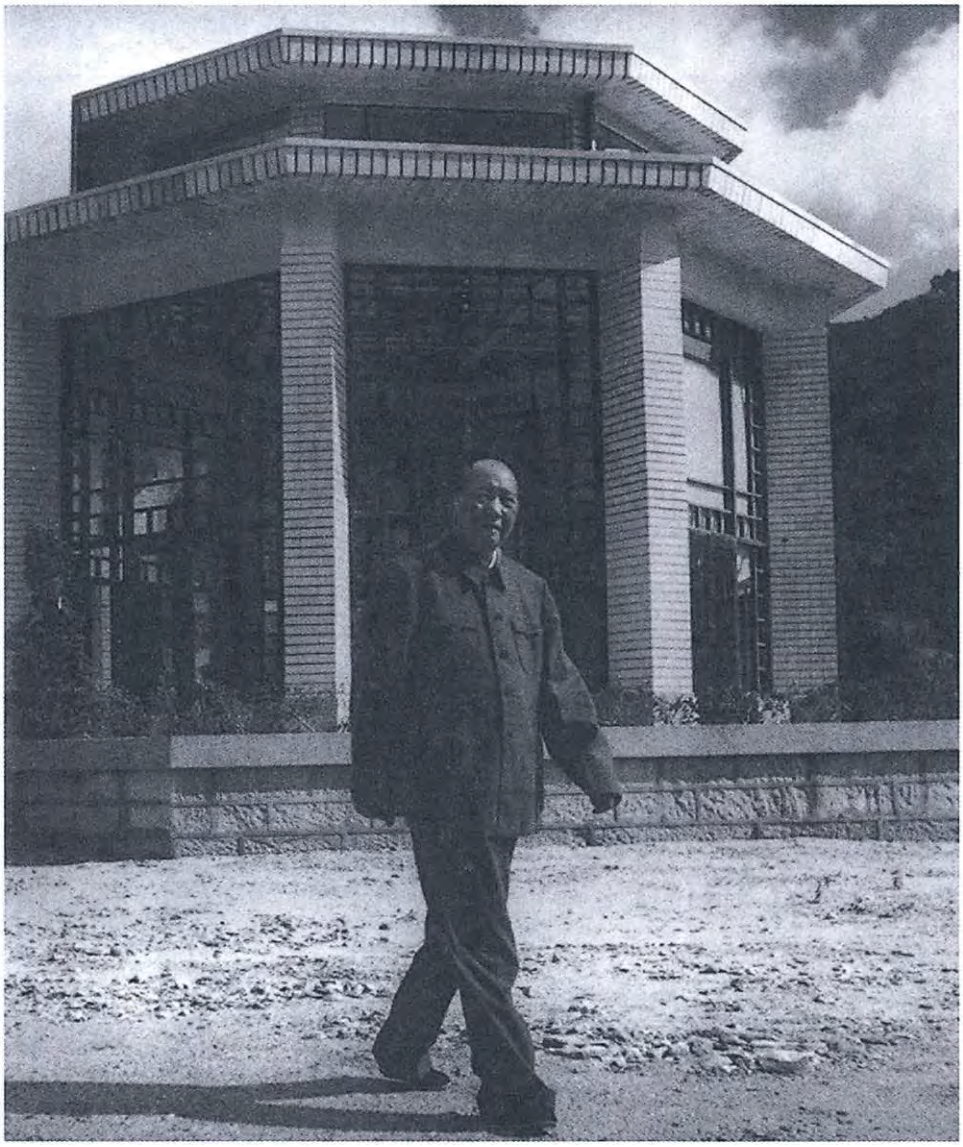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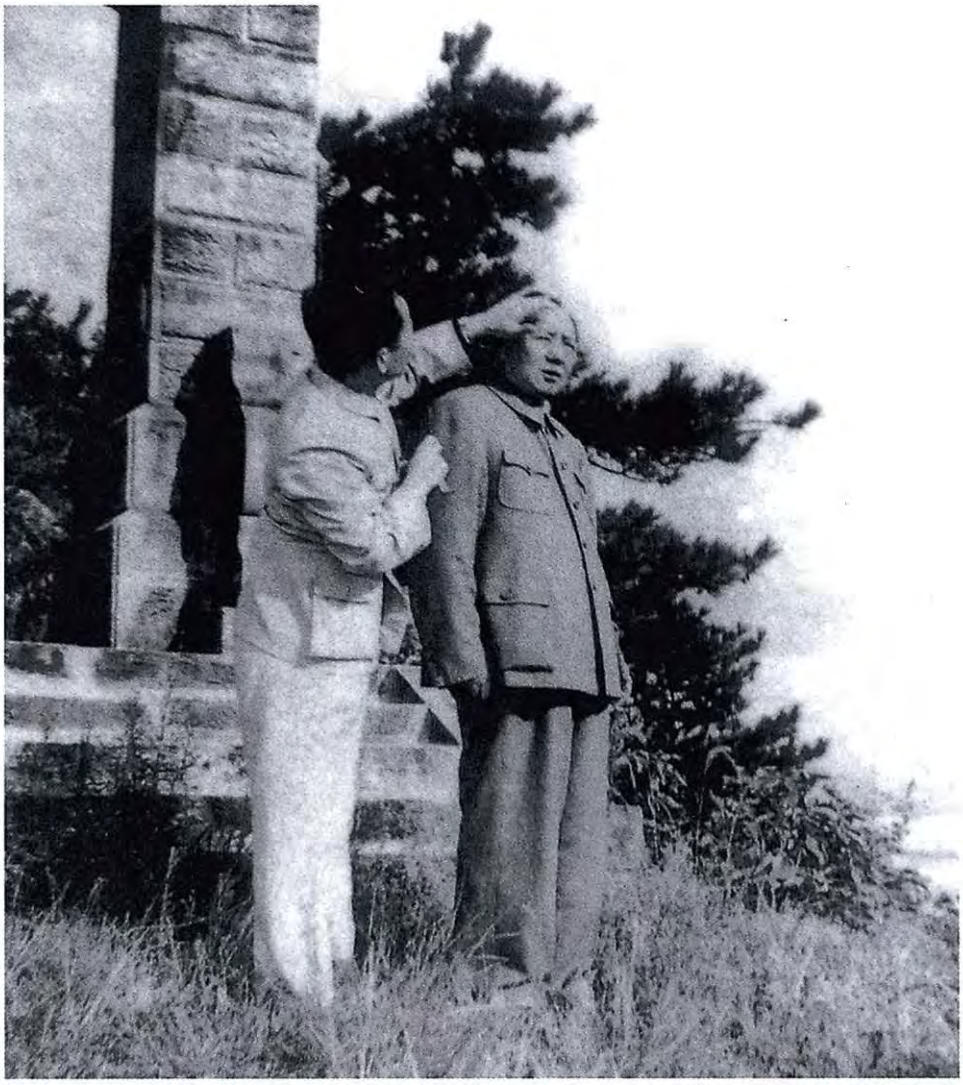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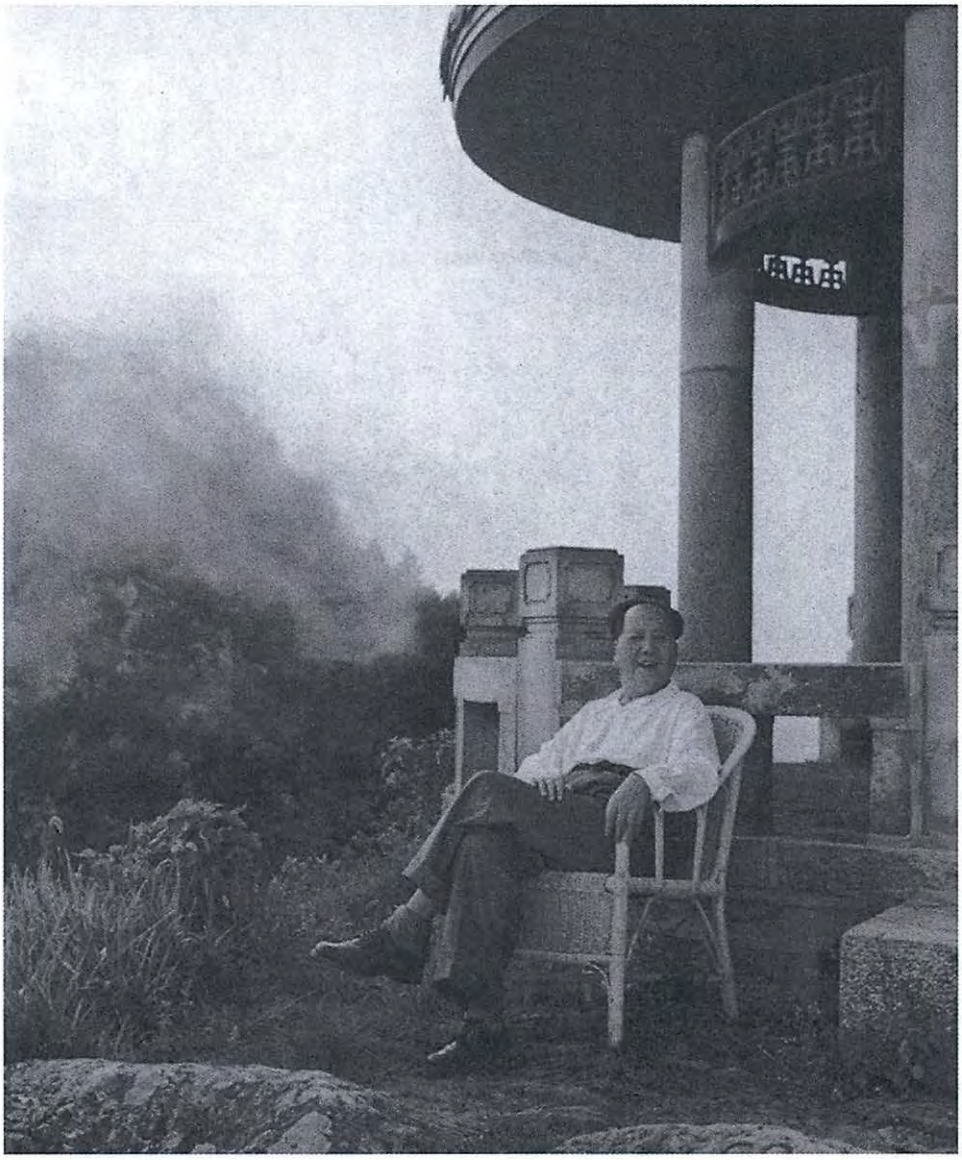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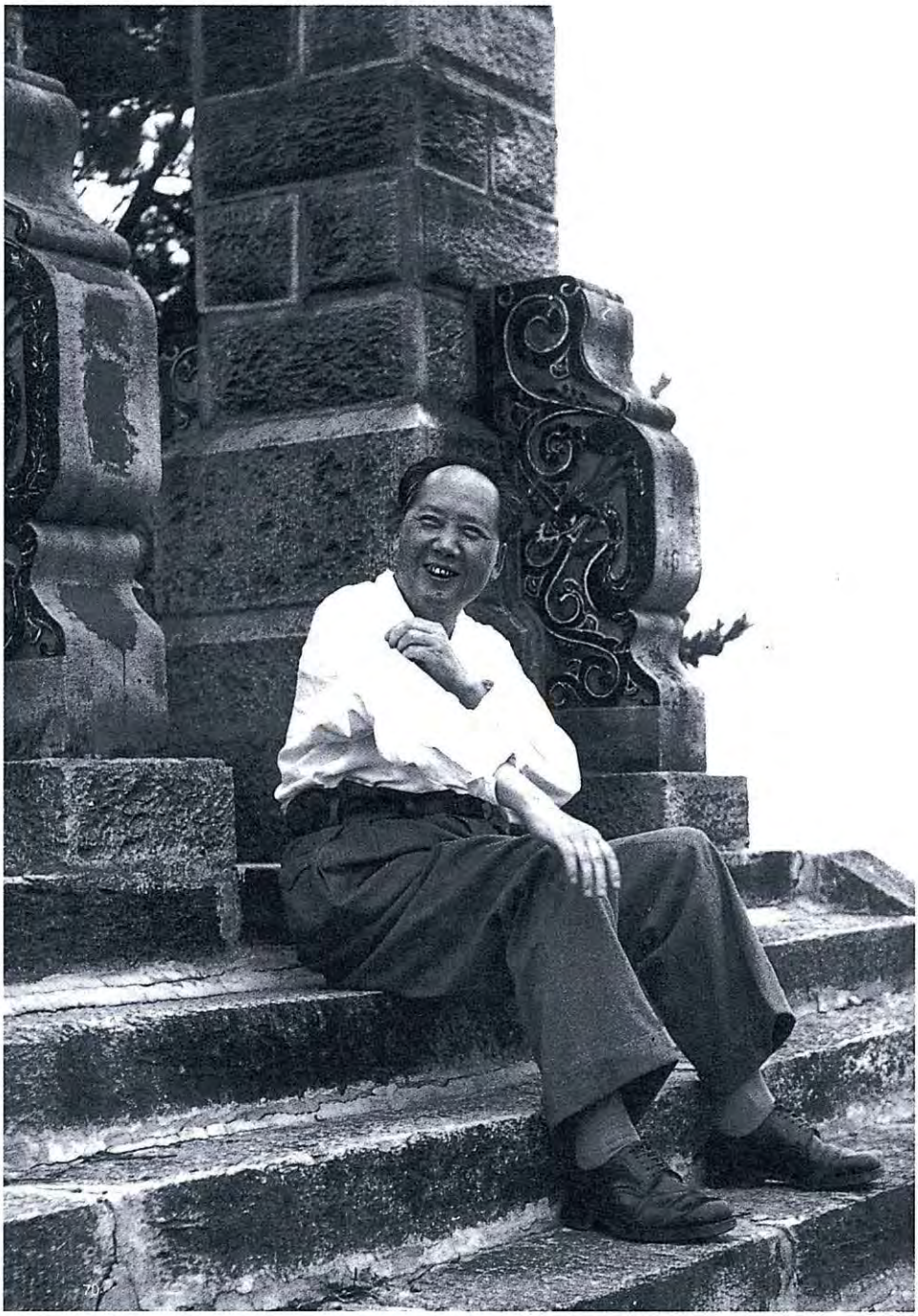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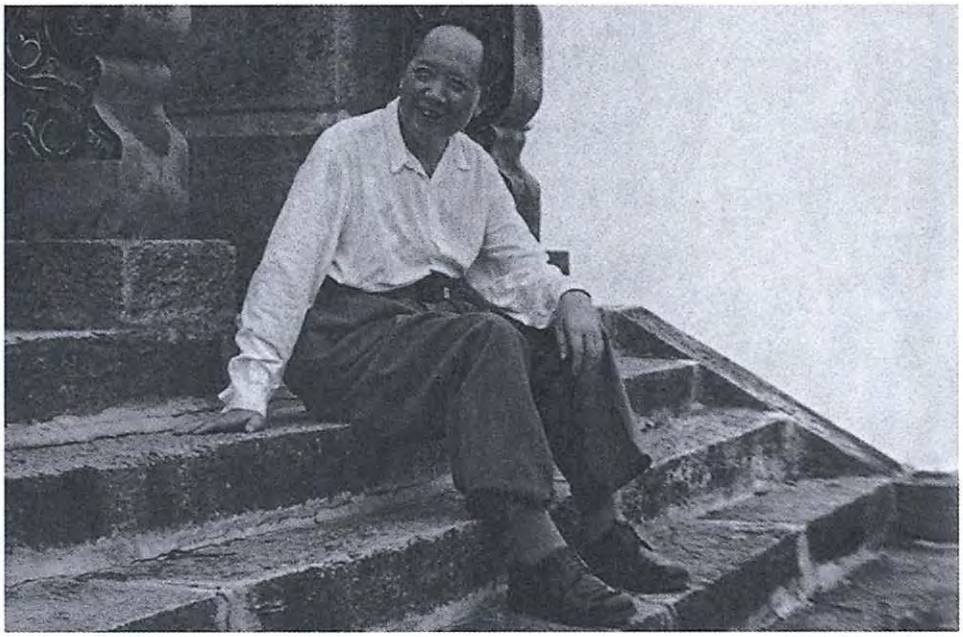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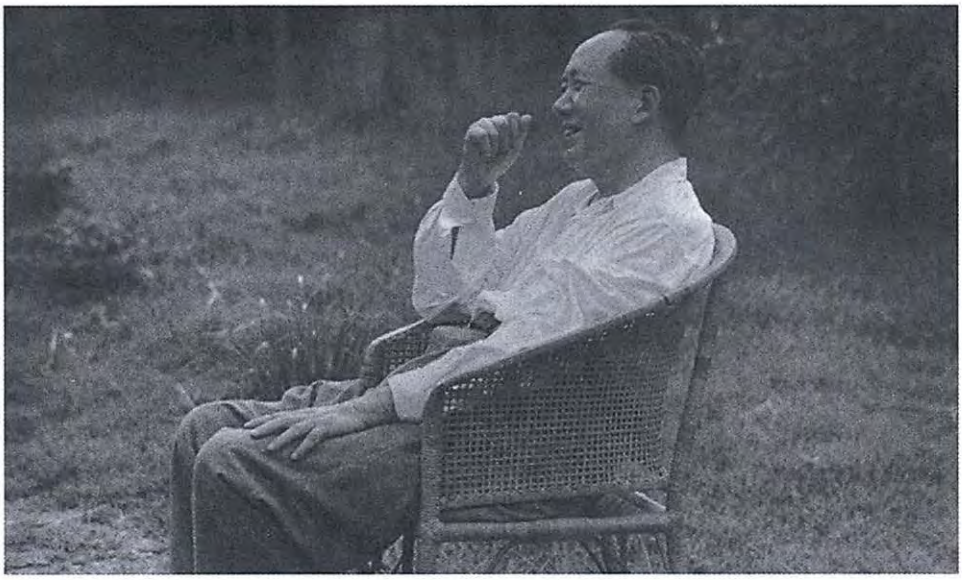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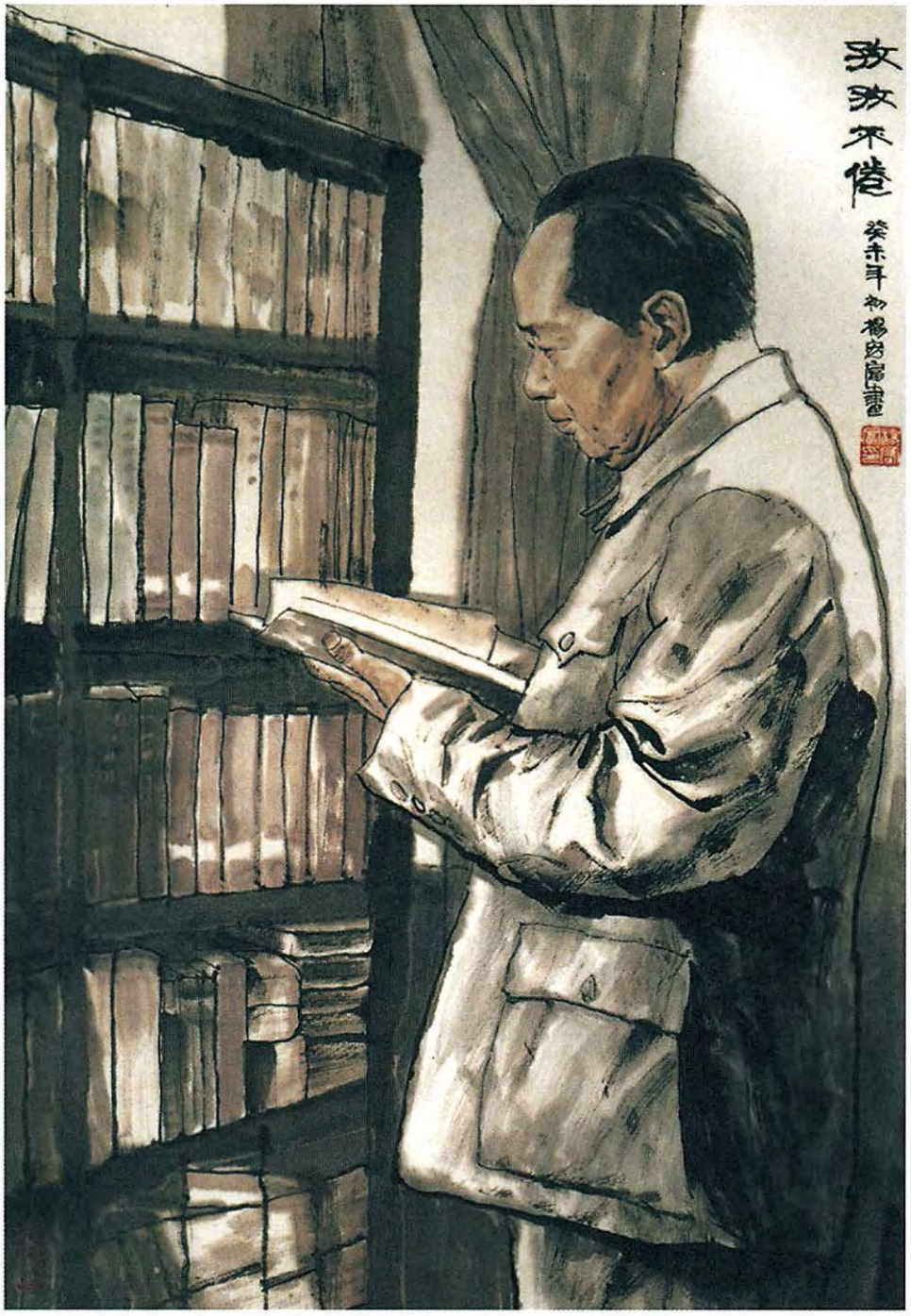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植物园。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孜孜不倦》（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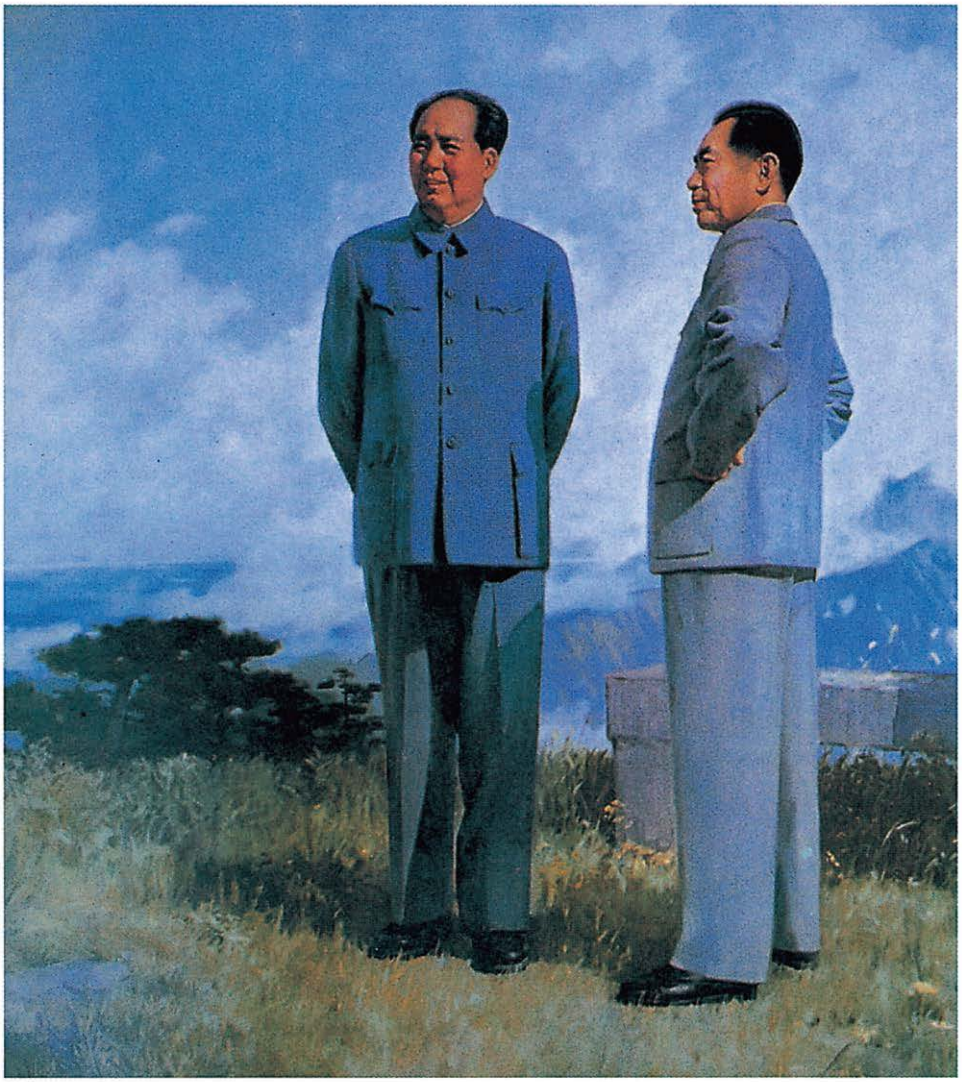
《冷眼向洋看世界》（中国画）

《暮色苍茫看劲松》（中国画）

《硕果》（中国画）

《闲庭含鄱口》（中国画）

《伟大导师》（套色木刻）



《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和周恩来》（油画）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1]上的批语

（1961年9月16日）

林克[2]同志：

此本已看，下本[3]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4]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5]，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

[1]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材料，主要是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论述。目录如下：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二）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一）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不能剥夺农民，巩固工农联盟；（四）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计划工作；（五）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品的增长，依赖于个人消费；（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七）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二）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三）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四）右的和“左”的错误都是脱离实际；（五）成绩和错误都有两重性；（六）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另一本材料《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

[4]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 毛泽东所作的6处修改和恢复分别是：一、第15页摘录了毛泽东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以下一段话：“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二、第25至26页摘录了毛泽东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以下一段话：“现在问题是县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外文法则和规律是一回事），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中“客观法则（外文法则和规律是一回事）”。三、第40页摘录了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的以下一段话：“各部门搞指标计划，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作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盲目性，叫作‘左’倾冒险。我想，全党在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是包含着一种不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中的“是包含着一种不清醒的头脑”。四、第36页摘录了毛泽东1958年12月1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段谈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这段话在送审稿上原已删去，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恢复”，并删去了其中的“观潮

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五、第39页摘录了毛泽东1960年6月18日《十年总结》一文中以下两段文字：“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送审稿上原已删去了这两段话，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恢复”，并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上面引用的即是这次修改过的文字。对于这两段话，毛泽东后来又有修改。六、第44页摘录了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这段话在送审稿上原已删去，毛泽东审阅时，在旁边批示“恢复”。

在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上的批语

（1961年9月17日）

退彭真同志：

指示[1]及总则[2]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3]。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晨三时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稿。指示稿中指出，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3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过去3年大跃进中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于我国工业的今后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以便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总结试行经验以后，使这个条例完善起来。

[2] 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总则，共6条：一、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二、国营工业企业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三、国

营工业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节约原则，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四、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原则，也是国营工业企业内部的管理原则。五、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必须发扬民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全体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把实行集中管理和开展群众运动正确地结合起来。六、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组织，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除总则外，《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还包括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工资、奖励、生活福利，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协作，责任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党的工作等10章，共70条。

[3]　毛泽东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1页讲到“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一段话中，删去了“用毛泽东思想”6个字。此外，还将这一指示的下发日期署为1961年9月16日。

和蒙哥马利[1]的谈话

（1961年9月23日）

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谢谢主席让我再一次来中国访问。我这次到中国来访问有好几个特别的理由。最近西方世界散布了很多谣言，说中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一切都很不好，人民在挨饿，他们要造反，中共中央对问题的控制有所松弛。但是，我曾到各地去旅行，到过内蒙古、华北、华中、黄河、长江，在农村同农民谈话，在城市同市长、工人谈话。在整个旅途中，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那种说法。我很清楚，同旧中国相比，解放以后，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克服很多困难，比如在粮食方面，交通运输方面，水利方面等等。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我认为广大的人民——农民和工人——他们牢牢地团结在中国领导人的周围。因此，我得出结论，他们完全可以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就是这两个问题？

蒙：这是头两个问题。当我回到西方去以后，我要纠正他们的

---

[1] 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子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盟军指挥官之一。后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副司令等职。1960年、1961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错误概念，指出他们讲的都是谎话。

毛：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你来看了两次，这次看得多一点。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搞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

蒙：你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指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吗？

毛：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没有完成这个革命，我们接过来，到一九四九年把它完成了。我们的党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最初，仗怎么打法，我们没有经验。各种军事问题，政治问题，还有根据地的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一开始我们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取得了胜利，前后是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到一九四五年全党思想统一了，取得了比较完全的经验，经过了二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召开了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经验，才能够在后来反对蒋介石的进攻，夺取了政权。

那时的困难比现在大得多。第一，党内有几次分裂。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闹过好几次。南方的根据地完全丧失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蒙：在什么时候？

毛：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经过犯错误、打败仗和长征，最后剩下来不到三万人。

蒙：那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毛：对。后来我们到了陕北，以后又夺取了延安。后来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年，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又进行

合作。

蒙：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

毛：对付日本人。我们那时在延安做了整顿内部的工作，即整风运动，把党内的思想统一起来，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关于外部所造成的困难，无论是在同国民党打内战的十年，或者是同日本人打仗的八年抗战期间，我们的根据地都是分割的，互不联系。先是被蒋介石分割，日本人打进来后，被日本和蒋介石两方面分割。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取得经验，统一思想，使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同志都心服，形成全党一致的一条总路线，在总路线之下又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这样才有了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一整套政策。

蒙：是逐步形成的。

毛：是慢慢出现的，时间比较长，经过了二十四年，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

那个时候，我们的情况还很困难，根据地是分割的，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不仅有帝国主义，国内还有强大的蒋介石。

蒙：蒋介石那时有二百万军队？

毛：不，后来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经过长征后，我们的军队不到三万人，但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比较正确，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包括游击队在内。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打击的锋芒对着我们。那时，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我们的解放区还是分割的。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对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到一九四九年，打了四年左右，我们就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军队取得了优势。开始的时候，我们采取退却的方法。你们英国有过

敦刻尔克[1]。那时你们把法国丢掉了，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英国国内的军队稀稀拉拉。希特勒是个笨蛋。他如果接着从敦刻尔克渡海追击，你们就会非常困难了。

蒙：他需要渡过英吉利海峡。一个岛国有它的好处。英吉利海峡保护了我们。

毛：保护了我们，使你们有时间重新组织军队，然后你们就反攻了。你们什么时候更强些？是在敦刻尔克之前？还是在敦刻尔克之后？我看还是在敦刻尔克之后。

蒙：对。当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根本不能同任何人打仗。在和平的年代里，政客们总是不照顾军队，而一旦发生战争，又求救于军队。在敦刻尔克以后，英国是单独对付法西斯轴心国家的联合力量。美国没有参加战争，它是站在一边，看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毛：就是。那时法国有个贝当，控制了法国全国；另外还有一个戴高乐，在英国组织政府。是贝当强还是戴高乐强？戴高乐当时没有地盘，后来才有了北非。法国被德国占了，北非也被占了。后来戴高乐靠了英国和美国的帮助，才有了北非，那就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

我们也有我们的敦刻尔克，每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敦刻尔克，那是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这两年。当时，我们保卫延安的部队只有两万五千人，而胡宗南的军队有二十五万人。美国帮助蒋介石。那时英国和法国在中国都没有份。蒋介石的绝大部分武器和财政经济援助都是美国给的。

---

[1]　敦刻尔克，法国港口城市。1940年5月27日至6月4日，30多万英法联军从这里逃出德军三面重围，撤回英国本土，为后来的反攻保存了实力。

蒙：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问题？

毛：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当时按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

毛：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你们做得很不错。

毛：还可以。

我们需要重新训练干部，这件事情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干社会主义干了十二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由完全没有经验到现在初步取得经验。这里包括接受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帮助在内。

蒙：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

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经验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过去局部性的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

蒙：还有几年歉收累积起来的影响。

毛：对。所谓旱灾，不是说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旱。今年旱灾最重的是四川、湖北、安徽，就是长江流域。

蒙：像中国这样面积广大的国家，总有一些地方会遭到灾害。一般地说，是北旱南涝，但是在个别的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毛：今年主要是长江三省旱。

蒙：水利灌溉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自然灾害的影响？

毛：还差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饭。要逐步来。

蒙：那就是说，中国的全部面积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一百万平方公里中，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得到灌溉。

毛：这一百万平方公里是可耕地，有已开垦的和未开垦的。

蒙：我在访问刘主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中国历史上，连续三年的旱灾大约每一百年发生一次。前一次是在八十多年以前发生的。

毛：恐怕是这样。

蒙：尽管收成不好，还有几年累积起来的影响，我想由于你们的配给制度，所有的人都够吃吧？当然不是说吃得非常好。

毛：有足够吃的。各地情形不同，丰收的地区吃得多些，减产地区吃得少些，重灾区更少，但是都过得去。我们用各种办法救灾。湖北三千二百万人口当中，有五百万人口的地区，也就是六分之一的地区，是重灾区。

蒙：但是你们的配给制度和分配制度可以保证不发生饥荒，人人都有足够吃的。我在各地旅行时，没有看到一起营养不良的事例。

毛：大体是这样。

蒙：所以西方讲的全是胡说，是假的。我回去以后要告诉大家，中国人人都有吃的，只是要收紧一点裤带。这并不稀奇。我们在战争年代里也这样做过。事实上，我在这次旅行中，唯一看到营养不良的人的时候是在九龙。在香港有许多来自中国的难民，每年有四万人左右，但是其中没有发现一起营养不良的事例。

毛：你问我对中国怎样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这比我们在前一个阶段用二十四年的时间才找到全党同意的路线来打败蒋介石，要缩短一半。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

蒙：你们在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有能力的人派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

毛：根本没有。搞大工厂，我们完全没有经验，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搞。我们只会办小工厂，搞农业。大工业我们没有办法。

蒙：但是你们得到了苏联的技术帮助？

毛：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人

员，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蒙：我在这次旅行中，去过包头、太原、西安、洛阳，这些都是从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的。例如太原本来只有四十万人口，现在有一百五十万。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去的？

毛：技术工人是从大城市去的，主要是上海，其次是天津、沈阳、鞍山、大连。包钢的工人就是从鞍山去的。

蒙：我看到的工厂中，技术工人一般都是年岁较大的，但是工人中绝大多数是年青人。这些年青人是不是从农村去的？

毛：年青人是本地找的，从乡村招来的。

蒙：他们愿意去吗？愿意到新的地方去工作吗？

毛：开头有点怕。他们从上海到包头、西安这些地方去，就如同你们英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去一样。起初他们听说北方冷，没有吃的。他们的母亲为他们准备了吃的、穿的。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并不那么冷，也有东西吃，就乐于住下来了。

蒙：包头冬天是很冷的，冷到零下三十度。

毛：一年有那么几天，并不全都那么冷。

蒙：新的大城市也会在供应、交通运输方面遇到不少麻烦。主席认为将来的城市应该有多大？

毛：看来，城市太大不好。有几十万，如四十万到五十万，就好了。

蒙：中国的运输系统似乎很不发达。有人告诉我说，全部铁路干线只有两万五千英里长。像中国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应该发展

铁路线。我觉得就应该有一条铁路从西安到延安，再延伸到包头。

毛：应该这样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这需要时间。

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

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

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蒙：你们的六亿五千万人口中，农民是不是有六亿？

毛：没有那么多。农民大约有五亿多，城市人口有一亿多。我们想保持这个比例。

蒙：我觉得这个比例很好。

我读过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作为一个军人，我觉得主席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很有趣味。

毛：我们是同行。我们的问题曾经是怎样以弱小的军队战胜强大的军队。

蒙：英国在同希特勒德国打仗的初期，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

毛：对。但是有一个不同，你们有同盟国，有苏联，有美国。我们没有，只好靠自己。而蒋介石有强大的同盟国——美国。

蒙：不！在战争的初期，我们没有盟国。

毛：你们起初有法国，后来法国亡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也一个一个倒下去了。你们本来还有波兰、巴尔干半岛，但是也丢了。

蒙：对。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欧洲的灯光一个个地灭了。

我对于由孙中山开始而后来由毛主席接着完成的革命很感兴

趣。孙中山似乎没有懂得，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唤醒群众。同时他也似乎不懂得要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建立红军。但是毛主席却在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建立了红军。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毛：基本上对。

蒙：既然主席领导的革命是以五亿农民为基础的，因此，在革命胜利后，首先就必须改善农民的处境。

毛：就是这样。

蒙：否则你们就不能存在下去。

毛：对。孙中山没有提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不提这两个口号，人民怎么会跟你走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开始时是反对你们英国，后来是日本，到了后期才是美国。你们退出中国是在日本打进来之后，在一九三七年。那时，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日本走了以后，主要的敌人就变成美国，直到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欧洲人，不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对你们，我们已经没有仇恨，我们欢迎你们。对于日本人，我们也没有仇恨了，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来。

蒙：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倒是非常奇怪的。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认为对日本可以无恶不作，但是现在却对日本采取好事做不完的态度。

毛：它要扶植日本的一部分人，日本的亲美派。

蒙：我在广州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看到主席当年怎样在那里训练干部，然后把他们派回农村，宣传革命的道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想法。孙中山就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他不懂得要进行革命必须派干部到广大的农村去，向农民宣传革命。

毛：对。

蒙：我在主席的一本书里读到这样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对这句话应怎样理解？

毛：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

蒙：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

毛：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

蒙：我有一次问一个非洲的酋长，怎样保证实现酋长继承的制度。他说："这要由我的剑来保证。"

毛：英国的革命经过战争没有？

蒙：有过一次，即在克伦威尔推翻查理一世的时候。那时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但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革命似乎很不费力，吃一顿午饭的时间就可以搞完一次革命。

毛：那不算革命，那叫政变。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蒙：古巴的革命没有用多长时间。

毛：三年不到。但是法国的革命比英国的复杂，反反复复，经过多次战争。

蒙：我记得上次同主席谈话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不是一切革命都是坏的，有的还是好的，如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

毛：我不是这样讲的。

蒙：不，当时是我这样讲的。

毛：我当时说，凡是推翻剥削和压迫、执行人民的意志的革命都是正义的。美国的革命虽然对你们英国不利，但当时美国必须进行革命。

蒙：美国的革命对英国也不无好处。要不是美国革命，那部分保皇党分子就不会北上，英国也就不会得到加拿大。要不是由于克伦威尔的革命，英国今天的情况也会很不相同，也许还会保留查理一世时的政治制度。往往要通过革命才能扫去旧政权的许多暴虐。

毛：我看，革命会使流血痛苦短些，损失少些。例如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仗，一共二十二年，其中同日本打了八年，牺牲很大，但还是很快就恢复过来了。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

蒙：根据我的了解，先是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然后到了一八八〇年左右，孙中山无法容忍了，于是开始进行革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通过革命扫除暴虐。现在，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

毛：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

蒙：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

毛：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譬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

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见共产主义了。他们（指在座的年青人）可以看得见。

蒙：主席今年多大岁数了？

毛：六十八了。你呢？

蒙：七十四。

毛：我比你小六岁。

蒙：这不算什么。我同刘少奇主席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谈话。

毛：在上海，我就给你介绍过刘少奇主席。这次你看见了。

蒙：对，刘少奇主席通知我去见他。他同周恩来总理同岁。他头发都白了，比周恩来总理显得老些。他非常聪明，是一个思想家。为什么他会显得比周恩来总理老？是不是因为他过去的生活更艰苦些？

毛：差不多。个人的特点不同。少奇的白头发比我还多。

蒙：你的头发不算白。

毛：有一部分白了。

蒙：刘少奇主席看上去很尊严，一头白发。我既不吸烟也不喝酒。

毛：我不喝酒，只吸烟。

蒙：我愿送你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

毛：谢谢你。

蒙：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关于三项原则[1]的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地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多年来，我可以说是坐在头排位置上观察国际政治。我参加过西方防御机构的工作。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而西方的政治领袖们似乎找不到摆脱这个泥坑的办法。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

毛：不是整个西方，缺乏常识的只是美国。

---

[1] 指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提出的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蒙：还有别的人。

毛：别的人是跟着美国走。

蒙：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去，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主席读过我昨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宴会上的演说吗？

毛：读了。

蒙：你对我一揽子提出的三项原则有什么看法？

毛：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二十次，总可以见效。你不是说要活到一百岁吗？那还有二十几年。在你去见上帝之前看到解决是有希望的。三项原则提得对，提得好。

蒙：我要动员世界舆论。不仅动员东方集团的舆论，还要动员不结盟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舆论。怎么做呢？我离开中国以后，下星期就准备到加拿大去，十月六日我准备在多伦多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这次广播演说全加拿大的电视台都可以转播，美国的一些电台也会转播。

毛：那好。

蒙：然后，我要回伦敦去，在十月十六日的晚上，再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那是一次星期一晚上例行的广播节目，观众有一千五百万人。这两次演说，是会有作用的，但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毛：凡有机会就讲。

蒙：如果东方集团在那个时候对我的三项原则表示态度说："对，我们同意，这是很好的意见。"如果中国和莫斯科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那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在国外没有军队，但是苏联有。

如果赫鲁晓夫也能出来说："只要美国、英国、法国从欧洲、德国撤出它们的军队，我也把军队撤回苏联去。"要是他也这样说，那就更好了。他从来没有断然这样说过。

毛：他说过。

蒙：我是说他没有"断然"这样说过。

毛：一个中国，两个德国，撤军，他都是赞成的。

蒙：我曾经建议陈毅元帅跟葛罗米柯去说一说，希望苏联也和中国一样响亮地支持我的三项原则。

毛：你是不是去苏联走一走？

蒙：我现在不能去。

毛：今年不能，明年去。你到那里去讲三项原则，就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公开支持你。

蒙：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当你要使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一下子得罪许多人。我这次在中国提出三项原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如果我到苏联去，就会得罪更多的人，所以我不去。请陈毅和葛罗米柯在东方讲，我到加拿大和伦敦去讲。

毛：你对陈毅说了没有？

蒙：说了。

毛：那可以。

蒙：我可以在西方推动这件事。但是，我不想在东方再起多大的作用。莫斯科是在东方，所以我不想去。我在本国有很强的地位，如果我在共产党东方旅行太多了的话，那末英国人民就会说，这个家伙怎么搞的，这将损害我的地位。如果我想推动这件事情，我就必须维持我的地位。

毛：你的地位不会动摇。你的基本思想是要和平。

蒙：人民是会跟我走的。他们会赞成我的主张，尽管西方有很多人不同意你们的意识形态。

毛：如果不同意，他们不信就完了。

蒙：对，我主张彼此不要干涉内政。西方国家一遇到问题，它们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就是如此，还有老挝，还有印度支那。它们以为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不然，我说大家都把军队撤走，让朝鲜人自己来决定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

毛：对。

蒙：这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做法。

我跟斯大林很熟悉。第二次大战以后，我到莫斯科见斯大林的时候，曾经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请他把两者的区别给我解释一下。他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又问他，那你们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他说，不，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必须要有极丰富的产品以供分配，我们还没有那么富，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

毛：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

蒙：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

毛：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毛：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蒙：你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吧？

毛：没有什么极端的形式。

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有过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工党决不会说，他们的社会主义跟你们的相同。

毛：跟我们的不同。

蒙：那你们的是更极端的形式。

毛：是两种。他们的那种不是社会主义。

蒙：是右翼的？

毛：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跟工党朋友、跟艾德礼谈过，说他们的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是正常的，是苏联类型的，同苏联基本上是一样的。

蒙：我可不那么认为。我觉得苏联的革命是少数人把必要的一些人枪毙了以后夺取政权，而不是在广大的农民的基础上从下而上进行的。

毛：不能那么讲。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群众的暴动，先在首都爆发，后来发展到其他城市。工人和农民都组织起来，参加了这个革命。

蒙：今天谈话非常有趣，不过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

毛：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蒙：今天谈话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要好好地想一想，把这些问题想通，还要着手写演讲稿，并且准备将来在报上发表的文章。

毛：你明天到广州去吗？

蒙：我宁可在这里多留一天，广东太闷热。我在二十六日必须

赶到香港，因为我同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有约会，共进晚餐。我希望明天能够在这里安静地过一天，不安排任何节目，以便我起草稿子和休息。这次旅行使我很疲劳了。

毛：你应该好好休息。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

1961年9月，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深切交谈。

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1]

（1961年9月24日）

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核武器的问题，争论很多。我在北京也同刘少奇主席谈起中国的核政策。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纽〈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蒙：我也想，在你们的各项事业的安排中，发展核武器恐怕要摆在很后的地位。

毛：就是，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

[1] 这是毛泽东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的一部分。

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

蒙：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毛：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

蒙：现在英国有很多人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我对他们说，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裁军，最后一件事才是销毁核武器。

毛：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

蒙：现在还做不到，首先必须消除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为此就要把军队撤回到各自的国土上去。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去访问日本的原因，我必须首先推动实现我的三项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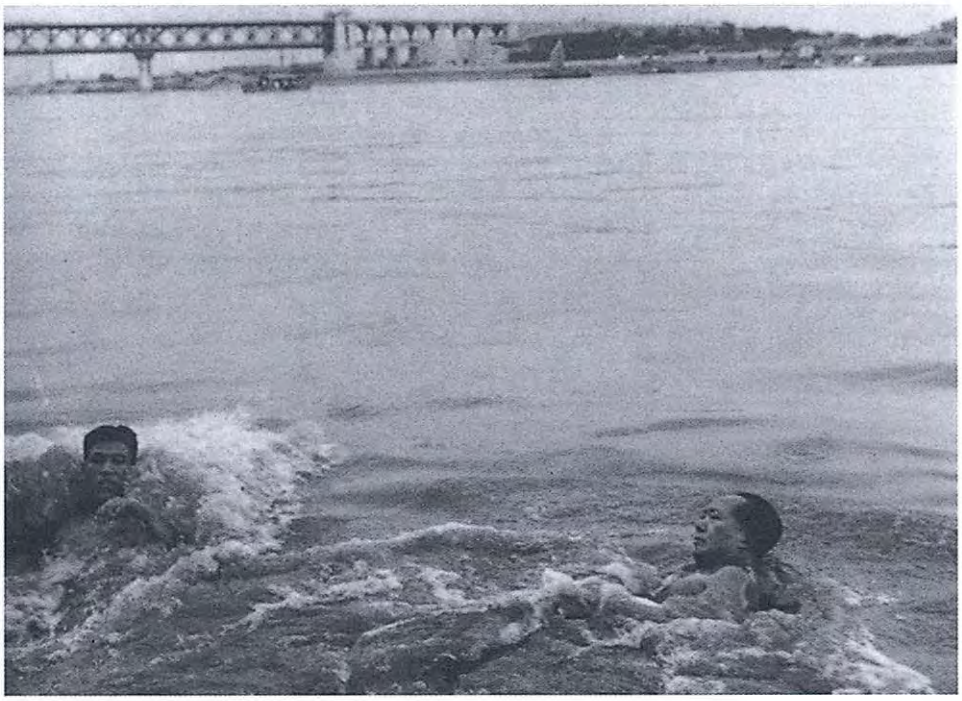
毛：那好，三项原则实现了，再禁止核武器。

蒙：我跟陈毅元帅讲过，希望他和苏联讲一讲，要他们也出来支持我的三项原则。

毛：他要到日内瓦去参加老挝问题的那个会[1]，可能碰到葛罗米柯，找个机会谈一谈，我赞成。

---

[1] 指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了老挝的中立地位和尊重老挝主权、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内政不受干涉等原则。但是美国违反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并于1960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南越、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另外还有印度、加拿大、波兰、泰国和缅甸。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横渡长江。

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和王任重、胡耀邦交谈。

邯郸谈话会记录[1]

（1961年9月27日）

刘子厚　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王路明　省委候补书记，管农业
康修民　石家庄地委书记
庞　均　邯郸地委书记
胡开明　张家口地委书记
刘　琦　邢台地委书记
李悦农　保定地委书记
周　兴　山东省委书记，管农业
程怀仁　山东农村部副部长

不行三包一奖，行大包干制：大队有机动粮。这种机动粮，如国家急需，交一部分给国家；再以一部分支援一些遭灾的及生产不好的队（用借的方法）；再一部分作贮备粮。

另有公积金，公益金，一部分管理费，一部分生产费。

---

[1] 这是毛泽东1961年9月27日在邯郸召集的座谈会上所作的记录。9月2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研究、讨论。10月7日，中央将这一座谈会记录及其他一些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材料一同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帐。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

反对意见：（1）退到初级社；（2）不利于基建；（3）征购辫子太多；（4）有些遭灾队不易支援；（5）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6）要变动时困难太多。其实，这六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回答。

保定专区唐县峒龙公社：

十一个生产大队。

都是大包干。

名义上对县对区都实行三包一奖，实际上是大包干。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群众拥护。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一九五七年相当，并很胖，猪保持一九五七年水平。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大队统一交，下死上活。

四种人：

（1）投机商；（2）热心自留地、小片开荒，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3）懒汉；（4）盲流分子。对以上四种人群众最痛恨，要设法制住他们。

大队应管之事：

（1）征购；

（2）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等；

（3）学校（小学）；

（4）必要的基建，如水利；

（5）必要的救济；

（6）必要的补助；

（7）民兵，治安保卫；

（8）作物安排（计划管理）；

（9）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1961年9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及古巴统一革命组织政治局委员马丁内斯·桑切斯会谈。

1961年9月，毛泽东到钓鱼台国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给中央常委的信

（1961年9月29日）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

---

[1] 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50%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的大丰收，怎样能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2] 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小队矛盾问题的座谈意见》。这个材料说：几年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社员生产不积极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解决的办法，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

五日的报告[1]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2]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3]，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4]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61年9月25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一部分社员和基层干部提出：如果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穷队与富队的矛盾问题，很难解决。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完成国家征购和按比例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试点经验证明，这样做，解决了以队为单位生产却以大队为单位分配的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目前情况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能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请求允许进一步开展试点。

[2] 指毛泽东1961年9月27日在邯郸召集的谈话会上所作的记录。记录中提到：“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

[3] 河北省的一批材料，共5件。第一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1961年8月17日关于在保定地区调查分配大包干的情况给省委的报告。第二件是中共保定地委1961年9月8日关于分配大包干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报告。第三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1961年8月18日关于唐县峒龙公社张显口生产大队执行分配大包干情况的简要说明。第四件是中共张家口地委1961年8月25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试行收益分配大包干情况给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的报告。以上4件对实行分配大包干给予了肯定。第五件是河北省藁城县岗上公社良村生产大队制订的1961年“三包一奖”粮食包干合同。

[4]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60条。

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1]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2]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3]。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4]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5]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6]，并在这个

---

[1]　“三包一奖”，是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简称。

[2]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

[3]　指邯郸谈话会记录中的“大队应管之事”（9条）：一、征购；二、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等；三、学校（小学）；四、必要的基建，如水利；五、必要的救济；六、必要的补助；七、民兵，治安保卫；八、作物安排（计划管理）；九、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4]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29条规定的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的自主权：有权因地因时种植；有权安排农活；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选留和管理本队的种子；有权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牧场的条件下，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权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

[5]　指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6]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毛泽东3月16日在材料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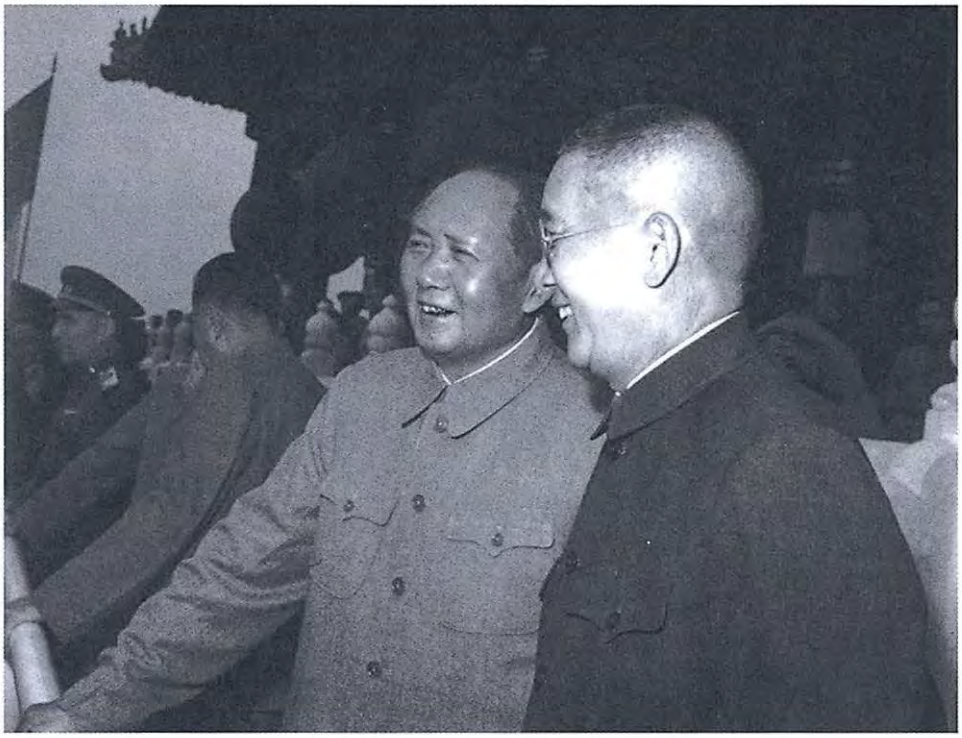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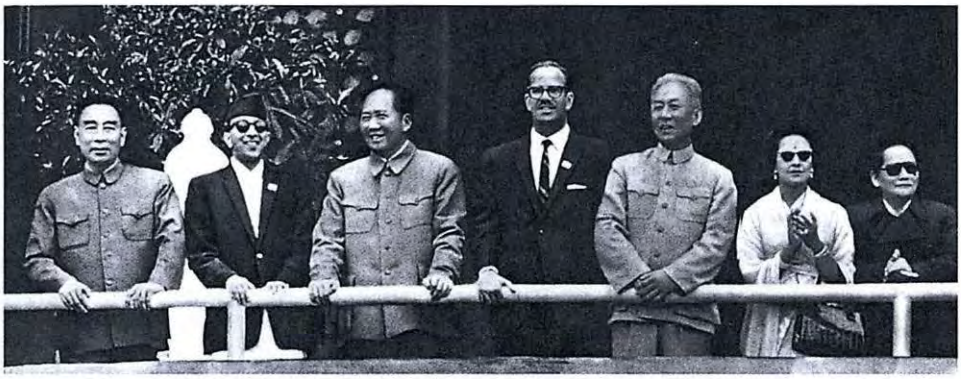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于1961年10月7日发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次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建国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及王后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晚，毛泽东陪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观看国庆焰火。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和留尼汪共产党总书记保罗·维尔吉斯等合影。

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

（1961年10月4日）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1]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2]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泽东

十月四日晨五时

---

[1] 柯老，指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任穷，即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2] 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以便中央作出决定。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的谈话

（1961年10月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陛下身体好吗？问题都解决了吗？

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以下简称马）：都已经谈好了。

毛：公平合理吗？

马：是的，我们同意。

毛：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双方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

马：我们完全知道。

毛：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

马：我们很欣赏这种伟大的说法。

毛：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称它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公开教育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有时也会出一些问题，有些干部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别人。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教育，并作适当处理，使他们改正缺点。我们国家什么情况都有，旧的也有，新的也有；落后的也有，先进的也有。

马：中国是一个辽阔的国家。

毛：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

门，拖拉机很少，实现机械化还得要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业，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它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不在中国建设什么。例如钢铁，从清朝开始到蒋介石失败为止，这段时间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每年只生产四万吨钢。可以说我们没有钢铁、机械工业和地质工作。我们当时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有十几万人了。发现地下的财富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究竟有些什么。要钻探，打洞进去，这不是用手工所能办到的，需要用机器深钻，钻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或者更深，要用很多钢管，要有钻机，还要有经过训练的技术工人。钻探石油就得如此，不然就得依靠进口石油。别的东西如煤、铁和有色金属也一样。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不能炼钢，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你们国家面积很大。

马：约有十四万平方公里。

毛：人口也不少。

马：约有九百多万人。

毛：比澳大利亚的人口还多。希望你们好好搞，一天天富起来，强起来。

马：我们正在努力发展，争取从友好国家例如中国得到援助，希望这次在途中同周恩来总理进一步商谈。

毛：好，再谈一谈。你们可以慢慢地好起来。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从没有到有，从少到多。你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就是要有时间，过几十年，就更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几十年。蒙哥马利元帅说需要五十年时间。我说

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对胡耀邦[1]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

（1961年10月6日）

此件[2]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原件退毛。

---

[1] 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2] 指胡耀邦1961年10月2日报送毛泽东等的农村考察报告，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说，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号到29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五）调动

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活、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 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 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 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 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九）市场、中小城镇生产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开放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 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 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1年10月6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欣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西德军国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植下，已经复活起来，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同时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继续顽固地阻挠对德和约的缔结，坚持对西柏林的非法占领，并且正利用它们一手制造的所谓“柏林危机”，加紧扩军备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再一次郑重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的坚定立场和合理主张。我们相信，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德两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我们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深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莫斯科会议声明[1]的基础上，中、德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0月6日

[1]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对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61年10月7日）

---

[1] 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稿指出："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上曾经初步考虑过，现在应当重新考虑。""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在试行的时候，必须注意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畜农具，不受损失。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十一月底以前，把你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本篇一写在这一指示稿的手抄件上，毛泽东将此件拟题为《中央指示（草稿，待讨论）》；本篇二写在这一指示稿的铅印件上，毛泽东将标题改为《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这两次稿上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一

照印发各同志。

二

请彭真[1]同志办。

毛泽东

十月七日一时

三

附去毛泽东同志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纪录[2]和河北省的五件材料，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3]，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邯郸谈话会记录，指毛泽东1961年9月27日在邯郸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做的记录。

[3] 指中共湖北省委9月25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

山东省的两件材料[1]，广东省一件材料[2]，请你们参考。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

---

[1] 山东省的两件材料，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意见》（原载于山东省委办公厅1961年3月17日编印的《农村工作情况》第五号，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作了转载）和山东省委10月5日关于“三包一奖”问题的情况报告。山东省委10月5日的报告说，关于“三包一奖”问题，我们利用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在省开会的机会，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反映，自今年春季广州会议后，在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反对平均主义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这个办法时发生了一些矛盾，主要是各生产队之间，由于大队统一分配，存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结果就闹瞒产私分；“三包”实际上包不住，大队搞的一套基本上是无效劳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各地都摸索出了一些办法，名目很多，性质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把分配权交给生产队。在座谈中，除烟台地区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办法外，其他8个地区都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势在必行。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1）干部、社员都很高兴，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特别是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2）大队干部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只要有三四人就够了。（3）社员对分配心中有数，真正做到“一年早知道”，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瞒产私分的问题完全解决了。（4）可以增加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商品量。（5）对保护和增加牲口、农具，恢复农业生产有利。同时，大家还反映，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2] 广东省一件材料，指中共广东省委调查组1961年3月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办法后的情况报告。

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1]

（1961年10月7日）

我非常欢迎朋友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

现在不仅你们受压迫，我们也受压迫。我们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日本政府进入了联合国，我们还没有。美帝国主义占领你们的领土冲绳，在你们国内设立了军事基地，你们的国家处在半占领状态。我们的台湾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

我听说你们来到北京感到非常高兴。在我们这里，我们热烈欢迎你们。但是在你们那里，情况就不同了。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在于美国在日本的朋友，即日本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也有反对你们的人，那就是蒋介石集团。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

[1] 这是毛泽东和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

分”。日本的岸信介[1]和池田勇人[2]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积极地向他们做工作，对一切有机会做工作的国家都进行工作，希望你们也这样做。假使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那末百分之十就是二亿七千万人，剩下二十四亿三千万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不是说我比你们高明。

我们对人民要做工作，因为并不是二十四五亿人口都有觉悟，人民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比方，贵国人民觉悟起来也有一个过程。去年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垄断资本，掀起了一个大高潮。今年斗争有些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悲观。有高潮，有低潮，再有高潮，再有低潮，是波浪式前进的。看起来是低潮，但实际上是在酝酿一个新的高潮。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怪得很，人民手里最初没有武器。中国人民从前也是没有武器的，但最后取得了胜利。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过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共产党，也没有想过要进共产党。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共产党吹牛皮，根

---

[1] 岸信介（1896—1987），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任日本内阁首相。他在任期内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池田勇人（1899—1965），1960年至1964年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本不在话下。十二个代表中有几个人变质了，例如陈公博[1]、周佛海[2]，后来当了汉奸。周佛海是在你们日本留过学的。还有一个变成了托派，此人现在在北京，叫刘仁静[3]，他曾经到土耳其见过被苏联驱逐的托洛茨基[4]。还有一个张国焘，后来是个背叛分子，此人现在在香港。还有几个人牺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董必武副主席和我，还有一个李达[5]。一九二一年那个时候，党员人数很少，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

你们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我劝你们要研究失败的经验，当

---

[1]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乳源人。1921年7月以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

[2]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17年赴日本求学。1921年7月以留日代表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3]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21年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4]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5]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哲学家。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等职。

然同时也要研究成功的经验，这样可以做比较。除了研究中国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军事路线以外，一定要研究中国革命所犯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在座的有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学家，有的还是中国历史研究家，希望你们能够研究中国历史的曲折道路。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1]翻译一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向日本人民问候。

---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

1961年，毛泽东接见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时和团长三岛一握手。

1961年，毛泽东会见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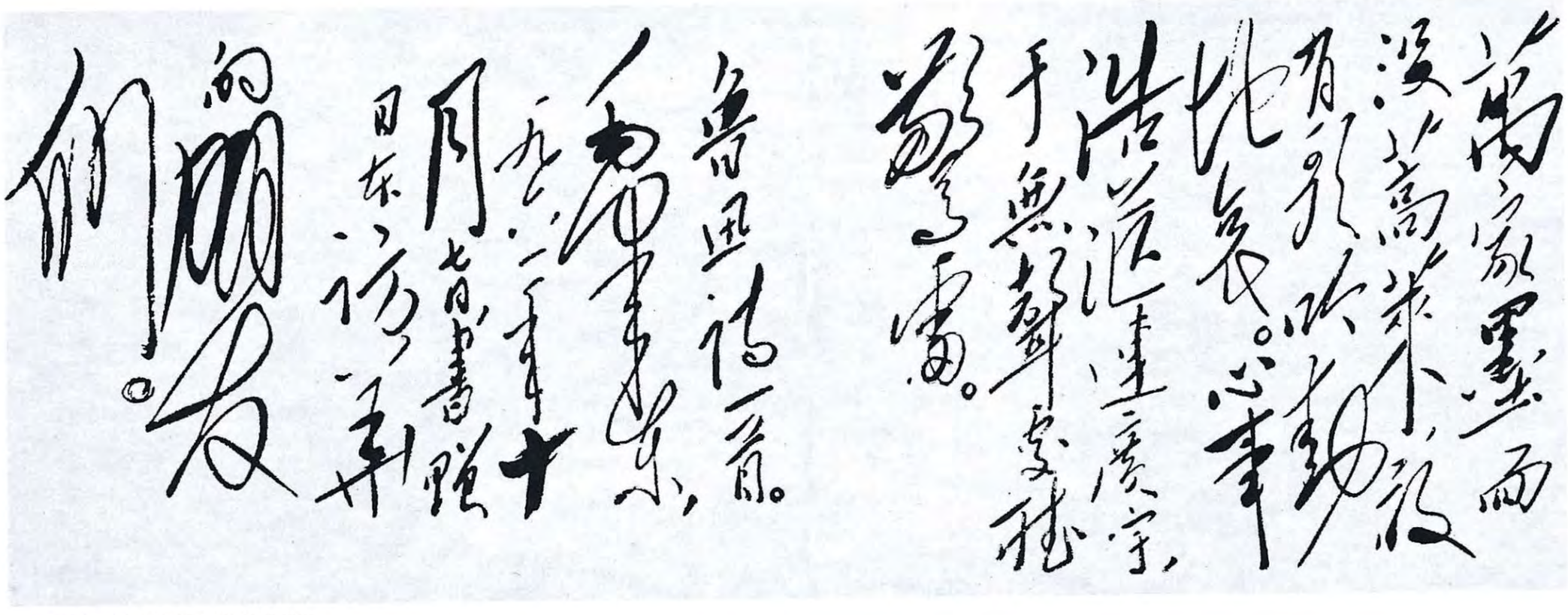
为日本访华朋友们题词[1]

（1961年10月7日）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1] 1961年10月7日，日本以黑由寿南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和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家代表团来到中国。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们并题词。



毛泽东为日本访华朋友们的题词。

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假说》一文的批语

（1961年10月9日）

陈伯达[1]同志：

此文[2]可以一阅，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人，在何处。

毛泽东

十月九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光明日报》1961年10月6日发表的《论假说——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文章共分“什么是假说”“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与世界观”“形成假说的步骤”“假说产生的根源”和“形成假说应该注意的事项”七个部分。作者张巨青是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

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1961年10月14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1]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胜利地返回地面，为人类征服宇宙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

你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新的纲领，提出了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的计划。我们相信，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苏联人民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普遍裁军和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支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一切成就，对于正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全世界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鼓舞。

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和友谊，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是永恒的，是久经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

我们衷心地祝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祝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斗争中，取得新的伟大的成就。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对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材料的批语

（1961年10月15日）

陈伯达同志：

此件[1]请一阅。你到唐山去时，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阅后退毛。

---

[1] 指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1961年10月9日整理的《目前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材料，载于中共中央办公厅10月1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一〇期。材料中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采掘关系，企业管理，设备器材，生活与思想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煤矿内部问题，后两个问题与外部关系较多。人和物的工作问题经常交替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人的工作做得好些，物的工作就突出了。物资供应工作好一些，不做好人的工作也不行。从最近情况看，影响煤炭生产水平上不去的主要是人的问题。二、经过转正、晋级和增加劳动保护用品等一系列工作后，工人队伍比以前更加巩固了，绝大部分工人对煤矿还是留恋的。三、目前职工除了对设备、工具质量差，材料供应不足有意见外，考虑较多的还有生活问题，包括粮食不够吃、物价尤其是蔬菜价格过高、工资等级规定的范围太窄等问题。此外，还存在基层干部待遇较低的问题。四、目前干部当中病号很多，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

（1961年10月16日）

此件[1]已阅，除关于六十条者[2]、已圈掉不用〔者〕[3]外，其他

[1]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材料，主要是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党的生活的若干论述。目录如下：一、执政党的地位，对我们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按照党章办事，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三、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四、正确进行党内斗争；五、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六、加强党的团结。

[2] 《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第42页上摘录了毛泽东1958年1月31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以下两段话："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遍〈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在审阅时，毛泽东删去了这两段话。

[3] 《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第44页上摘录了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中以下一段话："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段话在送毛泽东审阅时即已删去。

都可用。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送田家英[1]同志。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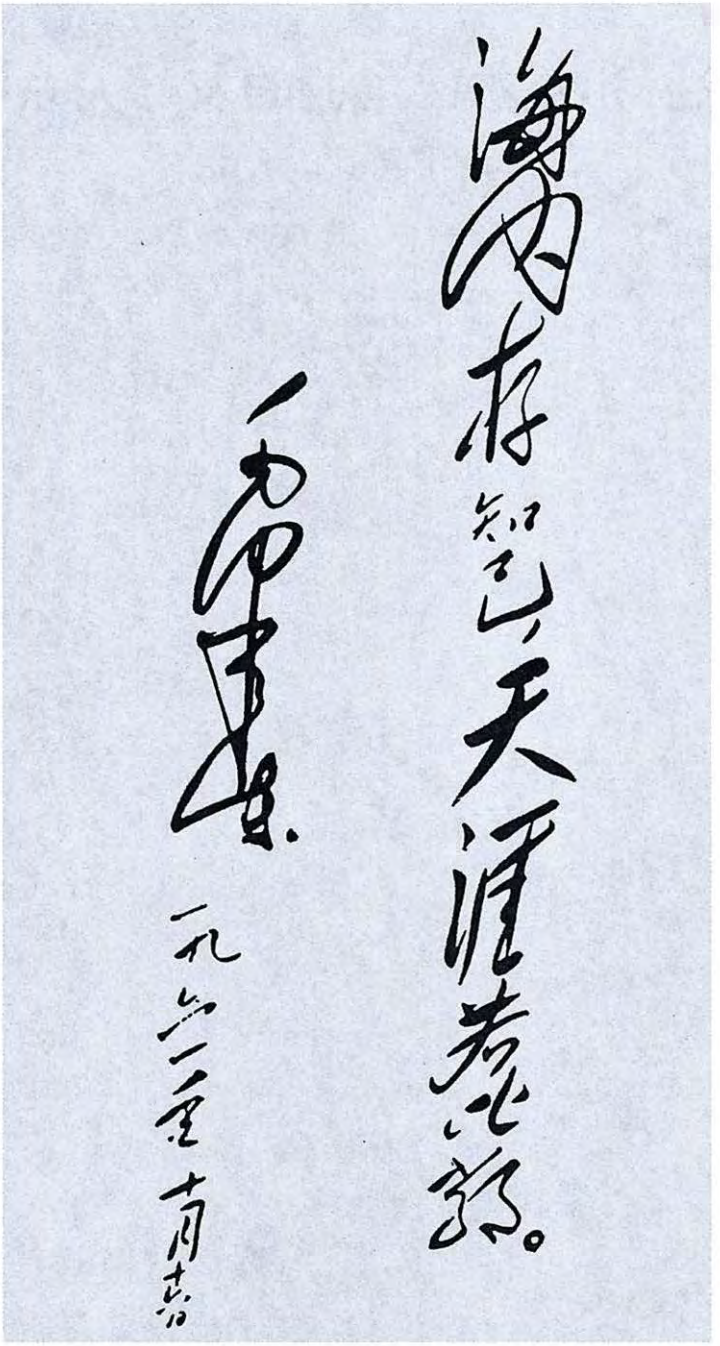
为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题词

（1961年10月16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为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的题词。

关于转发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经验的批语

（1961年10月22日、23日）

一

尚昆同志：

河北省委所送《南宫县经验》[1]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2]，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1961年10月22日晨

---

[1] 指中共邢台地委1961年10月6日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通报说，南宫县分两批召开小队长以上四级干部会议，把大包干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具体表现为：一、贯彻大包干政策后，小队产量报实了，给完成征购任务奠定了物质基础。二、大包干政策调动了生产队、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种麦运动。三、大包干教育了减产队，促使他们向先进队看齐。以上事实证明，实行大包干、实物按劳分配加照顾，是进一步克服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重要政策，是推动征购、种麦的动力。

[2] 杨尚昆1961年10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转发邢台地委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通报的指示稿。本篇二就写在杨尚昆起草的这一指示稿上。

二

少奇、小平[1]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61年，毛泽东迎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回到北京的周恩来。

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迎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归来的周恩来。

对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1]等的批语

（1961年10月30日）

一

即送刘、周、朱、陈、林、邓[2]阅后，交尚昆发。

毛

卅日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961年10月30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指示稿说："当前农村工作是繁重的，各地必须集中力量做好粮食征购、农副产品收购、秋收种麦、生产救灾等各项工作。因此，对于改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目前还是按照十月七日中央的指示，只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要普遍推广。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办法，除少数地区由于各级领导已经有了直接经验，干部和群众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实行了对当前工作确实能起推动作用的，可以分批推行以外，多数地区，仍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批推行。""为了使牵动的面不要太大，各地的秋后分配和年终分配，一般地都按照原来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不要轻易变动。"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材料[1]部分，各同志可以不看。

二

这些材料都可转发[2]。

毛泽东

十月卅日

[1] 指杨尚昆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时附送的另外四个文件：一、中共中央东北局1961年10月26日关于东北三省实行大包干办法的电话汇报。二、中共中央西北局10月23日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三、中共江苏省委10月24日关于贯彻执行大包干政策给中央、华东局的请示报告。四、中共广东省委10月18日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的报告。

[2] 1961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杨尚昆附送毛泽东的这四个文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题为《中央转发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贯彻执行大包干办法的四个文件》。

为李家骥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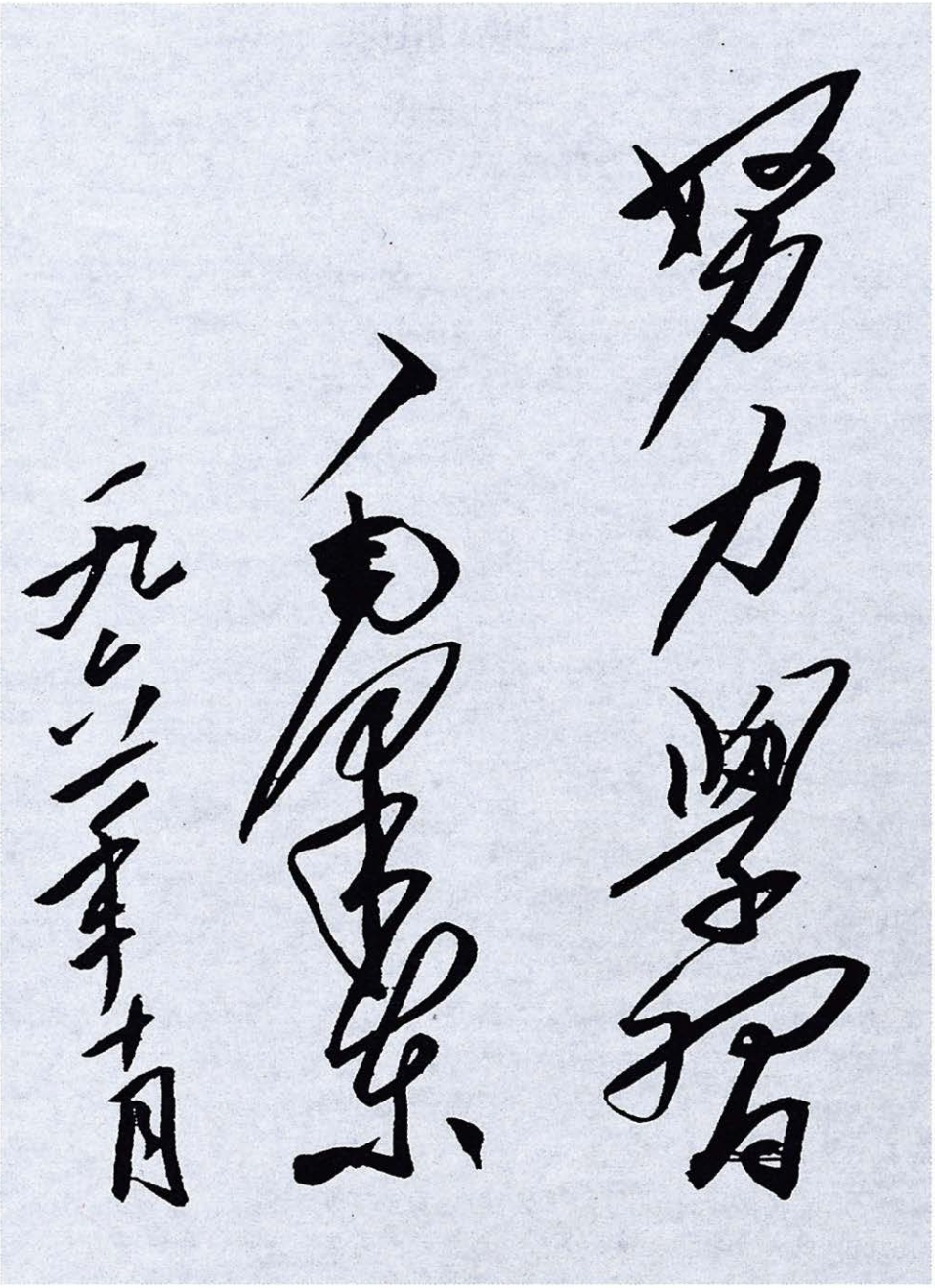
（1961年10月）

努力学习。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

[1] 李家骥，山西盂县人。当时任毛泽东的卫士。1961年10月，为响应毛泽东到基层工作的号召，他提出到东北支援油田建设。李家骥启程到大庆前，毛泽东给他题写了“努力学习”四个字，并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为李家骥的题词。

七绝·屈原

（1961年秋）

屈子[1]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2]
艾萧太盛椒兰少，[3]
一跃冲向万里涛。[4]

---

[1] 屈子，指屈原。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楚人，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曾辅佐楚怀王，官至左徒、三闾大夫，遭谗去职。楚顷襄王时被放逐。因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深感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

[2] 手中握有杀人刀，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

[3] 艾萧太盛椒兰少，艾萧，即艾蒿、臭草，这里比喻奸佞小人；椒兰，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这里比喻贤德之士。

[4] 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1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胜利前进。

几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无限的喜悦。

中苏两国人民有着亲如手足的深厚友谊。我们两国无论在建设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中，或者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始终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久经考验的，是任何力量所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力量继续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为加强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实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1月6日于北京

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1]

（1961年11月11日）

从这两件事[2]，可以看出各兄弟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感情的深度和广度。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

---

[1] 这是对新华通讯社1961年11月编印的《内部参考》国际版第一九五期、二〇〇期上分别登载的《我歌舞剧院演出轰动了列宁格勒》和《保人民敬仰毛主席热爱中国》两篇文章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上述两篇通讯所报道的情况。前一篇通讯说，我国中央歌舞剧院在列宁格勒的演出，轰动了这个城市。观众赞叹我艺术成就时，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种情绪在周恩来副主席在苏共二十二大讲话全文发表以后表现得特别强烈。观众留言簿上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留言，如："光荣属于中国！""伟大人民的伟大艺术！""只有伟大的人民才能有如此丰富而全面的艺术！""伟大的兄弟般的中国人民万岁！""光荣属于中国人民！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10月14日，首次上演舞剧《宝莲灯》，观众鼓掌、叫好达20分钟之久，演员谢幕15次。后面演出的各场票也很快售空，剧院不得不卖站票。21日晚第一幕休息时，一大群买不到票的人不顾层层阻拦，冲进场内，欢呼此举为"攻克柏林"。从苏联著名艺术家到普通观众纷纷向我们表示，演出的成功"简直出乎意料"。后一篇通讯说，从9月30日到10月5日，保加利亚约10个州（市）的17个工矿企业和农业社等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二周年的集会。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一些庆祝活动。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保加利亚人民敬仰毛主席，热爱中国。

（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同盟者，总之，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及其走狗，在全世界不过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十以下，而革命人民及其同盟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二十几亿人之多，这是毫无疑义的。印度反动派反华，印度人民并不反华，他们痛恨本国的反动派。1960年，中国农业展览会在印度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帮助，就是证据之一。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1961年，毛泽东会见出席世界记者大会的代表。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2]犹可训，
妖为鬼蜮[3]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

[1] 1961年10月，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根据《西游记》第二十七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作了一首诗，借以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本诗的主旨与郭诗相同（这也是毛泽东此后大多数诗词的主题），只是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郭读本诗后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两诗句中多用《西游记》故事，因为流传较广，现不加注。

[2] 愚氓，氓，古义通“民”。愚氓，愚蠢的人。

[3] 鬼蜮，蜮，古代传说中水里一种暗害人的怪物。鬼蜮，即鬼怪，后来比喻阴险作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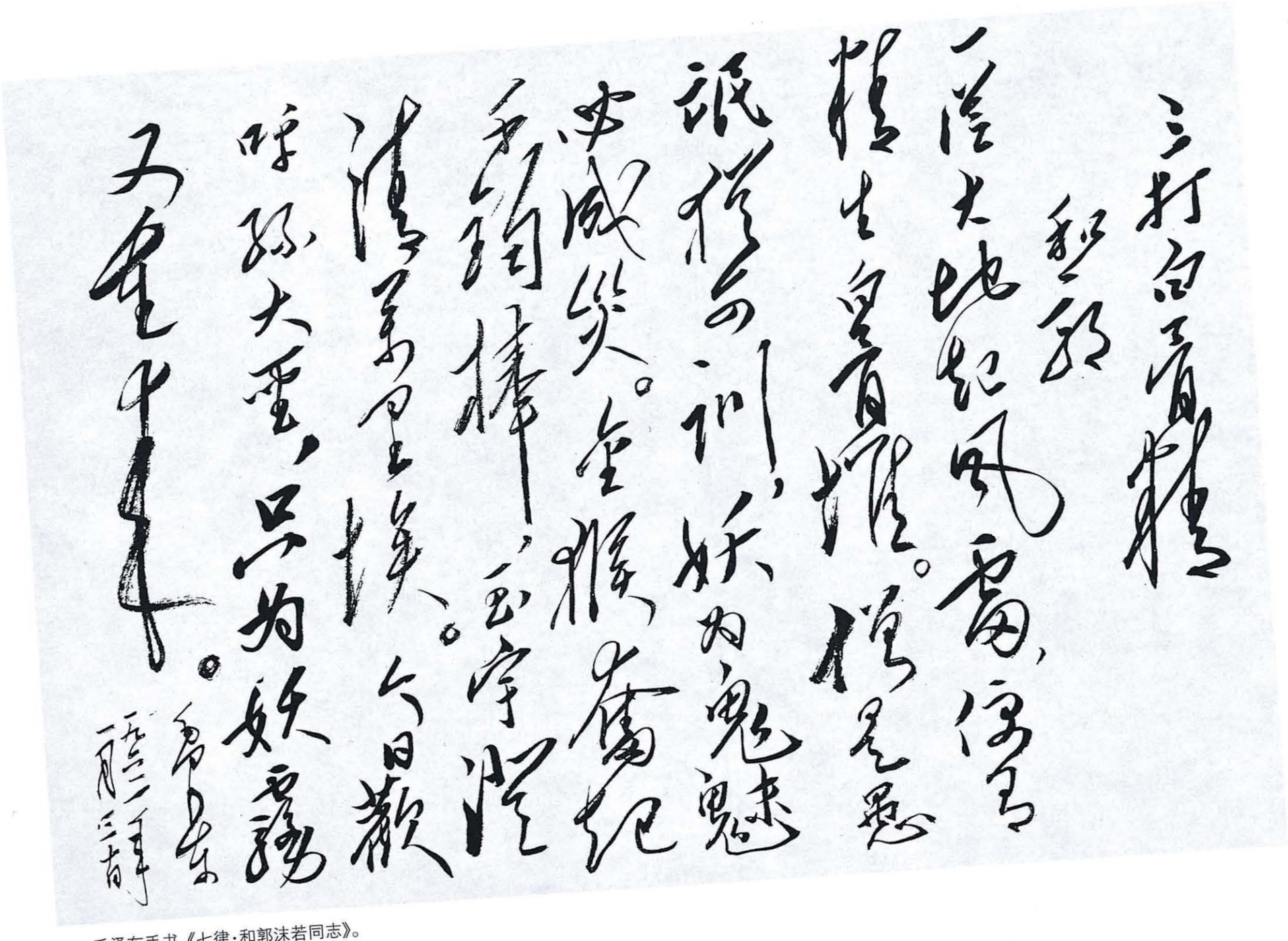
附：郭沫若原诗

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1]。
千刀当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2]犹智慧胜愚曹。

[1] 累三遭，接连三次。

[2] 猪，指猪八戒。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玉宇澄清万里埃》（诗意画）

关于选看一些材料给江青的批语

（1961年11月19日）

一

一批材料[1]，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

毛泽东

1961年11月19日

---

[1] 这批材料共有5种：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1年4月2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的5篇材料。在其中的第四篇《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一文标题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批示“江青阅”；在其中的第五篇《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一文标题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该文讲到赫鲁晓夫有三点令美国人难以置信，毛泽东在这三点旁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二、毛泽东1961年4月15日批示印发的几个重要文件。三、中共中央1961年5月17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四、中共山东省委1961年4月4日关于宣读讲解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试点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五、中共中央办公厅1961年4月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四二号刊载的河南省潢川县两个生产队干部和少数社员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反映。在第二、三、五种材料上，毛泽东均批示“江青阅”；在第四种材料上，毛泽东批示“送江青阅”。

二

这三条[1]都可以解释。

[1] 指《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这一内部材料中所说赫鲁晓夫令美国人难以置信的三点。这三点分别是：(1) 目前国际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空前有利，为什么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世界革命”，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2) 西方仍有着“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核打击力量，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以对付共产主义集团”，赫鲁晓夫有什么理由断言“猎获物已放进口袋”或“资本主义包围已不再存在”？(3) 赫鲁晓夫真正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吗？“历史证明除非得到武装征服的支持或者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就在附近，非暴力的革命策略从来没有能够使任何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难道赫鲁晓夫根本没有从共产党人过去40年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吗”？怎么能够设想他会相信“美国有可能在得不到苏联武装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一次共产主义革命”？

对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调查报告[1]的批语

（1961年11月23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

总理、小平、彭真、震林[2]阅后，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中

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

毛泽东

廿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61年11月9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给毛泽东并报华东局、福建省委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我于10月24日离京南下，28日晚抵达福建龙岩。经过郑州、南昌时，分别听取了河南、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汇报，到龙岩后又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兹将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理办法报告如下：一、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但也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不再改变。二、在体制下放后，对小队规模一般都作了调整，除了原来规模很小的大队（如三四十户）不再分小队外，一般大队所属小队都比以前增多了。但也有许多群众存在越小越好的偏向，还有一部分人企图把小队划小后将来可以进一步实行单干。为此我们对今后小队划分规定了几条原则：首先，确定现有小队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其次，有些范围太大、需要划分的小队，规定小村一村一队，大村一村数队，但小队应以30户左右为宜。再次，应授权公社，各小队划分应经过公社批准，未批准前不得擅自划分，以免引起混乱。三、小队改划以后的土地调整：公社化时各小队所领土地与初级社时期未有变动的，现在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公社化以来各队土地已按劳动力多少重新搭配的，则需要调整。至于耕畜，也应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叫做“牛随田走”，犁耙等大中型农具则跟牛转移，新式农具仍归大队所有。四、关于新三包，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上交问题，各队情况不同，上交多少也不一样。五、体制下放后，小队会计不足，需要迅速

健全人民公社会计辅导员制度，开办会计训练班；至于过去的债务等，一般仍由大队负责处理，待小队划分、冬耕结束后再分别清理，这叫“新账从新起、旧账以后算”。六、体制下放后，大队主要负担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权方面的工作，如分派征购、抚恤救济、小学教育等。第二，党与政治工作。第三，联村社工作，如水利建设，护林防火，办好供销社，处理公益金、五保户等。第四，办好大队企业。七、关于粮食分配。大家一致同意河北省关于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认为这是当前提高社员出勤率的关键。八、关于山林问题。有林木的山，不应划归小队所有，以免群众因对林权不相信而大量采伐。至于荒山，则应完全划归小队所有，并发证立界，以确定所有权。靠近乡村的荒山，可以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1]

（1961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七年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久经考验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敌人的坚决斗争中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发挥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巨大的成就。现在，阿尔巴尼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的电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

亚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热情，为实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进一步发展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我们深信，紧密地团结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周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光荣成员，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南前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信守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1]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2]，坚决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对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不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

---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2]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阵营的利益的。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为发展中阿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作出最大的努力。

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1月28日

给臧克家[1]的信

（1961年11月30日）

克家同志：

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一月内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2]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11月30日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2] 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既要有总路线，还要有具体政策[1]

（1961年11月）

单有总路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要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善起来。如无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善的政策，总路线即不可能完全实现。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时谈话的一部分。

1961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胡志明主席。

1961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亲切会见胡志明。

关于了解江苏省经济工作的经验给李先念、姚依林[1]的信

（1961年12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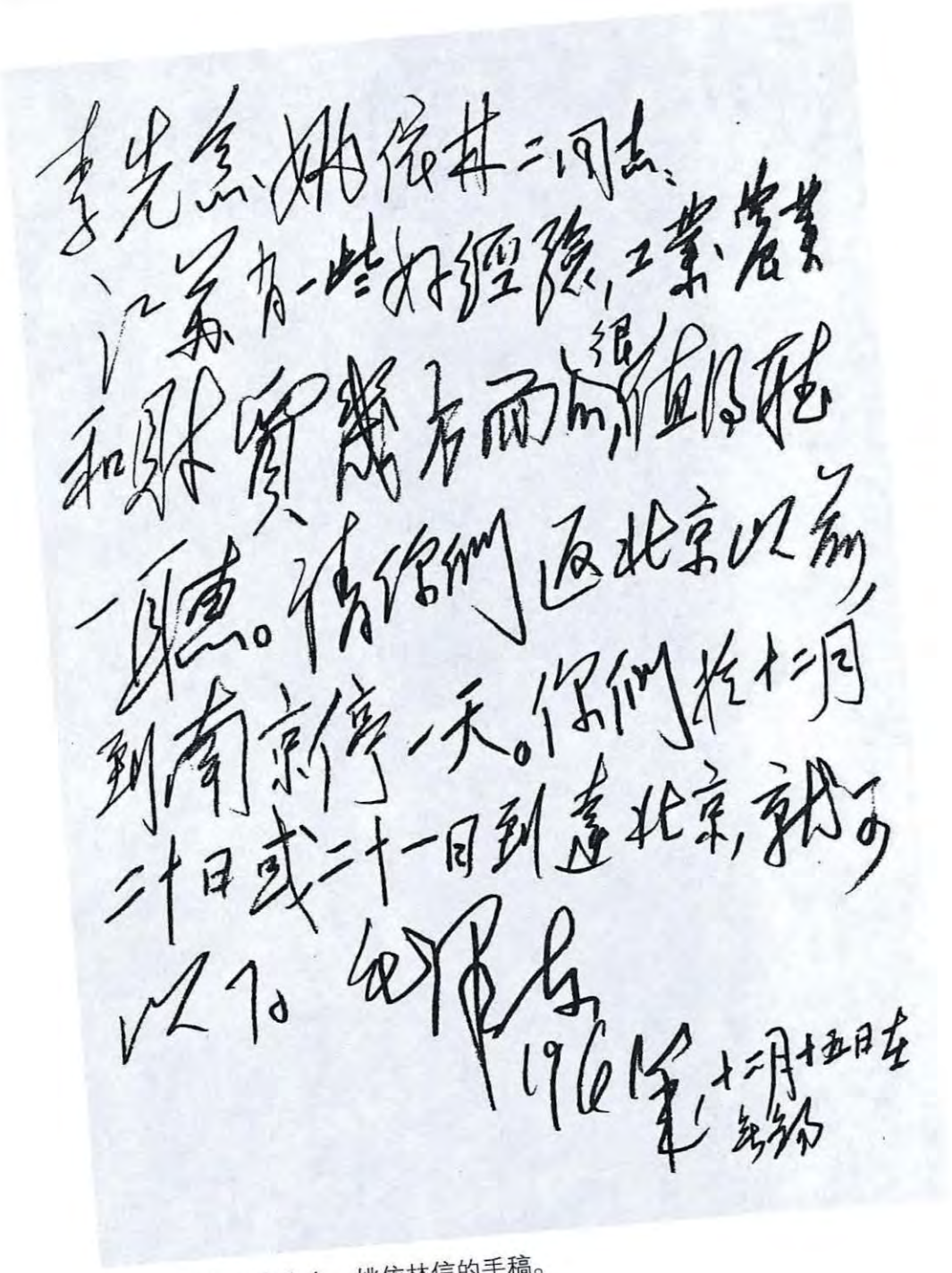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毛泽东

1961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无锡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值得注意一下。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在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毛泽东

1966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杭州

毛泽东致李先念、姚依林信的手稿。

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1961年12月20日）

对于过去走了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几个大办都是中央决定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报来的，但是谁叫中央相信你们呢？我们的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同时还要看到，这些错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是有个过程的。问题是我们认识的过程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给张仙朋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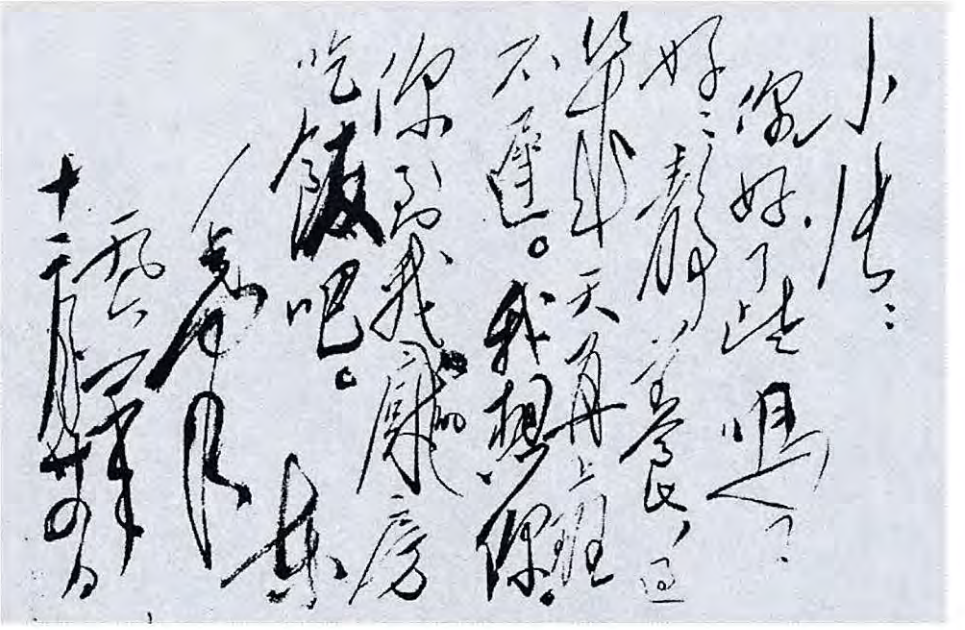
（1961年12月24日）

小张：

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四日



毛泽东致张仙朋信的手稿。

给周世钊[1]的信

（1961年12月26日）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2]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3]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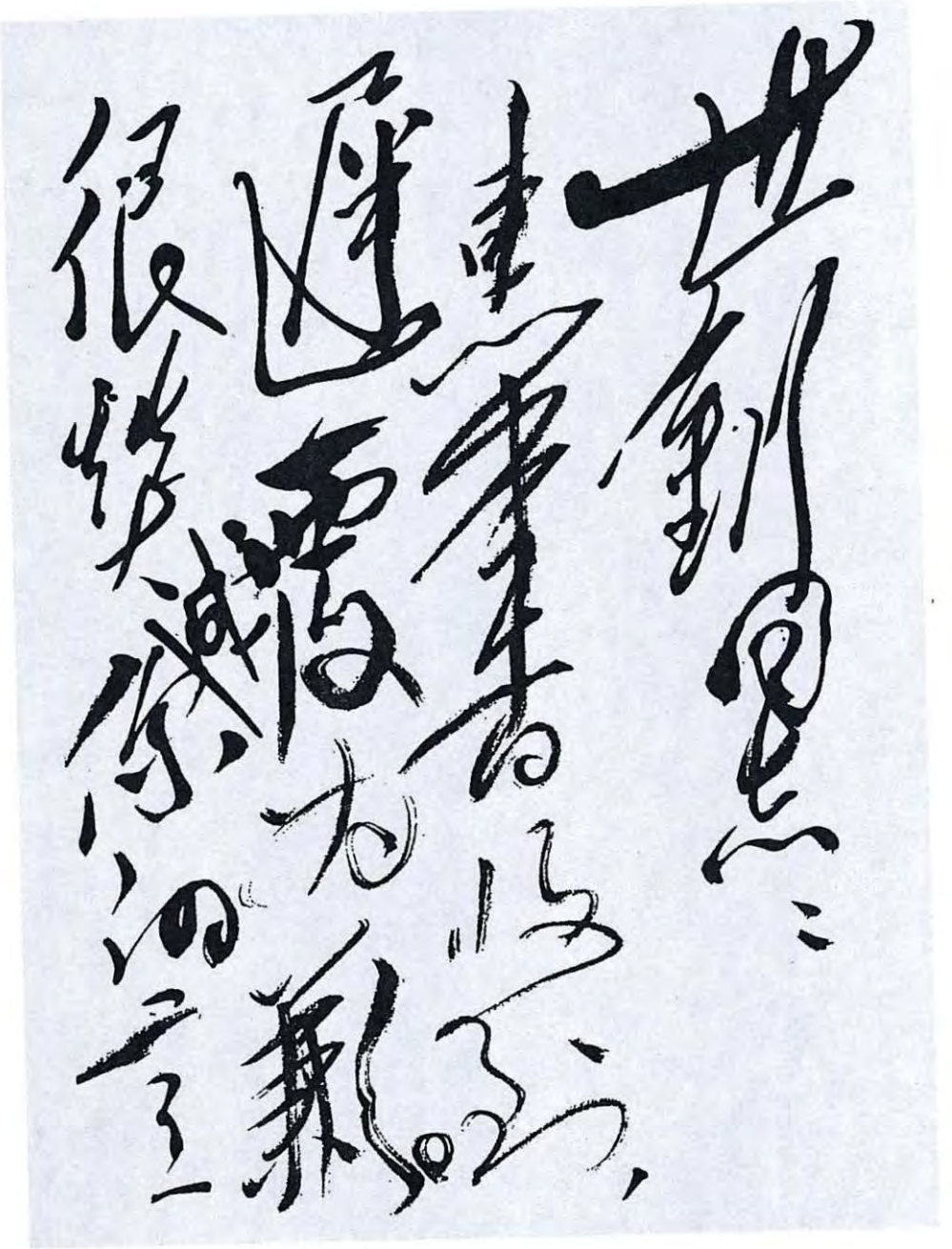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参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全唐诗》卷七百六十四），下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

[3] 这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录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重登岳麓》（《雪竹楼诗稿》卷六），上句原为“西南云气开衡岳”。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给臧克家[1]的信

（1961年12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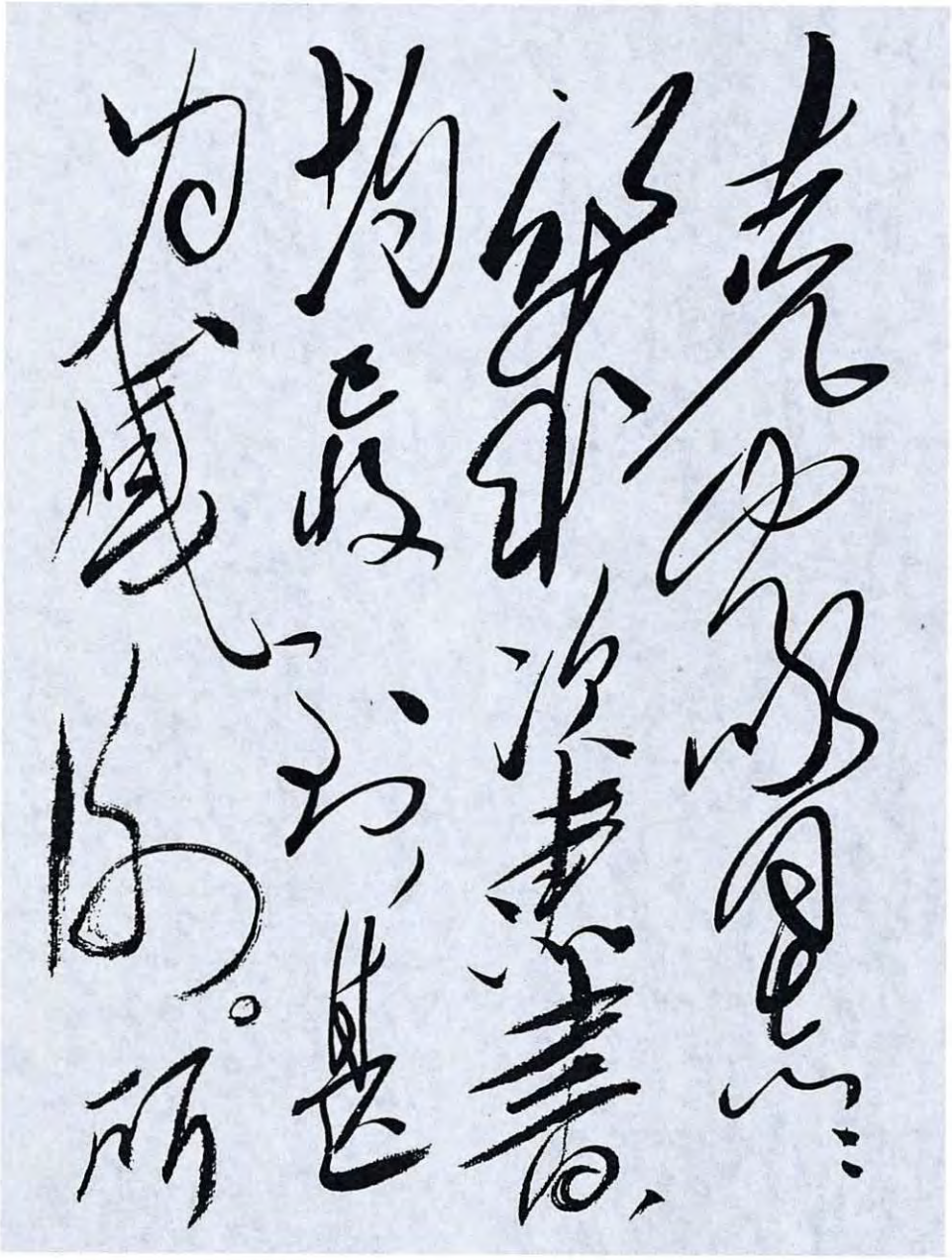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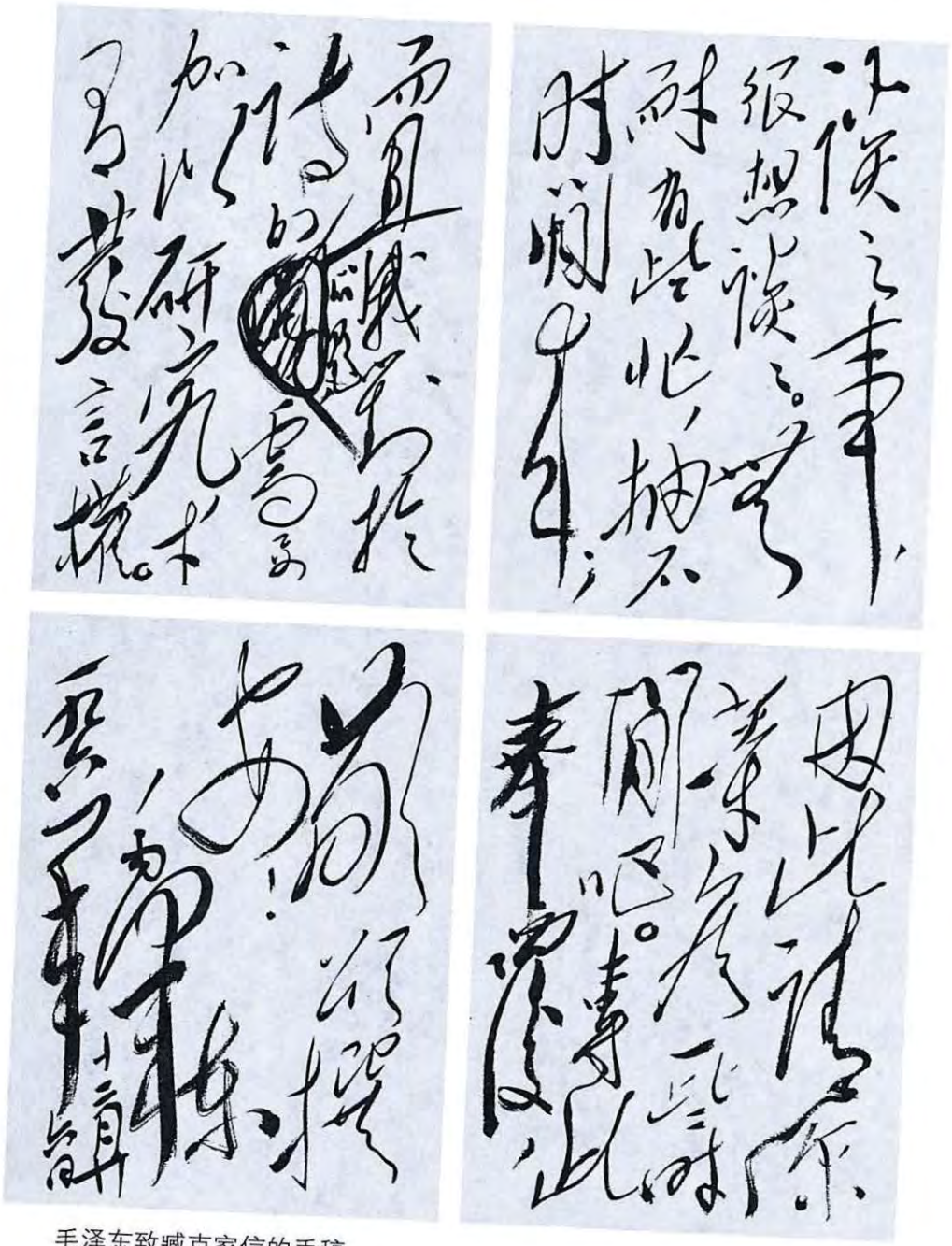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毛泽东致臧克家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臧克家信的手稿。

《艰苦奋斗，求索真理》（油画）

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的批语

（1961年12月27日）

尚昆同志：

此件[1]请即办。可以印发到会[2]各同志。在发之前，请问一下联络部，此件是否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共同商量过。[3]如未，应和他们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稿。通知稿说，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5日作出三项反共裁决，确认麦卡伦法和史密斯法党员条款符合美国宪法，美国政府有权勒令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有权逮捕和监禁任何共产党人，从而实际上宣布美共为非法。美国政府现已确定在明年2月1日对美共进行审讯。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加紧实行法西斯化的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明年1月10日左右发表党的声明，并从明年1月中旬起，以半月左右时间，开展一个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运动，以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支持美国的革命力量。通知稿中还明确规定了开展这一宣传运动的几项措施、宣传内容和注意事项。这一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于1961年12月21日报送中央。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通知。

[2] 指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科1961年12月27日注明：“主席批示的问题已问过中联部，此件陆定一同志已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商量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好好商量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七日

1961年1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

卜算子·咏梅

（1961年12月）

读陆游[1]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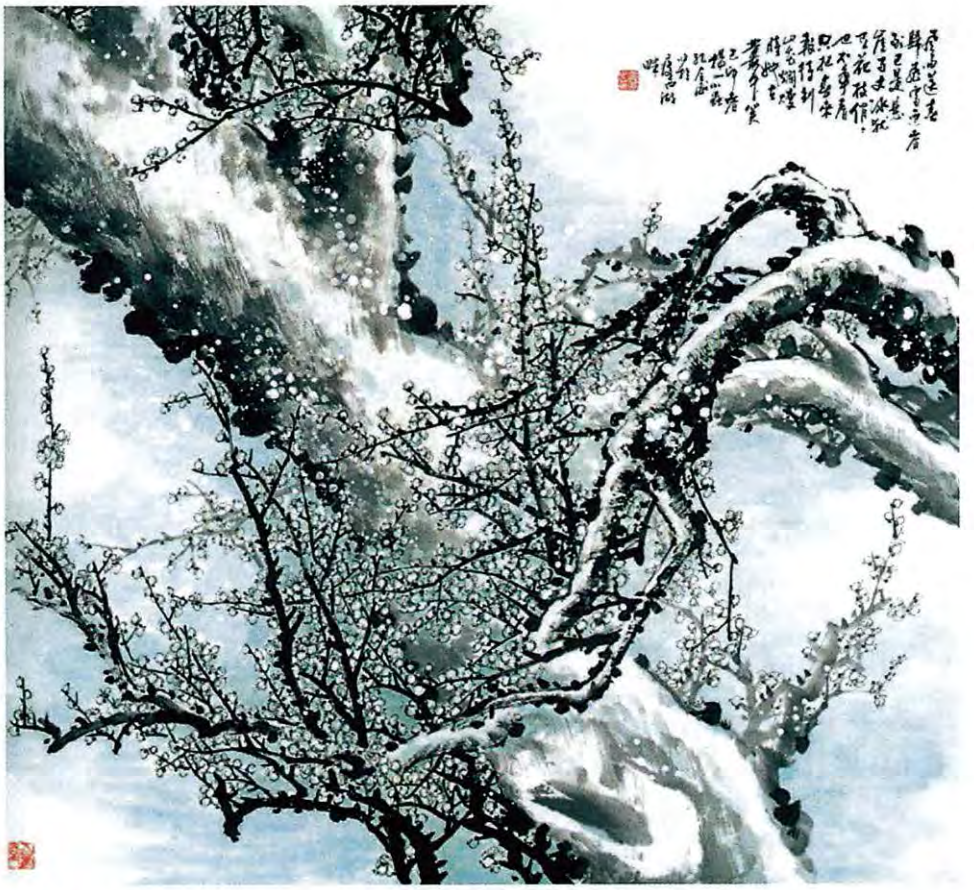
[1]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爱国诗人。他生在封建统治阶级向外来侵略势力委曲求和的时代，爱国抱负不为时用，晚年退居家乡。他在《咏梅》词中表现出孤芳自赏、凄凉抑郁的调子。本词用陆游原调原题，但情调完全相反，所以说“反其意而用之”。

附：陆游原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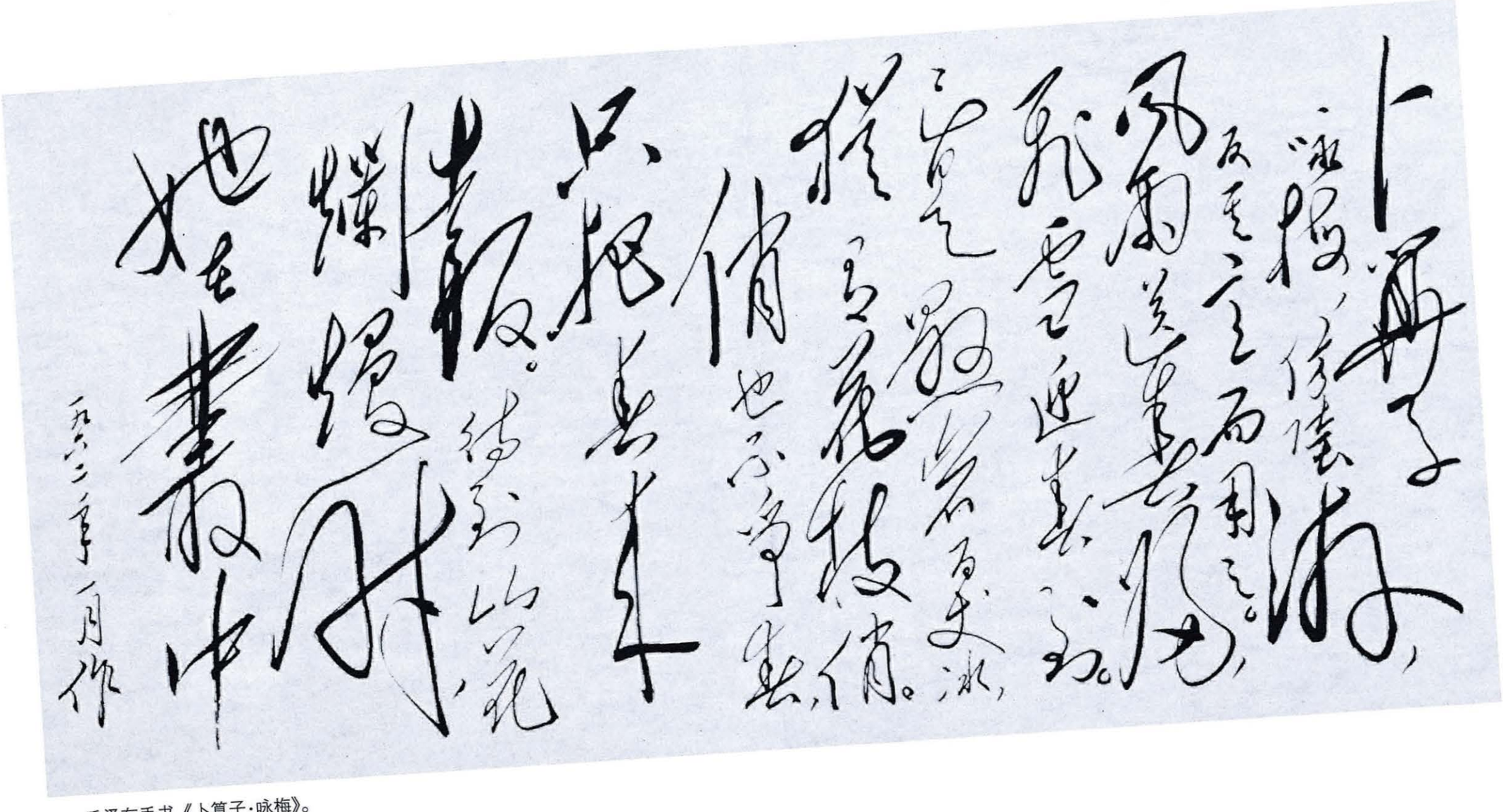
卜算子·咏梅

驿外[1]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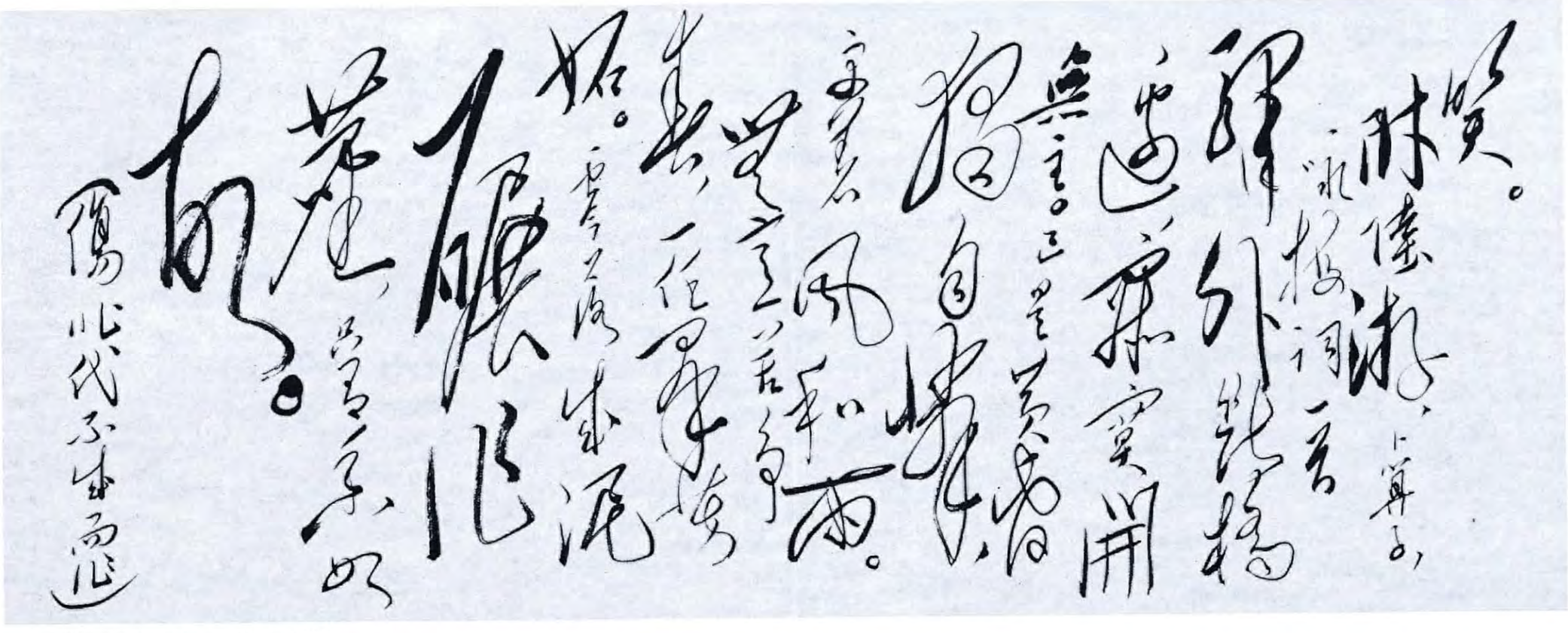
[1] 驿外，指驿站附近。古代官办的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住宿和换马的处所，称驿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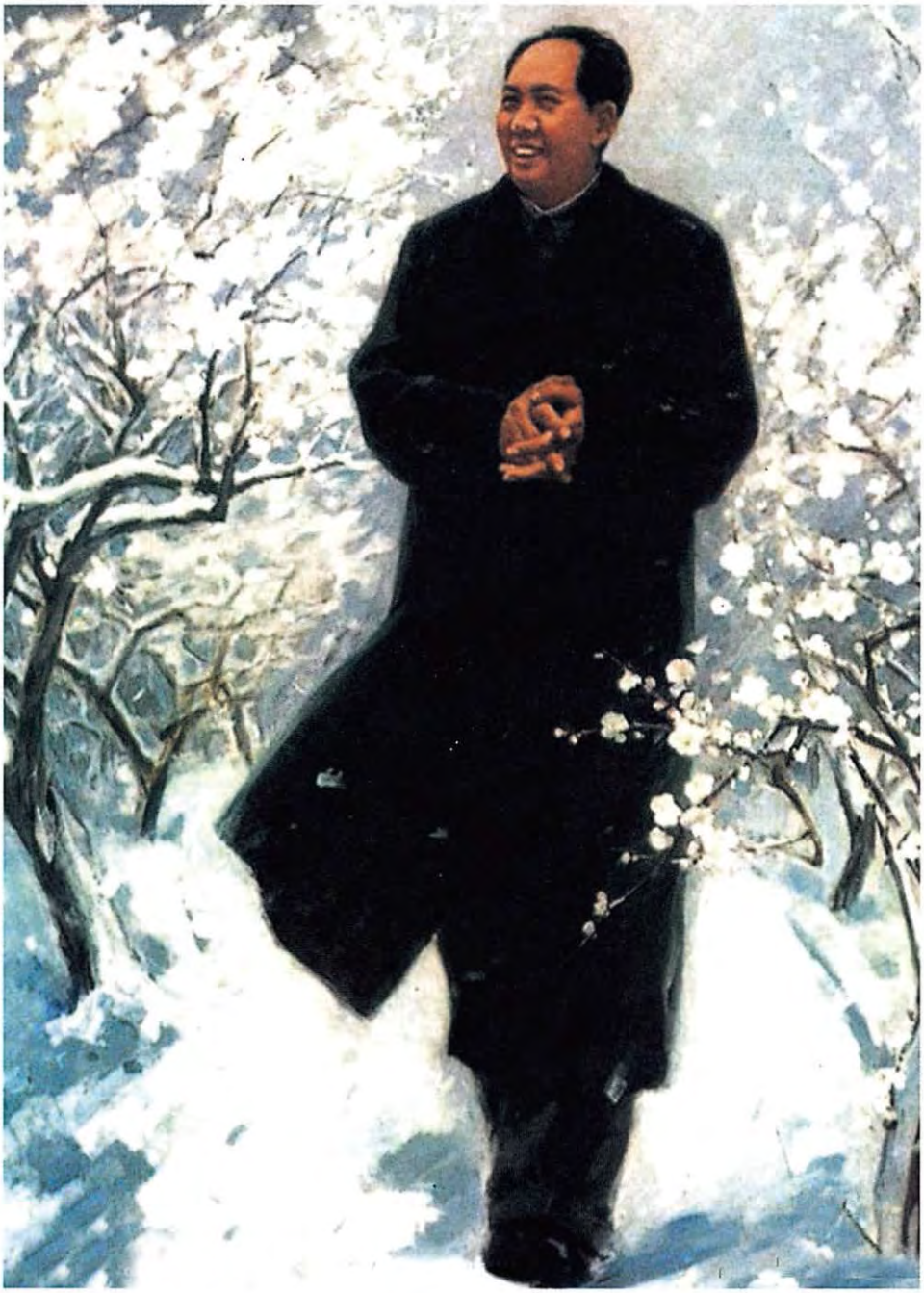
《风雨送春归》（诗意画）



毛泽东手书《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手书陆游词《卜算子·咏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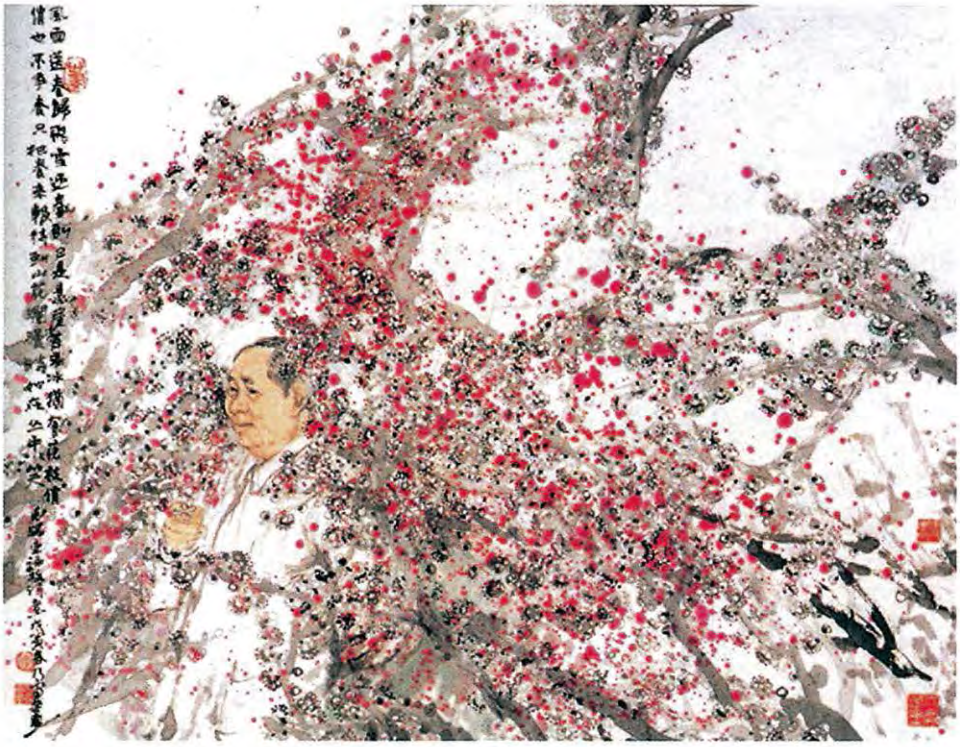
《飞雪迎春》（油画）

《迎春》（中国画）

《犹有花枝俏》（诗意画）

《只把春来报》（诗意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诗意画）



《她在丛中笑》（诗意画）

《红太阳——她在丛中笑》（中国画）

《寒冬过后绽春蕾》（中国画）

印发《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几首诗[1]的批语

（1961年12月29日）

一

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2]。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指《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8日第四版上登载的几首诗：一、著名教育家吴研因的《赏菊》："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二、全国人大代表钱昌照的七律二首。第一首是《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第二首是《蓟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2] 指参加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二

徐业夫[1]同志：

请即印这几首诗发给各同志。

毛泽东

廿九日上午

1961年，毛泽东和江青在一起。

[1]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给刘松林[1]的信

（1961年12月29日）

女儿：

信已收到，很高兴。我身体尚好，勿念。你要注意休养。希望你写点日记。

祝好！

父亲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此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科研部任俄文翻译。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

（1961年12月31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1962年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一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比兴奋，并祝贺兄弟的苏联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在建设共产主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大国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本保证。不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在目前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久经考验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

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而不懈地努力。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祝你们身体健康，并祝全体苏联人民新年快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2月31日

对一篇关于人道主义文章的摘报[1]的批语

（1961年12月）

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

[1] 新华通讯社1961年12月2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七期《每日要闻》栏目中登载的一条消息说：波兰《文化评论》刊登哲学家兼政论家沙夫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和内容”，它的目的是“发展个人和为个人的幸福创造条件”等。沙夫认为“人道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而个人幸福的主张则是人道主义的精华”，并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规定为三个“辩证关系”，即“爱与恨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由和对自由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民主和专政之间的辩证关系”。

七律·答友人[1]

（1961年）

九嶷山[2]上白云飞，
帝子[3]乘风下翠微[4]。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

[1] 这首诗写毛泽东对湖南的怀念和祝愿。友人即周世钊。本诗毛泽东手迹原题为“答周世钊同学”，后改为“答友人”。周世钊（1897—1976），湖南宁乡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曾加入新民学会。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解放后与毛泽东信件来往颇多，并有诗词唱和。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的信中，在引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岳麓山联语）以后说：“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可以跟本诗印证。

[2]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60里。古代传说：尧帝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同嫁舜帝。舜南游死于苍梧，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悼念不已，泪滴竹上而成斑点，称为湘妃竹。所以下文有“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句。

[3] 帝子，即指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

[4] 翠微，轻淡青葱的山色，指“未及山顶”的高处（参见《尔雅·释山》疏）。

洞庭[1]波涌连天雪[2]，
长岛[3]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4]
芙蓉国[5]里尽朝晖。

《芙蓉国里尽朝晖》（诗意画）

[1]　洞庭，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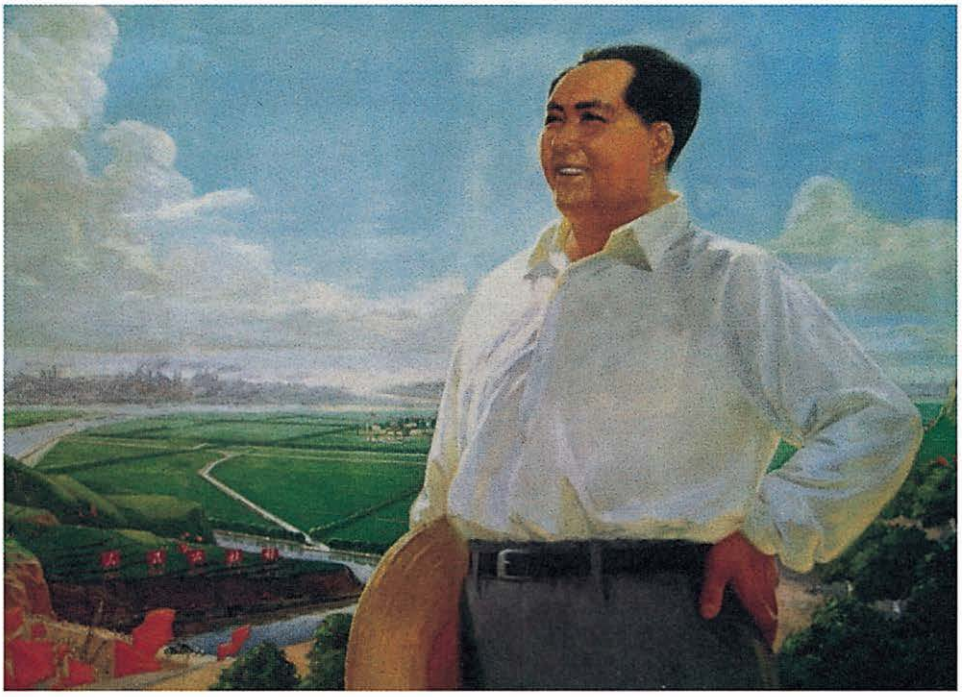
[2]　雪，形容白浪。

[3]　长岛，长沙橘子洲（见《沁园春·长沙》注），代指长沙。

[4]　我欲因之梦寥廓，化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句。

[5]　芙蓉国，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芙蓉国是说芙蓉花到处盛开的地方，这里指湖南省。

《芙蓉国里尽朝晖》（油画）



《芙蓉国里尽朝晖》（油画）

《芙蓉国里尽朝晖》（版画）

七绝两首·纪念鲁迅[1]八十寿辰

（1961年）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
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2]
犹制小诗赋管弦。[3]

---

[1]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2] 龙华喋血不眠夜，指1931年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包括“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白莽、冯铿在内的革命青年共23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说：“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喋血，血流遍地。

[3] 犹制小诗，指鲁迅作《七律·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赋管弦，指配上音乐。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1]
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2]
一例氤氲入诗囊。[3]

---

[1] 鉴湖越台名士乡，鉴湖，在浙江省绍兴市城西南两公里。附近有山阴（今绍兴）人陆游吟诗处的快阁。清末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亦是山阴人，自号鉴湖女侠。越台，即越王台，春秋时越王勾践在会稽（今绍兴）为招贤纳士而建。本句是说，鲁迅的故乡绍兴是古今名人荟萃之地。

[2] 剑南歌接秋风吟，剑南歌，指陆游的诗集《剑南诗稿》所收诗作。秋风吟，指秋瑾作的《秋风曲》诗和被清政府杀害前书写的唯一供词“秋风秋雨愁煞人”。接秋风吟，与秋风吟一起。

[3] 一例氤氲入诗囊，一例，意即一律，一样。氤氲，形容烟或云气很盛，这里比喻陆游、秋瑾与鲁迅的诗篇富有诗味和爱国热忱。诗囊，装诗稿的袋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称，李贺“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

七律·改鲁迅诗[1]

（1961年）

曾惊秋肃临天下，[2]
竟遣春温上舌端。[3]
尘海苍茫沉百感，[4]
金风萧瑟走高官。[5]
喜攀飞翼[6]通身暖，
苦坠空云[7]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
起看敌焰正阑干[8]。

---

[1]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诗即《亥年残秋偶作》。

[2] 秋肃，秋天草木凋零的肃杀凄凉景象。临天下，降临天下。

[3] 春温，春天的温暖。上，这里是流露的意思。舌端，指语言。

[4] 尘海，尘世如海，指广大的人世间。苍茫，旷远迷茫。沉，浸沉、沉没。百感，各种各样的感慨。沉百感，无数感慨，沉埋心底。

[5] 金风，秋风。我国古代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解释季节的变化。秋天属金，故秋风称金风。走，跑的意思。高官，大官。走高官，为“高官走”的倒装。

[6] 飞翼，飞鸟。

[7] 空云，空中云端。

[8] 阑干，横斜的样子。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